



共产主义者

◀月刊第3期
共产主义革命阵线 2025.7

时事
高考
与“解放”

理论
国际主义与
世界革命的
必要性

·官方网站 bolshevikleninists.com
·联系我们 Leninists1917@proton.me

我们是谁

联系我们:

Leninists1917@proton.me

官方网站:

bolshevikleninists.com

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缺乏一个的全国统一的政治组织，一盘散沙、各自为政。革命运动被悲观主义与冒进主义笼罩着：当前中国的左派们要么充斥着“理论家知识分子”，读着几百年前的老书怀古伤今，为死人而战，判断过去人物、批斗过去事件，活在过去；要么则是一群不择手段的机会主义者和冒进派，在建成坚实的政治基础前把自己暴露在广大敌对运动与国家机器的监视前。

当下大多数中国工人运动之组织之间的内斗，由于种种山头主义氛围的影响，绝非进步趋势和落后趋势的斗争，也并非真正严肃的政治讨论——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左派间的所谓斗争几乎全部变成了人身攻击和毫无实际政治意义的过家家，不仅在群众眼中留下一种极为幼稚的政治形象，更是离间广大工人阶级的热心支持。在这样陷入恶性循环的背景下，许多本应有机会投著实践的理论纲领因为背离了工人阶级运动的现实支持，而不得不蜕化为纯粹的空谈。

什么是属于全体共产主义者和工人阶级革命左派的政治纲领？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在中国、东亚和整个寰宇建立起劳动者的政权，实现彻底的劳动者之民主，公有化重要的生产部门、将其产出还于全民，用理性、公平、按需分配的方法有计划地规划协调生产力，让人类得以掌握自然，结束阶级社会的存在以开启人类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我们追求一场根本性的革命和彻底的解放，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有一个摆脱山头主义和过去革命者间一切阻挠我们前进的阴霾，建立起一个以民主对抗宗派，以党的统一和集中领导真正对抗国家机器的、属于工人阶级的先锋之政党！

我们的党必须是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党——民主集中制是“自由讨论，一致行动”，即革命党党员通过民主方法决定党的政治路线，并有义务绝对遵循业已通过的决议。革命党的建制不允许任何个人主义存在——任何党员皆不得违背集体的意志，任何革命者都不得在党的民主程序以外违背党的决策。

我们的党必须是摆脱一切惰性的党——如果没有一个强大、有活力的党员团体，再严密的党纪和党章都是一纸空谈，从基层到干部的一切党员都必须充分组织起来，在党的建设中共同承担政治任务，以强大的基层和健全的干部实现持续的扩张与发展。

我们的党必须是面向群众的党——共产主义革命者支持一切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自发反对剥削阶级与资本主义统治集团的动员，并积极谋求将其引导至社会主义革命的自觉道路上。革命左派以政治理论为纲，推动建立涵盖全体劳动者的工会和工人团体，并希冀通过广泛的革命组织动员一切无产阶级参与建党和促成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的党必须是以理论武器剥除盲动和个人主义倾向的党——只有通过回归最彻底、最现实的分析，方可实现对于革命的世界观、政治纲领、方法论等必要理论武器的辩证统一；革命党人必须以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为纲，消除各革命团体间的狭隘分歧和意识形态对立，促进以革命的方法论为基础的政治统一，并以此铲除任何借“革命”之名行宗派割裂、分化革命力量的行为。

我们的党必须是以全体中华无产阶级为基础，追求寰宇各国革命的党——革命党人绝不能以通过资本主义制度下统治集团机械划定的国家与行政疆域限制革命组织的发展。中华国家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必须支持全世界中国和华人无产者在绝对联盟、甚至完全统一的革命组织内实现社会主义革命——革命党在建制上跨越资产阶级国家疆域的统一绝非沙文主义，而是求得革命团结的唯一途径。一个属于华人的跨国革命党也绝非寻求超民族主义，而是借助同先进的中国革命者间友好、坦诚的结盟，将我们的革命传遍寰宇内的五湖四海，帮助全世界受剥削压迫的人民寻得解放！

在此，我们呼吁建立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共产主义革命党，一个代表劳动者的先锋队，一个铲除一切懦弱和盲动的组织，一个能够真正对抗国家机器、资产阶级建制和血腥镇压并寻回我们革命左派已经丢失数十年的纪律、纲领和统一组织的政党。

我们是建党者，是先锋队，我们呼吁所有想要开创更美好明天的革命者与我们共同奋战。为了有朝一日，我们能够亲眼见证我们以双手开拓的、属于新世界未来的晨曦！



《共产主义者》

官方YOUTUBE中文播客

- 总结历史
- 学习理论
- 时事评析
- 文艺评论
- 组织建设
- 政治/生活

<https://www.youtube.com/@revcommunist0cn>

时事

I	常宁喊楼事件：风声鹤唳的中国政府	05
II	高考与“解放”	07
III	黑砖厂丑闻：资本主义那“会说话的机器”	10
IV	一支为工人而战的笔停了，但斗争不会——致谢中国劳工通讯的同志们	12
V	“特马之恋”的破裂与复合：美国统治阶级内斗的加剧	15
VI	罗帅宇之死：请睁眼看暗处的“刘翔峰”们！	18
VII	疯狗、白头鹰与波斯猫——伊以冲突简评	21
VIII	用“妈妈岗”包装的新剥削：妇女、家庭与资本主义	24
IX	洛杉矶抗议——美国两党的政治角力与社会阶层的干预	26

30	马列毛大群：南辕北辙的宗派主义者	X
33	工人民主的含义与意义	XI
44	阶级、国家、官僚的本质	XII
57	谁控制“常识”？——论精神生产资料与阶级秩序	XIII
61	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的必要性	XIV
65	关于家庭和家庭专制主义	XV
71	“社会主义乌托邦”破产了吗？	XVI
73	资本主义能摆脱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吗？	XVII

理论

常宁喊楼事件：风声鹤唳的中国政府

6月3日晚，常宁尚宇学校高三年级的数百名学生，自发在校园内举行喊楼活动，以缓解即将到来的高考所带来的压力。据学生透露，活动期间，由于活动氛围太过热烈，而引发了学校的恐惧并迫使其选择举报处理，引来了警察的进校抓捕，最终抓走了三名学生。

这件事是一个缩影，近年来已有许多迹象证明**中共对群众大规模聚集的巨大恐惧**。上海的万圣节游行被遣散、对李克强去世后的群众反应的敏感、对蒲城群众自发运动的暴力驱散，都反映了社会危机如今日益深化和严峻，以至于中共必须防民之口，监控群众在公共场所的集体行为，试图熄灭任何可能引爆大规模抗议的火星。

共产主义者认为群众运动是**有其积极意义的**，高三学生喊楼的行为，本是学生意识的自我表达。但学校的教学依仗的是一套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强调上下级关系，强调教学的纪律，强调学生对老师的服从，职工对校领导的服从，虚假的、仅停留在口头的“素质”教育对劳动力市场的服从。而学校本身，恰是作为意识形态再生产机构，贯彻阶级社会生产关系的意志，将生产关系带来的系统性压迫自然化并加以延续的重要机构。任何旁逸斜出，甚至是组织性的旁逸斜出，都可能在不同程度尚意味着意识形态再生产机构掌控权的动摇，这份对资产阶级统治秩序存继的责任自然会引起校方的恐惧，以至于他们不得不借警方之手控制了三名活动的组织者。

然而英勇的学生们**并没有坐以待毙**，他们组成人墙站在警车前阻止警车开走，并高喊“退学、退钱”等口号，要求警察释放被捕学生。但是学生们组成的人墙最终没有能阻挡住警车，他们被警察使用暴力强行推开，只能看着三名同学被抓走。

我们看到了学生为了搭救自己同伴的主动性，但也看到了他们行动的**孤立无援**。他们既没有客观的社会力量（既不能确保整个社会的生产，也不能瘫痪整个社会的生产），也没有将他们自身组织成一个整体的持久的能力——而这两个特点对于改变今日的社会是必需的。生产关系的变革是社会的变革的根本，如果没有先进的无产阶级的参与，任何浮于表面的改良斗争最多只会给资产阶级统治秩序挠挠痒蹭掉一块死皮而已；组织起来是汇聚变革力量的基本手段，任何单纯地仰赖分散的自发斗争都只是逃避现实的幻想。“不是通过多数实行革命策略，而是通过革命策略达到多数。”

学生自发行动的局限性还在于他们没有认清正确的目标，他们认为一切罪恶的根源都在于人的意志，一切补救措施都在于武力和推翻特定形式的国家。以这次学运为例，他们接触大纪元这种鼓吹资产阶级民主的海外民运势力，而不是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解读校方的行为，从而得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结论，学生有革命的潜力，但因无强力的组织亦没有工人阶级在生产过程中所占据的地位，所以没有掀起波澜。但是，这不是我们就把一切的过错一股脑地丢到他们身上的理由。

革命意识是群众自己的行动意识，是从必要性的约束中产生的。群众革命地行动，是因为他们不能不行动，是因为他们必须要行动。**高三的学生们行动了，但他们的政治认知却没有让他们得出社会主义的结论。这是中共长期维稳投入下的一个卓越的“成绩”。**有意识的革命者不仅来自日益增长的洞察力，而且更多的来自实际革命活动中的群众。中共封锁信息，分化瓦解群众是他们出名的拿手好戏。但是**共产主义者不能也不敢抱着宿命论的态度，束手无策地等革命形势的到来，等待每一次自发运动中从云端坠落的革命。相反，他们现在必须一如既往地加速事态的发展，努力加快事件的进程。**我们的责任是在任何时候都要毫无畏不惧地**真言不讳**，在特定的历史时刻把群众的任务清楚地摆在群众面前，并**宣布政治行动纲领和根据形势提的口号**。这就需要对广泛的群众进行政治领导，而这是学生群体无力胜任的，只有工人阶级才能胜任；这更是松散的原子化的个人无力胜任的，**只有强有力的党组织才能胜任。**“我们的结论很简单：必须用十倍的精力去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先锋队。”



II

高考与“解放”

中国的6月9日，直接关系上千万人，牵扯上亿人的超大型社会活动告一段落。如此大规模的活动，高考，自然会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于是，旗袍、鲜花与塑料笔袋的市场进入了短暂的繁荣；手机、平板与电脑，健身、餐饮与旅游，染发、网吧与游戏……诸如此类的行业也即将迎来一波极大地消费热潮。“玩吧！”对于那一千三百万的十八岁青涩少年来说，人生最惬意、最无忧无虑的一个暑假已然开启。当然，自从他们走出最后一门科目的考场时，一句话就萦绕在他们耳边：“你们解放了。”

真“解放”了吗？

然而，这个“解放”究竟是什么意思？它直接套用了一个原本相当政治化的术语：在几十年前，它还主要被用于表示一个总体性的社会状态，指一个社会从不断产生剥削与压迫的阶级分化中被拯救出来，工人不用再被强制剥夺其剩余价值，农民无需再被迫缴纳地租，代表这些劳动人民的公权力机构以及相应的民主制度建立起来，思想文化也走向了一定的自由。

可是，在现在这个用法当中，“解放”的含义明显泛化了：它开始用来被指代个人的状况，也就是说，那些高中生们获得了自由。这个词义泛化值得我们的关注与思考：高考结束了，我们真正获得了自由与解放吗？

一定程度上说，答案是肯定的，没有一个人说经历完高考的学生们没有获得了“解放”，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没有一个人不承认高考之前学生们是处于极度不自由的状态。高中生处于不自由的状态，这是一个无人不晓的共识，以至于有人说，中国教育的最大问题不在于“卷”，因为在这种特殊的选拔机制下，总会有人，甚至于很多人，自愿地投入到极度的“内卷”中；但是并非每一个投入内卷的人都是完全自愿的，他们甚至往往难以完全跟上课堂上老师的讲授。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看待“栓”。

有些人似乎是十分支持这种状态的，在学生、老师、家长以及社会人士中都存在不少这样的人。对他们来说，高考是通向“美好生活”的敲门砖，是“阶级跃迁”的垫脚石，是十年磨一剑的试炼，是勇占鳌头的契机，因此之前长达三年的准备就显得必要，乃至成为一种“神圣义务”——这种声音充斥着整个社会，一声声“紫气东来”“一举夺葵”的祝福背后，都是这种意识的具体体现。它通过祝福，这种虚幻的肯定，来为高中生过去三年的发生的一切提供合理性——这都是为了你高考胜利的准备啊！

之所以说这种肯定是虚幻的，因为似乎每一个人都能收到相应的祝福；然而高考中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是赢家。有赢家，自然就有输家；有因此一举冲天者，也有因此跌落谷底者。你一旦跌入谷底，又没有一个“好家庭”为你铺路，那这辈子可算是完蛋了——这是高考真正的残酷性。有的时候，这种话术会特地隐藏起高考的残酷性，把每个人都视作潜在的成功者，它要么是为了“不影响心态”，要么是资本为了多卖一点商品的溜须拍马。但是，如果把这种话术放到那些正在被拴着的学生们身上，那残酷性就显露无遗了。对考不好的恐惧就好像一条鞭子，时不时抽在学生们身上，逼迫他们在学习这条路上一路狂奔，不管他们的真实意愿如何。如果几乎所有人都为了同样的目标耗费了三年的宝贵青春，却依旧产生了大量难以如愿的人，很难想象不是整个体系出了问题。那些被筛选掉的人有很多远非学习不认真，很多都是因为没有相应的天赋、相应的家庭环境、相应的教育资源——这中间又有哪个是他们自己能够控制的呢？甚至说，能够某种程度上适应学校的高压环境，也是一种天赋。我们还能说高考是公平的吗？我们还能说，这种“栓文化”是一种合适的制度吗？

高考的结束绝不是“解放”，对学生而言也不是什么自救。这不过是资本主义无止境的恐怖中短暂的休息罢了。

真“结束”了吗？

当然，经历完高考的学生可以说：“至少我们走出了那个令人心有余悸的学校——我们现在是自由的。”这话或许不假。但是，首先，考上大学的要进入大学接受官僚主义的洗礼，甚至一些较差的大学已经陷入了“高中化”的泥潭；无论考没考上大学，都不可能啃一辈子的老，总得找个工作养家糊口。他们的自由终究是有限的：他们终究要被投放到市场上，成为不断出卖自身的劳动力，他们的自由终究要受到市场规律的制约。结果就是，强制的不自由消失了，隐形的不自由仍然存在。是的，他们是“自由劳动力”，可以自由地选择到哪家公司工作——也就是自由地选择被哪个资本剥削。多么伟大的自由！

这种自由还有另一个方面：在学校里，他们要和在监狱里一般严格地管理自己；但是出了学校，他们可以自由地决定自己的面貌。从奢侈品到餐饮与旅游打卡，从手办到游戏皮肤，他们决定自己面貌的方式多种多样，不过很多都离不开花钱——或者说，消费。很多人以为，他们是在追求“爽”，但他们不过是从感官刺激里提取空虚与欲望的安抚剂罢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并没有实际地创造出什么东西来，甚至很少地真正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其实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消费主义”，它表面上迎合人的需求，实际上却把人矮化为欲望的奴隶。为什么这种消费主义会存在？一方面，它是资本为了自身延续，催促人们扩大消费的手段；另一方面，人们向上享受不到政治的自由与民主，向下又享受不到劳动与创造的自由，结果，他们就只能把服务其被压抑的欲望当做真正的自由。

高考结束的那个暑假，连接着两端的人生：一段是被压抑的青年，一段是被压抑的中年。就好像那个寓言：蝉在地下深埋了十几年，到地上自由地鸣叫两个月后就死了。高考之前，我们饱受着不自由与不公平；高考之后，我们所见的仍是不自由与不公平。如此一来，高考本身的公平神话就成了笑话，因为高考本身就是连接这两端的不自由与不公平的桥梁。事实早就告诉我们，高考不过是当下分配制度的遮羞布，它不过是用一个看似公平的程序维护社会整体的不公平；哪些人被选中、哪些人没被选中，对社会整体的不公平而言毫无影响。

如果你真的有志于改变这种不公平，或者说，每一个受到这种系统性的不公平所压迫的人，都不应该只把眼光放到高考。因为这种不公平，追根究底，还是根源于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不推翻这种统治，公平就无从谈起；不让被统治阶级建立新的社会，自由就无从谈起；不让整个社会摆脱资本的掌控、让活生生的人自己决定自己的活动，解放就无从谈起。



III

黑砖厂丑闻：资本主义那“会说话的机器”

近日，知名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联合大象新闻记者，揭露了湖南省岳阳市临湘市艳飞建材有限公司（砖厂）强迫智力障碍人士从事高强度劳动的丑闻。这一事件把藏在黑影中的现代奴隶制曝光在了全民眼前，更揭露了中国政府在保护残障弱势群体方面的严重缺失。

经调查砖厂“雇佣”智障工人，强迫他们每日苦干 12 小时，无工资只管饭，堪称 21 世纪“美洲种植园”。厂长、监管人员和老板对底层弱势群体是如此冷漠，肆意践踏人权、从来就不把这些工人当作和自己同一物种的生命看待，而是“会说话的机器”。甚至他们还从历史上的奴隶暴动中学到了经验，会说话的机器也许会造反，那我欺负“不会说话”的残障人士不久好了吗？砖厂报警 20 分钟即拉人逃跑，幸好途中被拦下，后续嫌疑人得到调查和处置。但这就结束了吗？公正因此只是“来迟”了吗？

这不仅是砖厂的问题，更是整个中国社会保障和弱势群体帮扶的缺失。这种砖厂的出现不会在一个残障人士得到该有的照顾和福利的社会出现，这样的奴役工厂更不该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土壤。

2021 年 7 月 21 日，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在其中中国政府大言不惭地宣称：“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残疾人事业发展，对残疾人格外关心、格外关注。“十三五”时期，残疾人事业取得重大成就……残疾人一个也不能少的目标如期实现。710 万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脱贫，城乡新增 180.8 万残疾人就业，1076.8 万困难残疾人被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

如果“格外关心”，指的是恶劣的绑架与人口贩卖在光天化日之下视而不见，那我们不得不质疑，抓“境外势力”、“反动分子”如此高效且精准的中国政府，为什么到了残障人士这块行动能力不如最基层的志愿者和记者，允许一家注册的公司非法奴役残障者如此之久？“残疾人一个也不能少如期实现”，看看这睁眼说瞎话的厚脸皮吧，就像他们在仍然在温饱线勉强挣扎的基层劳动者面前庆祝所谓脱贫攻坚战取得胜利一样虚伪！这些城乡新增的“就业”，也不得不让我们质疑，是否指的就是这种无耻企业用最低劣的工作条件、最微薄的报酬欺负残障者不会反抗？

丑闻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网友们如同一锅沸腾的开水痛斥着“黑砖窑”的残暴奴役。我们知道，**资本的每滴血汗钱都带着肮脏，而中国政府的纵容包庇**，就是这肮脏的遮羞布！只有到事情闹大引发广大社会舆论时，他们才会花功夫去进行整顿、断臂自保。艳飞建材在偏远山村横行多年，奴役智力障碍者，公然直播烧砖，政府却像瞎了眼。报警20分钟，工头就能把工人塞进面包车转移，这效率哪来的？这是资本与权力的勾结，就是官僚的装聋作哑，一个砖厂，敢把残障人士当牲口使，敢这样明目张胆违法，为什么这么嚣张？很简单：它有“人民政府”的保护伞！

在这种情况下，劳动监察就是笑话，砖厂工人没合同、没工资、没防护，12小时苦役，监管部门怎么没查到？黑企的违法成本低得可怜，连网友都能翻出砖厂的直播。可悲的是，即使解救之后，残障人士也仍然没有归宿。要不被直接往家里一扔当作累赘，要不会因没有工作，没有食物，饿死街头，或者回去之后又被亲人卖出去。社会不在意他们的幸福和生命，只在乎他们的价值，和对其他所有劳动者一样，无非是赚钱的不同工具罢了。

然而我们绝不接受这种血淋淋的结局。我们明白，单凭良心记者与社会志愿者的能力，仅够在他们允许的范围内为这个体制修修补补，最广大的被压迫者得不到任何解放更改善不了自己的处境；需要的是一场**根本性、整体性的变革**，彻底消除这个独裁、不公、牟利、无视社会利益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社会主义革命不会落下任何一个人，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解放任何一个人。



IV

一支为工人而战的笔停了 但斗争不会——致谢中国劳工 通讯的同志们

6月12号，中国劳工通讯宣布，因资金短缺及负债问题无法维持运作，决定启动解散程序。其网站将停止更新内容，社交媒体专页亦已移除。有相关报道指出在同一天中港的国安人员采取联合行动，搜查并“约谈”六名涉嫌“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人士，不过，中国劳工通讯的办公地点在长沙湾，并非中港国安联合行动中提及的葵涌区。

中国劳工通讯的创始人韩东方，在1989年的六四运动期间创立了“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是内地首个民间工会，六四后他被列为通缉犯，判囚22个月后，在1993年到港并展开推动中国工运和监察中国劳权的工作，于1994年创办中国劳工通讯。

在这三十一年来，中国劳工通讯忠实的为劳苦者发声，并为劳工争取权益做出了努力。虽然有着受NED等机构资助的背景，并且一再在报告里寄希望于中华总工会这个中共的傀儡，但该组织作为民间工会无疑是为工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且为系统性的分析中国劳工现状提供了坚实的统计资料。

三十年如一日的艰苦工作让我们必须为这些英勇的前辈感到敬佩。同志们为基层工人谋福利、给缺乏话语权和罢工权的中国工人阶级日夜不息地服务，是**将自己的人生奉献给了世界上最为崇高的事业**。我们希望这些同志们在退出政治工作后仍然可以过上不错的生活。革命不是一步登天的，我们清楚没有中国劳工通讯的同志们的铺垫，彻底性、政治性的一场变革是不可能的。他们的解散让我们倍感伤心，但我们十分清楚伤心没有用处，从其中吸取教训，让中国劳工通讯所做出的工作不付诸东流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看到在中国的合法组织为劳苦者争取权益的组织有很多，但工人的社会现状没有得到丝毫的改变。

中华总工会作为中国最大的和唯一的全国性工会做了什么呢？在自己的各部门踢皮球，成立了几十年的企业没有工会也不去管，向“有关部门反应情况”，给工人们提“建议”。甚至成立工会主要看老板愿不愿意，因为工会的程序上面必须有得到厂方行政部门的同

意。任何一个工人都知道工会除了过年送点油米，偶尔举办点娱乐活动之外就没有什么作用了，并且欠薪乃至罢工事件等等发生时工会是最会踢皮球和“稳定工人情绪”的。至于工资谈判等工会应当做的东西，我们到现在还没有看到工会代表工人组织集体谈判的例子。

那么民间的各种团体呢？如果只是在当地给工人一些福利倒也还好，但如果真的试图将工人们组织起来，或是在罢工等运动中支持工人诉求等等，让中共感受到其威胁，那么好心的国安就会帮助其走向社会福利组织的正轨，或是直接要求解散。即使是中国劳工通讯这样富有声望的团体，**能做的事也是杯水车薪。**

工人们想要谋求最基本的应得的权利该如何做？似乎比较有效的合法途径只剩下了走劳动仲裁，毕竟工会只会“建议”，其他的社会机构也做不了什么。然后我们就能看到善良的老板总是一拖再拖，往往半年以上甚至数年才能得到原本就该得到的工资或福利。老板们于是有恃无恐，他们可不怕拖，即使打官司拖到最后也只是把该给的给了而已，而工人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对每一个侵权或者拖欠工资将其告上法庭。两相比较，**老板总是稳赚不赔的那一方。**



那作为工人们最为传统也是有效的罢工呢？在罢工不是职工和工会权利的中国，在实际上罢工是不提倡乃至需要被制止的。合法的工人组织即工会正如上文所说并不能起到任何帮助工人表达诉求的作用，并且以“安抚工人情绪”为名实际上只是制止罢工。纯粹自发的罢工又往往局限于孤立的厂房，并且受限于资金的不足往往罢工无法持久，最后只得被迫上工。

分析了数种维护工人权利的组织方式和方式，我们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中国，实际上不存在一个能有效维护工人权利、争取应得权益的合法组织，不存在一个能有效维护工人权利、争取应得权益的合法手段。**相较之下，甚至老板稳赚不赔的打官司也已经成为最好的一个合法手段了。

那么我们该怎么做？继续看着那群油光满面的老板们吸食着全厂、全公司的血汗吗？继续看着工会官僚们踢皮球、和稀泥、站在老板一方“稳定工人情绪”吗？继续看着调解员、仲裁员、法官轮番登场，自己应得的工资却还是要大半年甚至更久才能判决下来，然后老板继续拖到强制执行判决结果时又说没有钱能被执行吗？

不，我们不是天生就是要当一辈子当这些人的奴隶，哀求着他们能良心发现般行行好。我们的命运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用我们的行动向他们证明谁才是社会真正的主人。社会的全部财富都由劳动者创造，中国的工人阶级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为强大的阶级。在中国劳工通讯里记录了无数无产阶级和劳动者伟大的斗争。

然而为什么一直不断地向剥削者斗争的最为强大力量的无产阶级仍然无法改变自己的处境，并且随着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尖锐化生活一天天的变糟了？

就像零星的光亮无法拂去阴霾般，若斗争始终局限于自发，没有有效的组织，那么劳苦者的这股力量便无法集中起来，又极容易在反攻倒算中土崩瓦解。劳工通讯的无数案例正是证明了缺乏有效的自觉的组织下，斗争往往会被局限于孤立的地方，同时极容易被摧毁。

那么如何才能有效的组织起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一种组织能够做到：他忠实代表无产阶级和一切受压迫者的利益，为捍卫和争取他们的权利敢于做出最大的奉献；他在全中国范围都有自己的联络网和组织，能够有效的将工人和其他劳苦者组织起来，将斗争和运动扩大到整个城市乃至省、全国；他广泛的吸收一切最为优秀和先进的无产阶级，在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的支持下贯彻着最彻底的民主集中制，克服其他阶级对他的压力而始终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这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一个中国的统一的革命党**。

从头开始为建立这样一个党无疑是艰苦的，然而这几十年来的历史已经证明了一个真正的革命党的必要，群众运动的高涨却迟迟无法真正改变社会的现实已经最为清晰的向我们揭示一个能真正自觉地组织起全国无产阶级和劳苦者的组织的迫切需要了。

不再沉迷于中共、老板或是各个工会、合法团体的幻想，也不再因幻想的破灭而走向个人恐怖主义的极端——从现在开始**组织起来**，让我们以**现实的行动**向一切统治者和剥削者宣布我们要自己解放自己，我们要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

“特马之恋”的破裂与复合 美国统治阶级内斗的加剧

来自美国共和党的总统特朗普，和来自美国高端科技企业的马斯克，由竞选台上的你依我依，演变到在社交媒体上互相过河拆桥，从“特马之恋”到“特马之仇”，只用了不到几个月，时间甚至都不够一个胎儿坚持到出生两人的合作关系就这么流产了；大吵几日之后，前几天两人又“不计前嫌”地握手言和。整件事情的经过，即使是深谙政治经济学的学者，都不由得无奈一笑，一是对于美国精英阶级、资产阶级可以将政治工作进行得如此儿戏和阴晴不定感到无奈；二是对于各方来说，对美国统治阶级行动的反应工作就会变得相对不太好做了。

不过，马克思主义者们千万不要被这种戏剧化的展开而感到不屑一顾，尽管特朗普和马斯克的分合看上去似乎是政治娱乐化了，其实事实恰恰相反，这种戏剧性的进展恰好反映了美国社会不同阶级与阶层的矛盾，二者的行为和发言，都恰好反映了美国国内矛盾日益尖锐下的不同诉求。

回顾二人的蜜月时期，是美国大选最紧张的时候，特朗普要重返白宫，无非需要资金和选票。此外，他的政治诉求包括：国内消灭民主党领域的“政治正确”；支持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限制移民政策；小政府大市场的经济模式，抨击“深层政府”等。而且对比起2016年的选举，特朗普团队，或者说特朗普本人，明显在以往一贯的立场中油滑地退了一小步，在保持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大原则不变下，他开始给年轻选民让步，伸手偷取民主党的基本盘，因此，他需要在年轻一代的选民中获取声望，而并非是横跨千禧一代的绣带工人。而马斯克，是硅谷科技主义右翼的代表人物，这群人是美国的精英阶级，马后炮来说，从马斯克进退白宫的可以看出来，这群精英阶级事实上对政治不太敏感，即它本身其实对政治不感冒，他们不认为传统的美国政治可以解决美国当下的问题，笃信科技的发展能够主导人类社会走向繁荣稳定。而且，这群精英阶级有扩大他们市场的需求，为此他们必须获得政策的支持以及获得政治上的影响力，从而获取有利于他们资本扩展的政治资源。

马斯克提供了资金和年轻一代的影响力，特朗普提供了政治影响力和政治权力的保障，二者因此非常自然地走到了一起。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二者走向同盟的过程，是不涉及理念同步的，换句话说，**二者走到一起，完全是因为互相都有对方想要的资源，并非是由于什么共同的伟大愿景，所以二者走向决裂，几乎是必然的。**

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在就任后马上大手一挥，开始实现自己的宏伟抱负。他的班子，或者说他本人，是传统的美帝国主义者的典型代表。他们的设想就是全球都必须消费美国的商品而美国则不必消费来自全球的商品，而且他们不希望其他国家持有太多美元，也就是他要求所有其他国家必须同时保持对美元和美国商品的高度需求，这样美帝国主义者就可以**通过美元金融霸权，把握其他国家的经济命脉，对其他国家进行肆意剥削。**而且，他们有一套自己的“理论”，在笔者看来这是很唯心的：他们认为上层建筑可以决定经济基础。具体表现为关税大棒，在他们的设想下，就是关税可以恐吓到其他国家，使其在市场上完全对美国投降。对内，特朗普竟然又反过来，颇有吹起哈耶克遗风的样子，克扣福利政策以及提高福利门槛，延长减税政策，以及取消电动汽车补贴，将资金大部分投入移民管理和国防开支。从这些政策可以看出，**替红脖子喊话只不过是特朗普为了选票的口号而已，他真正关心的不是美国基层劳动阶级的生存处境，而是美国的资产阶级，在美国乃至整个世界的霸主地位。**他必须确保同时对全球其他国家、对国内无产阶级进行剥削。关税壁垒最终会让美国国内的无产阶级买单，扣减福利美名其曰是提高竞争力度，实际上是方便美国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更为严苛的劳动剥削，在低福利和高关税下，美国的无产阶级必须更加异化自己，才能获取维持自己生存的日常开支，因此美国的无产阶级必须对日渐残酷的市场竞争忍气吞声，为了赚取工资，他必须承受高强度的工作，甚至是同时进行几份工作。因此，美国的统治阶级的利益本质上是和无产阶级完全背离的，过往自上而下的繁荣，只不过是来自民众对于美国价值观的认可，一旦这种价值观的物质基础——即美帝国主义霸权，开始衰弱和瓦解，阶级之间的矛盾将不可避免地被提上日程来了。



的取消电动汽车的补贴直接损害了马斯克企业的利益。于是他开始立场鲜明地反对特朗普，并声称要弹劾特朗普，称这个法案是“令人作呕的畸形产物”，又在社交平台上宣

那么我们那个“亲爱的”年轻人代表马斯克呢？他这辈子最豪爽的一次风险投资以极其丑陋的形式告吹了。在发现特朗普开始“过河拆桥”之后，马斯克也作出了他的回应：他先是批评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会让美国民众为此买单；又和关税政策之父纳瓦罗展开激烈骂战，互呛对方“蠢得不如一袋砖头”；最后特朗普拟定的“大而美”法案，终于烧到了马斯克的眉毛，因为其中的

称特朗普也在爱泼斯坦名单之中。这些举措固然引起了特朗普的反对，因此马斯克又被指出疑似吸毒产生幻觉，来回几轮这种连小学生都觉得幼稚的交锋后，马斯克竟然以一种令人哄堂大笑的姿态迅速“投降”，在社交媒体上和在电话中向特朗普道歉，并承认自己的发言实在太过分，而这发生在特朗普政府威胁特斯拉企业，导致其股价一日蒸发1500亿美元之后。

这件事对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当然有重大启发，那就是——**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再一次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我们眼前**，不管他带有什么样的“高级”色彩，精英的，科技的或者什么样的标签，都不影响资产阶级在面对政治权力的绝对暴力下展现的软弱。同时，这同样印证了列宁同志的看法：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暴力推翻资产阶级，从而掌握国家机器，才能建立起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府和社会主义。我们可以看到马斯克为首的硅谷科技主义右翼，妄图通过商业逻辑和资本积累挑战政治权力，前者当然是不堪一击的，因为后者垄断了国家暴力，前者在交锋中没有任何优势，一旦被国家暴力机器威胁，它只能选择投降。此外，马克思主义者们也能看清楚像马斯克这样的精英阶级的嘴脸，他本人是个资本家，以特斯拉如今的规模，马斯克本人已经是资本主义的奴隶，他必须执行资本主义的意志——也就是不断地扩大生产和扩大市场，为此他必须获取政治权力的支持，这也是他投入政圈的动力。不过，尽管他在此后有宣称过要独立建党，剑指共和党80%的基本盘，他的核心诉求注定会使他成为政治圈里的孤家寡人，因为他资本家的嘴脸会暴露得比政治家还要迅速——美国政治尚且会为了民众手里的选票履行部分诺言，而商业资本则会在达成目的后迅速抛弃无产阶级，因此，就算在理想下真的让马斯克成功建立了党，那么这个党也不是代表广大无产阶级利益的，他只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的意志，再加上他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质，将难以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争得一席之地。

因此，无论是马斯克，还是特朗普，都只是在争取各自阶级与团体的利益，其中没有人是真正地把资源投资在国家建设当中，也没有人愿意将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美国广大无产阶级组织起来，教育他们团结形成组织，夺取国家权力。这场啼笑皆非的闹剧，反映出来的不止是美国统治阶级的腐败、还有美帝国主义者的歇斯底里、所谓精英科技资产阶级的软弱本质。最后，这场闹剧最终会如何结尾，美国无产阶级的处境也不会有丝毫的改善，因此这也警示了全世界广大无产阶级，**只有真正地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来武装思想，团结起来建立革命政党，必须以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夺取国家机器，无产阶级才有可能决定自己的命运。**

罗帅宇之死：请睁眼看暗处的“刘翔峰”们！

一年前，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的 28 岁实习医生罗帅宇坠楼身亡。尽管存在诸多疑点，警察仍坚持将事故认定为自杀并结案，搪塞完舆论和亲属后此事不了了之。按理来说这种悲剧在几个月后就会无人问津，但在今年的五六月份却如死灰复燃一般重新成为了热点：罗帅宇母亲发布在社交平台的一部视频和激进的控诉把这个“翻过的一页”重新展现在了群众面前，网民们炸锅了：这难道不是光天化日下的谋杀和官府赤裸裸对凶手的保护？

他的家人和网友列举了很多细节，如他是从一个隔离孔坠亡的，坠落地点离宿舍楼有 7 米远，以及现场的打斗痕迹、床上的破碎镜片、坠楼前罗帅宇向同事发送的两条可疑信息，包括医院领导动用财力打算用 85 万迫使罗父母签署这份不对等保密协议承认自己儿子是自杀等等消息。罗的家人声称，拿回手机和电脑后发现数据都是混乱的，罗大伯找到一家电脑维修数据中心，恢复了数据，发现里面有大量录音和文件，大量数据都指向了湘雅二医院副主任刘翔峰，而刘翔峰本人因为收取高额手术费和无缘由切除病人器官等严重作风问题，已于 2024 年 10 月被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17 年，罚金 42 万。罗母则更拿出了一个大雷：罗医生生前据说留下了 16 斤举报材料！

舆论于是如同开水一般沸腾。网友纷纷指责官方对于凶手的庇护和这种为了维稳堵人嘴的罪行，集体声援罗医生的亲属并要求真相。大家都在讨论着**中国医疗业存在的严重的腐败与器官走私问题**，质疑凭什么刘翔峰这种败类可以如鱼得水一样犯罪，因为按理说医院的任何工作流程都是需要登记和团队的协作，背后没有被曝光出来的势力在哪里？罗医生的不幸本身在中国并不罕见，之所以引发如此强的愤怒，乃是人们对客观存在的医疗乱象的不满只需要一个火星就会被点燃。

但事情发生了转折：官方随后给出了一份公告，里面尽管回避了诸多疑点但还是相当详细地解释了整个事件，并拍下定论“此事为自杀”。相关视频的底下涌现出了大量的人机账号进行支持，让我们可以看出中央已经足够重视此事并且开始动用资源控制舆论。网民众也出现了大量的“倒戈”，曾经被认为是捍卫医疗公正和为自己儿子寻求清白的罗母（和其他亲属）的形象变成了一个直播带货、用和麦卡锡的名单一样吓唬人但实际不存在的“16 斤材料”煽动情绪、吃自己儿子人血馒头的混蛋。更有自称为罗朋友的评论说其家人是吸血鬼家庭，每月将大量罗医生的收入夺走，并逐渐用压力和贫穷导致了

罗医生的自杀。事情的转变是如此出乎意料，很多人都在评论区开始“反思”，说自己信了“阴谋论”的鼓动。

共产主义队伍中很多组织对此的时评也很有意思，但主体都是呈现一边倒指责中共撒谎、为罗家打抱不平的说法。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则会超出单纯“站队”的范畴：这是不够也是片面的，共产主义者对于这类社会事件的评价不能只关注个例或者其双方正确与否，不能和主流社会舆论一样用二极管的思维去搞什么“福尔摩斯大断案”；**共产主义者从个例中进行总结来分析整体，皆以判断当下的社会情绪和政治环境，为推进革命工作进行准备。**

换言之，到底是谁说了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此事之所以能激发如此大的舆论，其背后反应的社会现象的存在到底如何以及我们对此的立场该是什么。刘翔峰这类的黑医生，之所以可以非法营业，就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医疗体系的逐利性质**：医疗不是来救人的，而归根结底是一门生意。为了让生意做的更好，这种由利润驱使的贪欲就会让人不受控制地走非法方式谋取巨额利益。而一个人“坏”不足以做出任何事情，是医院系统内部、顶层体制性的腐败窒息了任何清白的空间，就和墨西哥缉毒警察往往都是毒贩的保护伞一样，在一滩污水中没有人能坚守原则且安全存在下去，要不入伙，要不滚蛋。从之前董小姐的经历中也可以看出，群众对医疗业的乱象的愤怒不是什么阴谋论鼓动的也不是臆想的，这是绝大多数病人切身“体验”过的。

而中国对这种问题的态度是什么呢？明面上，医疗反腐的口号一直没听过；成效上，如同所谓小康社会的烂摊子一样，没有任何实质进展。即使除掉了几个恶霸，新的恶霸又会出现。即使踩死了这个蟑螂，吃饭继续往地上撒渣，那新的蟑螂总会跑出来。在这个**利润体制下任何形式性对医疗乱象的打击都只能触其外皮**，献祭引起民愤的几个“典型”用来断臂自保，但整体的利益仍然高于一切。中国其他的刘翔峰们，现在往往都还在暗处，和那些本应监管他们的“人民代表”们默契地合作着。除非整个经济体制为人服务而不是为钱服务，**医疗行业国有化、国家政权转为无产阶级手中以实现全民监管的医疗体系**，刘俊峰们是野火烧不完的。

看这场舆论风波不知道同志们是否忘了胡鑫宇事件。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中共恰好就不希望我们去通过个体现象讨论背后的社会问题，去调查这个整体的乱象是否存在；**他们想让我们局限于讨论当事人们的谁对谁错，让我们去用断案而不是社会正义的角度看待事件**。他让我们纠结于鞋带能不能吊住尸体，跳楼能不能不戴眼镜。这些讨论会传播如此之广不是因为阴谋论的鼓动，而是中共出尔反尔的撒谎导致自己公信力尽失。

罗亲属的行为的确让人感到匪夷所思。如果存在举报材料，拥有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为何不进行揭发而是只会在直播间重复一句话？直播间既然是为儿子讨回公道，为什么开放打赏功能甚至带货？对此有诸多解释，比如真举报了全家就要被灭口所以不敢、父母不懂如何关打赏等等。但我们必须承认，**之所以网友情绪存在如此激烈的转折，罗家自身行为的问题功不可没**。官方的材料是实打实的，是详细解释的，且他们自己也没有对很多被威胁或者贪腐内幕给出确凿证据，甚至没有隐晦提供了解的渠道。中共恰好抓住了罗家的这个弱点，将他们塑造为阴谋论者，以此引起群众的反感来平息愤怒。

中国政府的这个小伎俩是可耻的。他们装出一副客观公正的调查者的样子，转身对真正的问题视而不见。共产主义者则说，中国医疗体系是吃人的，不仅剥削病人，更剥削其中基层的劳动者如实习医生和护士等；中国的天是黑的，这种腐败不是个例而是体系性，

且不可能由中国政府自己的内部整顿解决。只有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一场根本性的制度变革，才可能为全民提供负担的起的、优质的、足量的医疗资源。

VII

疯狗、白头鹰与波斯猫 伊以冲突简评

6月13日凌晨，伊朗高层所认为的与美国的谈判结束前绝对不会来的打击来了。打击者是以色列。这次打击来得额外“精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总参谋长，多名核科学家遇害，伊朗的部分核设施遭到破坏。伊朗也迅速进行了还击，向以色列发射导弹，造成了一定的伤亡。这一事件无疑是中东局势的一次震动，引发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

狡黠而残忍的疯狗

以色列的不宣而战震惊了全世界，甚至包括美国。应当说，在现在全世界的爱好和平的人、脑子正常的人看来，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政府无疑是一个毫无底线、惨无人道的战争贩子，只需看加沙的局势就知道了。以色列甚至连加沙都不打算留给巴勒斯坦人了，他们打算把200万巴勒斯坦人全部驱赶到与埃及接壤处的一片没有水电的小沙漠上，并且尽其可能拦截着所有人道主义援助。在加沙战火还没有燃尽之际，以色列又迫不及待地对伊朗发动袭击，真可谓穷兵黩武、草菅人命。他们只要为了一己之私，便悍然发动侵略，让战火吞没成千上万个家庭，真不愧为乱咬人的疯狗！

但是，如果仅仅因此便认为，整个犹太民族都是有罪的、所有犹太人都应当斩尽杀绝，乃至转而“认可”希特勒，那就是愚蠢至极了，因为这种思维反而容易被战争贩子们绕进去。只要把持有这种思维的人放到以色列政府的位置上，他们就会发现，自己分不清何为自卫行动、何为侵略行为；分不清何为保家卫国，何为种族灭绝。就连内塔尼亚胡这个战争贩头头，也会为自己的行为洗白：“ Hamas发动了阿克萨洪水行动，因此我们必须剿灭恐怖组织！伊朗拥有任何核设施对以色列都是莫大的危害，因此我们必须防范于未然！”然而，他声称自己在剿灭恐怖组织，手段却比真正的恐怖组织还要残忍；他声称自己在消灭对以色列造成威胁的核设施，但是以色列本身就是中东唯一一个拥核国家。资产阶级的狭隘民族国家观念永远无法完全解释为什么侵略战争是反人类的，他们永远只能做到反被侵略，至于自己侵略别人，完全可以以“保卫国家安全”的借口师出有名。“无产阶级没有祖国”，只有打破狭隘的民族国家观念，以阶级立场处理帝国主义战争，跳出统治阶级二选一支持的死局，揭露所谓战争理由背后赤裸裸的利益和剥削——反战、和平的理想才能真正贯彻下去。

当然，用民族的观点也无法解释以色列如此好战的原因。如果说善于经商的犹太民族天生邪恶、喜好侵略，那么同样善于经商的波斯人为何偏偏屡屡犯怂呢？事实上，随着战争带来的经济萧条，以色列国内的反战声音也是愈演愈烈。而内塔尼亚胡悍然发动新的战端，一方面是想借战争继续缓和国内矛盾；另一方面，这也和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知道，以色列一直充当美国安插在中东的一枚棋子，用来敲打那些因经济实力雄厚而逐渐膨胀的阿拉伯资本集团；但是，随着美国的衰落，维持全球布武的军事基地渐显困难，再加上更关注美国国内事务的“红脖子”所支持的特朗普上台，美国逐渐选择在全球收缩势力。以色列为了不失去美国的援助，必须想办法挑起美国不得不理会的战端，拉美国下水，以继续打垮伊斯兰势力，实现犹太资本集团在中东地区的独霸地位——这才是这条疯狗咬人的真正原因。



警觉而犹疑的波斯猫

相较于以色列一方，伊朗的名声似乎好得多。无论是宣传上长期的反美立场，巴以冲突中对以色列的谴责，还是看着不错的纸面实力，甚至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名称，不少人都把它看成中东对抗以色列乃至美国势力的急先锋。因此不少人之前都寄望于伊朗，甚至鼓吹什么中俄伊“大三角同盟”，毕竟按照最朴素的思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好像只要伊朗出手，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但是，伊朗最近反倒遭受了群嘲：在网友眼里，伊朗是懦弱、怂气又爱打嘴炮的：高喊着“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却只在每次被以色列袭击之后才回敬几波导弹；高喊着“复仇”，升起了好几次复仇的旗帜，但是总是看不到实际的行动；高喊着“反美”，结果一研发核弹就受美国制裁，受了制裁后又停下研发与美国谈判，最后还是谈不拢还得继续研发。结果断断续续研发十几二十年了，既没有核武器，又受了不少制裁。在这次冲突中更是惨不忍睹，军队高层、核心科学家直接被暗杀，而以色列能如此精准地进行斩首行动，全赖伊朗被渗透成了筛子。

摩萨德究竟又什么神通，才能把伊朗渗透成这个样？伊朗又缘何总是装怂，却从不硬气一回，去真正解决问题？这都要说到**伊朗真正的大问题：内部矛盾**。

事实上，伊朗内部矛盾已经达到了很尖锐的地步。政治上，有浓厚神权精英底色的政治寡头集团独揽大权，民选总统不过是摆设，真正的领袖是操盘超30年的独裁者哈梅内伊；实行神权政治；政府变得门阀化、血缘化、世袭化，权力难以共享。经济上，长期遭受制裁，经济低迷，官僚资本对无产阶级盘剥日益严重；军队经商，大量资产被伊斯兰革命卫队控制，挤压世俗派资本利益空间。文化上，神权统治强制民众服从宗教戒律，三年前还爆发过反头巾运动；小族凌大国式的民族矛盾也一定程度上存在；信息管制也较为严重。多重矛盾叠加，对现任政府的不满孕育起来，导致亲美派虽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统治权，其基本盘也越来越大，大量情报会泄露出去也不足为奇了。

也正是因为伊朗内部的腐化与矛盾的激化，伊朗实际上外强中干，完全没有能力真正下血本打一场全面战争。然而，内部矛盾又迫使伊朗不得不设立一个外部的敌人来试图转移国内矛盾，结果只能像一只波斯猫一般，小心翼翼地在嘴炮与复仇的边界游走，用反美来强行压制世俗派。因此，伊朗政府的反美完全不是出自反对霸权主义的本心：它事实上并没有带领民众强撑制裁的勇气，也没有彻底研制出核武器的魄力，更没有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壮志；它不过是一个花言巧语、左右逢源的强盗政权，他与以色列以及美国的矛盾不过是一场狗咬狗的争斗。**它在争斗中取得优势，也不过肥了灯红酒绿的统治阶级，而无产阶级连汤汁也不会得到，还会被驱使着去做霸权的炮灰；它在争斗中取得劣势，就会连保护自己国境的能力都失去，让人民遭受战争的蹂躏，统治阶级却可以轻易地把自己和家人送往欧美享受太平日子。这就是伊朗反美的实质。**

当然，随着以色列步步紧逼，伊朗这次也肯定会有所反击，但反击总归限制在一定的程度之内，不会对以色列造成决定性的损失（此句写于第一日，随后发生的事情证实了发展——编者注），但为了核武器，也绝对不肯简简单单就投靠美国。中东的仗还有得打，中东的人民还有的是罪受。

怎么办？

现在，什叶派之弧的势力，除了伊朗，已经被以色列处理得七七八八；就连伊朗本身也收到不小的打击；埃及与土耳其都内部不稳，难以有所干涉；沙特阿拉伯说到底要与美国亲密合作，更不可能有所摩擦。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以色列的侵略野心就能得逞，决不意味着犹太财团能独步中东，因为一方面美国愈加虚弱；另一方面中东人民反对侵略的斗争与以色列内部无产阶级反对资本把人民绑到战车上的斗争也会愈演愈烈。枪炮或许能夺得暂时的优势，却也因此拖垮了经济、得到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反对。疯狗乱咬人，但人终究会加倍地把疯狗施加的伤害奉还回去！

至于伊朗这个强盗政权，它的左右逢源也不会长久。伊朗的人民早就识破了这个政府独裁统治、官僚资本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本质，反头巾运动的前车之鉴尚在此。只要伊朗政府试图扩大战争规模，无产阶级就应当试图起来，化国际战争为国内战争，化民族矛盾为阶级矛盾，推翻这个神权国家，建立一个属于人的、真正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国度。

中东不断动荡的局势是资本主义一个崭新的危机时代到来的体现。很多人叫嚣三战即将爆发，共产主义者则说还远没有到那个地步；但这绝非岁月静好的时代。伊朗和以色列的共产主义者没有被组织起来也没有坚定的政治路线，使得他们面对这场狗咬狗的死局做不了任何事情。因此**共产主义者必须做好准备**，当战火烧到台海时，我们不该束手就擒。

用“妈妈岗”包装的新 剥削：妇女、家庭与资本主义

5月28日，湖北省人社厅、省总工会、省妇联联合印发《关于推行“妈妈岗”就业模式促进妇女就业的通知》，宣布在全省推行“妈妈岗”就业模式，旨在“促进育儿妇女就业”，“面向的是法定劳动年龄内、需抚养12岁以下子女的女性。岗位普遍工作时间更灵活、管理模式更弹性，方便妈妈们兼顾育儿与工作。”然而围绕着“妈妈岗”能否起到帮助妇女就业、提供的薪资待遇能否满足所需、“妈妈岗”本身的命名是否本身就带有性别歧视的滤镜等等而引发了一系列争论。

“妈妈岗”并非湖北首创，在此之前，上海、广东、四川、山东、哈尔滨等地也有相关的试点，通过先前这些试点的“成果”，我们可以很明确的观察到“妈妈岗”到底给妇女带来了什么。

据《中国新闻周刊》统计，在湖南、山东、广东等地公布的“妈妈岗”用人单位名录中，近三分之一的岗位为家政和清洁工，其余也多集中在客服、缝纫等行业。同时，所谓的“弹性时间”只意味着要求随时待命，企业又往往并不会特意提供工作强度低的岗位，结果就是工作压力往往并不亚于普通员工。而据有关报道，妈妈岗”的时薪只有常规岗位的65%至80%，部分地区的时薪甚至只有11元，而且超过八成岗位不缴社保。

就业岗位狭窄，岗位工作强度丝毫不减，同时薪资待遇大幅下降，这就是妈妈岗为妇女带来的“方便”。然而，问题远不止表面的剥削加重。对于“育儿妇女”，即使她们本人具备正常岗位所需的能力和资质，也希望与其他人共同竞争，企业也只会给他们赶到“妈妈岗”去——又能以“妈妈岗”为名接受政府的财政补贴，又能让妇女干不亚于其他人的活，发的薪资和福利又大幅减少，何乐而不为呢？

可以预见，假设“妈妈岗”模式全面铺开，摆在已生育妇女面前的就业选择就仅剩下了“妈妈岗”。

到这里，可能很多人会说：“政府、妇联他们的本意是好的，是为了帮助‘育儿妇女’再就业的，只不过是执行坏了。”那不妨让我们看看今天摆在妇女面前的就业困境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中共是不是真的“好心办坏事”了。

在当前社会，对女性就业的歧视和偏见随处可见。智联招聘在2025年三八节之际发布

的抽样调查报告显示，职场女性求职被问婚育比例升至 62.5%；15.3% 的女性晋升受婚育影响，男性仅 2.7%；男女平均薪酬差距为 13%，这一差距多年未改善。这种普遍存在的隐性歧视，让不少年轻女性担心，一旦结婚生子就可能被边缘化，甚至被迫放弃职业发展，因此选择不生育。

中共似乎着急了，女性不去和他人结合、生育、组建家庭，我们“稳中向好”的市场和民族复兴大业可怎么办呢？当然，我们在这里需要解释，将妇女赶入家庭远不止是所谓生育率的目的，最主要的乃是将女性隔绝于集体的工作场所，隔绝于被剥削阶级日益愤怒的社会，而被锁进阶级社会最小也是最稳固的原子化单位：家庭。

为了将女性锁进家庭，中国多地出台政策，明确要求企业不得向女性求职者询问婚育状况。然而，这更多的只导致企业在男女求职者在同等情况，甚至女性优于男性求职者时直接不考虑女性求职者。

为什么企业对婚育妇女唯恐避之不及呢？因为法律对于婚育妇女的保护尤为周全，例如带薪产假，各种福利津贴等等。基于“法律和社会的进步”，即使妇女薪资仍然低于男性，种种的“保护”和“福利”也让老板在使唤起廉价劳动力时要掂量掂量。于是拒绝女性求职者和种种偏见屡禁不止。

这可让中共头疼，他一方面要让各个企业老板能够随意使唤起廉价劳动力，一方面又要将妇女赶进家庭，公开的削减带薪产假或其他福利又只会引起广泛的抗议和不满，破坏社会的稳定。但是解决办法总是有的，中国统治阶级在如何伟光正的声称保护人民权益的同时加剧剥削压迫的智慧又一次的展现了出来——这就是妈妈岗。

靠着妈妈岗，老板能在完美的伪善面孔下“便利育儿妇女”，带来更多的超额利润。同时，更多的女性求职者被隔绝于就业市场，被赶进中共描绘的“幸福家庭”。而养活一家人的绝望现实需求又往往把一批育儿妇女赶入“妈妈岗”。同时，所谓的“妈妈岗”的名称和看似有利于妇女的政策还会进一步加剧男女对立，使得本是统一被剥削阶级的同仇敌忾的亲人被生生割裂开来，彼此陷入无休止的倾轧和争吵，最终只有利于高居于社会的统治阶级有恃无恐，分而治之的古老悲剧又一次上演。于是，更多的妇女被禁锢于家庭，同时剩下的少数人被资本主义生产机器碾压，男女被剥削阶级陷于内斗——这就是中共伪善面容后的现实。

可以预见，随着社会矛盾的越发加剧，未来的中共只会使出越来越多的类似“妈妈岗”式手段以更好的剥削无产阶级，巩固自身统治。现有的妈妈岗模式也很有可能会在其他地方进一步推广。那么面对统治阶级的步步紧逼，我们只能坐以待毙吗？

不，我们不会遂他们的心愿，我们会刺穿他们虚伪的面目，让事态朝着他们最为害怕的一面发展：用诱人的糖衣炮弹麻痹我们？那我们便会一次次的揭露其背后的丑恶内在；害怕我们团结、组织起来？那我们便以最快的速度破除他们预先设下的横隔而紧密协作；在资本主义的全球末日下害怕自己的好日子即将结束？那我们劳苦者就凝聚成一股力量以最惊人的力量宣告谁才是社会真正的主人。

从现在开始，为推翻这将我们逼入绝境的旧社会而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新世界而斗争！

洛杉矶抗议——美国两党的政治角力与社会阶层的干预

6月6日，接受特朗普旨意的ICE执法人员在洛杉矶进行逮捕非法移民的突袭行动，引发洛杉矶市民聚集抗议。特朗普火上浇油，以一种强硬姿态，绕过州长权限调动加利福尼亚州的国民警卫队近千人进驻洛杉矶协助镇压抗议。随着时间发酵，抗议者人数增多，加州州长纽森及其民主党同僚们都以此事谴责特朗普的行径，而特朗普以后续再次派遣2000人的国民警卫队回应，并拿700人的海军陆战队作威胁。事件的规模逐渐扩大。6月14日，与进行中的洛杉矶抗议共同出现的是“No Kings”运动，据称有数百万人参与。

社会各个阶层对洛杉矶事件的参与渐渐改变了事件的性质。原本，特朗普为实现自己仅剩可能实现的政治承诺，同时作为对政治对手、美国中央地方体制的一次试探，策划了这次行动。然而，洛杉矶市民勇敢地走上了街头，不允许特朗普就这样毫发无伤地、悄悄地完成一次挑衅，他们将特朗普拉入了洛杉矶的泥潭。民主党政客们，包括加州州长纽森，得以借势抵抗特朗普的攻势。这是一场微型的、非暴力的社会战争。闪电战策略已经破灭，加州骚乱转变为美国两党一次谁也不想让步的政治角力，而那些并未成为统治阶层的公民也关注着战争的局势。

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分歧和利益对立

在2024年大选前，特朗普是共和党中最有竞争力的候选人。尽管原本共和党中有例如佛罗里达州长德桑蒂斯等人希望与特朗普竞争，但都在临近大选后为党派利益放弃了竞选。特朗普在选举前连续受到的起诉和一次刺杀也被猜测与民主党有关。显然，特朗普成为了两党竞争的焦点。在特朗普大选获胜后，民主党遭遇挫折，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特朗普另辟蹊径的路线与民主党的传统路线有着严重的对立。在加州骚乱相关的移民政策上，民主党提倡接纳移民、难民，好似相当包容，而特朗普的共和党强调严厉打击非法移民，以为这样可以保护美国人的工作岗位。两种政策各自代表了两种选民票仓。这代表着两党对立的选举利益，也就代表着两党对立的政治利益。所以共和党在加州执行自己的政策对于另一党来说是相当敏感的。

加利福尼亚州长期是民主党的票仓，是民主党的传统地盘。加州人民较于其他州都更加抵制特朗普。因此，特朗普这次粗鲁的行动有着高度的挑衅意味，洛杉矶局势爆炸式发展也算是在情理之中。在洛杉矶人民走上街头后，州长纽森一类民主党人士继而出面谴责特朗普行为，质疑其行政命令的合法性。几日后，在大选中败选的哈里斯也被搬来抵制特朗普。民主党政客在反对特朗普上展现出了积极的态度，公开与联邦政府叫板。部分中国评论家也深受感染，夸张地描述“美国内战要来了”。这群政客抵抗的勇气来自于他们自己吗？这份勇气又能有多大呢？



市民持续的街头抗议及其作用

2025 年 4 月，特朗普向全球推出对等关税，并在接下来一个月内与中国进行了一场关税数字的竞争。当时，许多学者都认为特朗普这一政策是极为糟糕的。特朗普在美国的政敌同样反对这一政策，但它们并未做出多么积极的行动，多是口头上的谴责。做出实际行打击动的还是一些深受关税影响的企业，他们联合向法院起诉这一政策，在两个月后获胜，只是这时特朗普已经和多国对话，缓和关税了。在提出政治诉求的方面，真正的行动者则是组织起“Hands Off”运动的全美群众。

为什么洛杉矶的事件中，民主党人就敢于发出响亮的声音了呢？正是街头的人群给予他们的勇气。人群的抗议活动可以给予政治家深受支持的感觉，更可能为其带来同情。自从 6 日事发，截至 17 日，抗议活动都没有停止，人数也越来越多，已有数万人的规模。部分人摇旗呐喊，部分人与警察对峙，还有部分人甚至尝试攻击政府机构和执法人员。每天都有人被逮捕。

加州州长纽森曾要求被特朗普调用的国民警卫队拒绝执行指令，也曾将自己粉饰成站在抗议人群一边。但当国民警卫队继续镇压抗议，每天逮捕人群，我们有好些天没有看到纽森先生了！他大概在起草起诉书，只是法院可能要几个月后才给出判决，不过那时国

民警卫队应早已撤出洛杉矶了！甚至，纽森也不能命令洛杉矶市长，后者让洛杉矶警察局协助镇压游行和实行宵禁。这群站在统治高位的政客是不可靠的。洛杉矶街头抗议持续这样久的力量并不来自民主党作靠山，而只来自人民的亢奋热情。

随着政客与市民持续的参与，抗议已经远离了事情的原委。我们可是要知道，事情一开始是联邦政府逮捕非法移民，而现在重点已经转变成抗议特朗普的粗鲁行径、错误政策，乃至变成抗议特朗普的统治。这有力的说明，群众的抗议活动经常地会升级发展，逐渐远离事情原委具体的小事，而将更大的、更主要的矛盾暴露出来，将他们摆在台面上。这些矛盾也决不会是生造的，而常常是积淀已久只是长期被掩埋的。由此可知在中国所谓“少数混入人群的破坏分子操控抗议人群攻击政府”只是一种神话。没有相应的深厚矛盾在，是不能爆发出这样的生命力的。现在，洛杉矶的抗议已经让特朗普是否应该继续统治的问题摆上台面，处理的不好就不得善终。显然，没有持久的抗议是没有这样的效果的。

反对特朗普及其资产阶级政府的战术问题

自从特朗普胜选上台以来，反对特朗普的社会阶层不断地组织起抗议活动，并且有统一集中全国力量的趋势。一个例子是“50501”运动，其名字意为五十个州、五十场集会、一个诉求，在4月的“Hands Off”运动和6月的“No Kings”运动都有参与。这个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为了汇聚社会政治力量，必然要打破地域界限。不仅要打破州界，而且要打破国界。在欧洲部分国家出现了声援美国抗议的集会活动。这说明国际主义从来不是一种幻想，而只是需要我们践行它。

然而，街头抗议活动面对强硬的特朗普政府，就显得收效甚微了。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在这届选举中，掌控了三权分立中的所有三权，总统、国会、法院都是共和党主导。尽管存在法院对特朗普极为过分的举措给出不利判决的情况，但它们在阻止特朗普上令人震惊地低效，全然不似特朗普被起诉那段时间这些机关的积极性。不仅特朗普及其团结经常粗鲁地宣称要出兵严厉镇压抗议、将抗议升级成好似叛国般的罪行，而且他的政治对手也无所作为，即使借助群众声势也只会动嘴皮子。数次发生的大规模抗议，都不曾动摇特朗普政府。美国的国家权力相勾结成了一个明显的问题。

这个问题，非一场彻底的制度变革不可解决。应当赋予群众追究政府责任的权利，应当设立一个常态监督政府作为的机构，应当改变总统、国会、法院相勾结的局面，都导向一个多数人统治的社会。那么多数人统治的社会主义就是必然的选择。

工人阶级的动员与美国的出路

工人阶级应当组织起来，首先就是要组织起有序的抗议游行。街头因集会人头攒动的时候。有些人鲁莽地独立行动，进行无实际意义的投掷、冲撞、袭击，还有些人趁机抢劫商店。这些都会伤害抗议的正当性，并且给予警察借口，实行逮捕行动和宵禁，看似是打击违法犯罪，实际在这过程中扣留了不少抗议人士，并阻止人群集会。不应该将维护秩序的工作拱手让给听命政府的警察机关，应当设立工人阶级、游行人群自己的执行队伍，管控一切不当的攻击、抢劫行为。如此将削弱警察的地位。同时，这种执行队伍随时又可

以作为有效防御警察的武器。

“No Kings”运动呼吁进行非暴力的、合法的活动抗议特朗普，提出的方法之一就是向所属州的参议员提请拒绝不利于人民的预算改革。这在群众没有武装的时期确实是保护群众的有效手段。但我们要清楚的认识到的，我们实在不能再给美国的制度一点点信任了。当美国制度的一切因素就不再解决问题后，群众的武装和国家的武装的冲突就是实现诉求的必经之路，同时这条路的胜利不可避免地直接导向革命。因此，撕破脸皮对抗的心理建设不能松懈，武装准备也不应当停止。

在这里我们并不想说出什么悲观、丧气的话，但从无数次美国群众运动的历史中和教训中不得看出，“帝国主义在其最脆弱的一环优先断开”——换言之在最强的关节最为稳固，不是没有道理的。美帝国主义在全球的垄断、主导地位为其工人阶级提供了相对其他经济被殖民国家更为优质的生活条件，即使这只是利益的九牛一毛；同时美帝国主义依靠自己文化霸主的地位在美国工人阶级内灌输了持久且影响深远的反动意识形态，导致了美国社会运动近年来的原子化、身份政治化或我们今天看到的无政府化。美国先进工人想要组织起那批自认为所谓“中产”和底层如同流氓一般的阶级同胞所需付出的努力，比中国的先进工人要多好几倍。美国工人阶级在现有世界格局下领导有力、有纲领的社会主义运动将是难上加难。在面对反动派的橡皮子弹前，他们还要面对自己领袖的被刺、劫匪和瘾君子在街上的胡作非为与打砸抢。

洛杉矶抗议发生在被统治的社会阶层还算势微的时候，不可避免地沦为两党博弈的舞台。即使美国革命的前途并不乐观，但工人阶级没有戏码吗？他们恰恰是最大的变量。虽然不断地、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面对腐朽的制度无能为力，可能这一次运动也只是成为统治阶层博弈的筹码，但抗议人群真的愤怒不已，掀翻了现有的制度舞台，那不就是美国资产阶级最害怕的时候了吗？两党对抗议活动的干预只是成为资产阶级历史的一个小部分，而美国工人阶级一旦实现对两党、对美国制度的有力干预，将实现美国历史的伟大转折。我们相信他们终能做到，而为他们提供这个物质和思想基础的，将会是中国工人阶级和我们的中国革命：世界工厂的赤化会翻天覆地地改变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届时我们大洋彼岸的同志和阶级同胞们将会发现自己不再孤独，做好战斗的准备。

马列毛大群：南辕北辙的宗派主义者

就在昨日，“大群”那里出了个笑话：以捍卫共产主义、反对机会主义的名义，他们连发了几十篇“干钧棒”文章用最侮辱性、挖苦性的语言对各革命组织大打出手。据说这直接导致了部分革命者和革命组织的信息安全受到威胁。他们批斗的大棒挥舞了不是一天两天，这也并非啥新奇事，但大群的例子值得我们进行研究，今天就来聊聊它在政治上眼高手低、南辕北辙的错误。

为分裂而攻击与为争取而团结

共产主义者的队伍中从来不会有“没有任何分歧”的情况。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雪花，即使在这一秒全中国的共产主义者都共享了一个大脑（当然这并不可能），下一秒也会因为不同的环境和认知出现分歧。世界上没有不会犯错的人——共产主义者接受分歧和批判，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随时学习进步并完善政治路线与组织结构。共产主义思想不是一个宗教或者意识形态而是一门科学，它随时灵活地采取战术达成自己的目的，因此，它**根本不允许所谓“说话会破坏团结”的考虑**。

但如何说，怎么说，则是有区别的。目的为手段赋予正义，但**糟糕的手段，只会让我们离目的越来越远**。大群用最生动的形象展示了自己如何用批判性的文章将写作的对象推向了己的更远——它是出于意气用事的，每个字眼都带着一种仇恨和诅咒，仿佛犯下错误的共产主义者不是自己的同志，而是比资本主义更可恶的敌人。这些人没有耐心，更没有政治领导力；他们写出的文章从落笔的那一刻就不是想要教育有错误思想的革命者，或者给其他革命者提醒这个路线的问题——而是为了让自己爽，向自己不认可的组织和个人“开炮”，在精神上、政治上、组织上让这些非我者身败名裂。他们不是把写作对象当革命者或者人来看的，而是蒙着眼睛无计划输出的。

这些同志就从来没有在行动前三思自己可能的影响，做事更沦为了一种形式而不是目的。“这个思想是错误的，那我的任务就是批判”这个前提在他们脑中定下后，就不经加工直接自由放任成了最后起反作用的骂战小作文。他们不懂如何用最开放的态度去进行教育，更不理解他们认定的“错误思想”的来源是什么；在任何时候共产主义队伍中都会

有不成熟、抄近路的尝试，这是一个客观现实，**革命者要做的不是看到就急眼而是要思考如何做出正确的引导**——这才是真正有能力者要发挥政治领导力所需的。

因为归根结底，**他们就不想起到政治领导的作用，更无意统一、组织起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他们是十几年前老左派的产物，最为宗派的头脑和僵化的信条的墓碑。他们喊着“革命是持久的战斗，需要数十年如一日”的时候，往往藏住了自己意识深层次的另一句话：

“但是我又不想战斗。我不活在今天，我不愿意接受现在的环境，我只想呆在自己最‘纯洁’的舒适区里，捍卫信仰，捍卫偶像，捍卫过去，捍卫我自己。”

宗派主义、山头主义、仕途主义的三位一体

宗派主义的同志们可惜了更深刻的理解没有起到一杆聚集众人于其下的红旗的作用，而是变成了一种**傲慢，一种唯我独革，一种非我者皆敌的心理**。他们幻想着只要自己的立场是正确的，那其他所有手段无论怎么乱搞都是合理的；只要我有革命的理论，就会有革命的运动，我把所有我革命理论需要教育的革命者都骂成了反动派，我这个运动也能从石头里蹦出来。他们是属于那种比自己高想要拽下来，比自己低就看不起的愚蠢。

这些人将任何和自己思维不同的同志都打为反动派，以“错误的思想危害纯洁性罪该万死”为理由掩盖自己的愚笨。一点错误的理论如果修正了路线，通过蝴蝶效应会一点点最后危及到整个政治方向的健康，这没问题；问题是，那提出这个路线的同志也并非一开始主观想要让革命覆灭或者想要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更并非“反动派”。医生给病人治病，不是直接把病人杀了这样就没病了；病人会抵触，但好的医生往往都用最耐心的方法来帮助别人，而不是为了自己方便把病人落在手术台上。

他们立场先行，比如说引用一个东西，都要先去查说这话的人的身份而不是看内容本身；读一个文章，也都是先去看有没有自己的敏感点，然后戴上主观滤镜再去分析任何东西。共产主义者的立场十分重要，就是革命的利益，工人阶级的解放；但他们的立场是捍卫**自己宗派的正确性**，所以闹出了诸多笑话。了解历史不仅没有帮助他们学习，反而在不断加深这种症状。

而这种宗派主义的思维在其他方面则可以完全表现为山头主义的倾向。他们进而不再重视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利益而是**用商业竞争、敌国征战的思想去对待其他共产主义组织**，自己团体，**自己的山寨的利益高于一切**，忠于我远比忠于革命优先。山寨从来没有统一的意图，所以永远不会积极去教育、去接触，只能用**最封闭**的态度对待一切。

而有了山寨就有了官，大群的毛病也很符合我们此前一篇文章中所批判的那种：

组织改组造成成员换血、团结、争取更多革命组织和革命者导致新的干部的加入，都会深刻地伤害仕途主义者的利益。一想到和其他组织的联合，就意味着把不了解也可能不信任自己的他人引入组织中来，意味着自己的地位会受到挑战，意味着要把权力分享给被新人信任的他人，仕途主义者不免会气到发抖。当然，这在形式上可以扮演成“引入落后分子损害队伍的纯洁性”“他们是不可信任的”“我们是意见不统一的”的“客观”理由，再次提醒我们仔细甄别是革命团体的必要课题。那么如何保卫自己的地位呢？只要组织间不融合只业务合作就好了，因为“意见不统一”“只是工作有共同合作的点”。

总之，组织的权利不应该向那些已经去信任别人的人分享。我们应该吸纳那些从一开始就信任我们组织的人进来，这难道不是仕途主义者对于可靠的、意见一致的革命者的理解吗？

革命者必须主动去跳出这种思维，放下这种不健康的交流方式。这不是什么思想斗争而是胡闹，要统一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实现我们时代的革命，需要的是**最开放的讨论、辩论、交流与合作**。各共产主义小组必须将视野从自己的山头里放出来，我们不是一条街上的一溜小吃铺，我们是将汇聚成大江的溪流们。

工人民主的含义与意义

说到工人民主，或者叫社会主义民主、无产阶级民主，大部分人的态度首先都是急于站在反对或者支持的一方从道德角度分析。支持者们将他奉为共产主义“先祖”们定下来的一个神圣信条，引用列宁针对工人民主做出的规定证明只要你没有遵守就是违反教义大逆不道；部分人说工人民主是必要的因为“民主”两个字本身是崇高的，只要不加上这两字就是堕落的所以必须认可工人民主。

反对者们，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官僚论”的支持者们，则更可笑地和资本家、公司高管、政府官员们坐一桌，去说工人阶级多么愚笨和能力不足，打着“客观”的幌子去说独立于基层的文官政府、官僚体系是必须的，而还政于民是灾难性的，想必把这些人放到1917年圣彼得堡的街头，都能去斥责苏维埃是无政府主义分子们的老窝。他们不知道是幻想着自己哪天能通过干革命走上仕途道路，还是被中国政府平日贬低基层劳动者创造力的宣传学入了脑（也许两者都有影响），竟然能希望维持官僚体系、只把资产阶级的高官们换成“效忠”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官僚”就不会出问题，他们在国家机器的白色涂料上面新涂一层红色染料就变成了“好东西”。

而我们说，**工人民主不是道义**，也不能从实用主义角度去短目说有没有必要，更不是骗取工人阶级选票与支持的谎言，不能当成一种累赘用“革命的官僚主义”避免。必须从现实的物质基础、政治立场、工人政权的组织形式等等角度理解工人民主的意义。简单说，工人民主制度的核心在于：

1. 对劳动者的普遍武装以削弱国家机器作为持剑人、暴力手段的存在；
2. 真正的罢免权而不是给官僚们的上访权、建议权，群众真正拥有通过民主会议，随时否决任何一个干部的任何一个命令的权力；（党和国家领导还是人民代表大会领导？）
3. 国有制计划经济，不是办公室僵硬命令往下传而是有机、灵活的经济体系；
4. 从最基层、厂房和街头开始的工人监督或是工人控制；
5. 对机构（包括但不限于政党、政府、工会等）全职工作人员的工资水平与权力进行限制。

对劳动者的普遍武装

就第一条已经足够让一些人担心得睡不着觉了。革命前筹备武器、发动起义，支持印度游击队和我国历史上前辈的战斗时，他们大喊工人阶级需要武装起来。但说到政权建立之后，屁股坐在中南海脑子也就成了中南海的：群众？他们才不懂军事也不懂自己的命运该如何掌握，允许他们有不被政府、不被党监视、命令的武装，那不反了天了！

我们认为，在工人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曾经作为外部镇压机构的旧军队也会立刻废除，取而代之的是劳动者的普遍武装，即建立**人民代表大会直接控制的民兵体系**。这不是指的所谓搞成全民持枪大乱斗的无政府主义图画。在工人国家，武器原则上集中存放于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管理的、具备安全设施的专用仓库。民兵成员需接受严格的政治审查和军事训练，获得授权后，根据具体任务或防御需求，凭委员会指令从仓库领取武器；任务结束后或武器闲置时，应归还仓库。严格禁止私人无理由持枪及在公共场合携带武器。考虑到现代军备的复杂性（如精密电子设备、高价值弹药），必须确保人民代表大会对武装力量的绝对控制，而不是个人能随时开着导弹车回家。

此外，工人国家仍然会保留小规模의常备军，而这部分常备军会因为世界革命的推进而被逐渐解散，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全民皆兵”。旧军队的作用本来就是镇压工人和抢夺资源，现在工人们不需要抢夺，而且需要镇压的阶级，也就是资产阶级是少数人，**作为大多数人的工人不需要额外的机关来镇压他们，工人阶级自己就可以作为镇压机关**。但必须警惕任何形式的“人人持枪”可能带来的社会混乱和安全风险。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大量证据（如美国的多项研究显示枪支拥有率与凶杀率正相关，以及诸多大规模枪击案中，即使现场有持枪者也无法有效阻止悲剧）表明，无节制的枪支流通是公共安全的重大威胁。控枪严格的国家和地区通过立法显著降低暴力死亡率，这证明减少随意流通的枪支、实行有序管理才是遏制暴力的有效路径。

现代军事技术的高度信息化与自动化降低了传统常备军对专业训练的依赖，例如无人机、网络战和人工智能的普及使得部分军事任务可通过技术赋能的平民协作完成。同时，工人国家若通过去中心化的军事技术分配（如开源武器系统），理论上可构建基于社区的防御网络。此外，哪怕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局部战争形态的演变（如混合战争、非对称冲突）更依赖临时的社会动员而非建立大规模常备军，这为民兵提供了战术空间。在工人国家，这种技术趋势与工人民主控制相结合，意味着武器系统的设计、生产（在大型工厂集中进行，但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和管理（集中与有限分散相结合）模式，都应服务于增强工人阶级的整体防御能力，而非个人或小团体的武装。但是，现代高技术战争依赖尖端工业链与专业指挥体系，而民兵组织在资源整合、协同作战、应对高强度系统性对抗方面存在天然劣势。因此，在过渡时期，为了有效抵御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威胁，**工人国家仍需维持一支由工人阶级民主控制、规模适中但高度专业化的革命常备军，其人员主要从训练有素的民兵骨干中选拔，并严格置于人大的监督之下**。这支常备军与广泛的地方民兵力量相结合，构成梯次防御体系。

阶级消亡后的共产主义社会，全民皆兵需以高度社会化生产与自由人联合体为前提。物质极大丰富与生产资料公有化将消除军事垄断的技术基础，自动化防御系统、开源武器平台与分布式制造技术可使军事能力分散于全体劳动者。此时，防御体系与生产体系深度融合，人民通过技术赋能的直接民主参与战略决策，军事职能转化为社会自我管理的延伸。武器管理也将发生根本性变革：武器的生产将如同其他社会产品一样按需、有计划地进行；武器的存放将高度分散化、安全化，可能存在于社区中心或经过认证的劳动

者家中，完全服务于社会共同防御的需要，不再具有任何阶级压迫或私人强制的性质；武器的使用权限将基于社会共同制定的规则和透明的授权机制，彻底消除特权。但该设想依赖两个核心条件：**一是彻底消除内外阶级对抗，使防御不再服务于工人阶级专政；二是技术发展完全突破专业化军事壁垒，实现攻防手段的平民化可控。**而要实现这些，除了在全世界范围内建成工人国家后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外，没有其他选择。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现在的人民代表大会是给中国作为一个无实际用处的“橡皮图章”服务的，虽说宪法将它放于第一位，实践上什么都不敢说。然而，在工人民主制度下，人民代表大会应该成为哪怕是一个最小的村落的政治形式。它应该成为我国的“苏维埃”。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的代表们应当是由全国各个地方普选选出的地方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全部直接对选民负责，且全部随时可以由选民罢免。（不需要等到普选的时候，在平时就可以召开临时会议直接罢免）每个地区的工人和劳动者通过简便的互联网平台，直接选举本地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具体选举方式应该采用比例代表制，选民投票支持心仪的政党名单（而非直接的个人），各党按得票率获得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席位数量，而具体的代表人选则是党派安排的。在选举前，应当有充分的公开活动期：各政党提出候选人名单并展开政策辩论，选民可在线参与讨论、向候选人提问。**要确保多数选民认识、熟悉自己的代表，明确他们代表自己的利益也清楚自己的诉求。**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机构）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由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按人口比例选举的代表组成。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两个核心机构：一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成员由代表大会从其代表中直接选出，负责监督执行委员会（即行政机构）的工作，同时负责立法审议，其职能更偏向于宏观决策和监督；二是执行委员会主席，由全国选民直选产生，作为行政机构的首脑。主席提名各部部长人选（如工业部长、农业部长、外交部长、民族事务部长等），但必须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投票批准，部长才能正式上任。这些由选举产生的部门领导掌握决策权，而执行具体行政任务的政府职员（办事员）则通过公开考试、专业能力认证和服务评价体系选拔晋升，属于专业技术岗位，负责政策落实与日常服务。

现代的互联网技术的存在，可以让代表与选民的联结无比紧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部门会议进程应该实时向相关行业全体工人公布。例如汽车工业政策辩论时，各地汽车厂的工人能同步观看本行业代表的发言。若代表言论违背了选民委托或竞选承诺，工人可立即通过安全验证的民主平台发送质询，甚至可以发起实时罢免动议。**（罢免可以针对任何一个具体的代表或官员，哪怕是行政机构的首脑、人大常务委员会的成员，也可以针对某个党派在人大和政府中的一切代表和官员）**但是，为了防止罢免权被滥用，罢免程序也应该设有防滥用机制：需一定数量选民实名联署并陈述具体理由（如渎职、背叛承诺），便可以在该选区启动辩论和投票。当然，成功罢免需以下条件：投票参与率超过基准，且赞成罢免票达多数，被罢免代表即时离任，快速补选接替。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群众代表及官员的罢免同理，但是仅限本地选民参与。可见，这种罢免权适用于每一位由选举产生的代表和官员。

同时，考虑到某些特殊岗位或情况下，罢免后可能难以立即找到具备同等专业能力或经验的替代人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赋予群众另一项直接权力：通过本地或相应层级的人民代表大会，群众可以随时发起程序，**对任何一位代表或官员发出的具体命令、决策进行否决。**（这种否决的动议和罢免的动议一样，都是可以针对任何一个明确的代表或官员，甚至是整个党派的）这确保了即使不立即撤换其人，其任何违背民意或损害公共利益的具体行动也能被及时阻止，真正将最终决策权牢牢掌握在劳动者手中。此外，为防止上述否决权干扰必要行政效率或遭滥用，否决动议同样需达到一定门槛，涉及专业技术领域或紧急状态时，人民代表大会可启动快速审查机制评估其合理性；同议题短时间内不得重复发起否决。

我们也应该明白，工人民主制度不应该回避现实情况的复杂性，但也应当力求制度简洁高效。在全国性根本问题（宪法、战争和平、经济计划框架）的决定问题上，应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特定情况下的全民公投决定。涉及特定群体或行业的事务，则可以主要征求该群体及相关专家意见，而非要全国的人都参与。此外，**纯粹地方性事务也必须完全由地方自主决策，通过本地在线平台快速征集民意即可。**工人民主制国家也应该通

过技术手段（如 AI 信息分类推送）让选民能聚焦关切领域，降低参与负担。

单单承诺不会背叛革命、不会背刺工人阶级，对一个政府是不够的。只有这个政府按照这种结构民主地组织起来，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不以几个官员的品质和能力为转移，我们的命运才能在自己手中。

革命党、工会和革命政权

如果我们只和大家说，我们主张多党制、议行合一、社会化扶养、指令性计划经济、工人控制等要素。那么大家是想象不出这么一个图景的，甚至还会造成误解，例如他们会质疑：你们既然也支持“党领导一切”，那么“多党制不就是分化力量”？你说“议行合一”，那么是不是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直接统一？

我们则解释，**工人政党是制度的核心驱动力而非管理者**。多个合法工人政党在工厂、社区建立支部，组织学习讨论，传播思想，提出政策纲领，推举优秀党员参选（这些政党非所谓“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党应该通过比例代表制参与人民代表大会。此外，某党的某一党员若当选为部门领导或行政首长，其权力应该仅来源于选举授权，而党的决议对政府无法律强制力。在工人民主制国家中，政党的角色聚焦于政治领导，即教育群众、组织参与、政策创新、监督批评。此外，公共媒体资源（报纸版面、电视频道、网络空间）应该按政党在最近全国选举得票率分配免费时段，确保宣传公平，同时另设公共资源池供工会、合作社等注册团体申请使用。

这和很多宗派主义者倡导的党领导一切完全不同。**他们不是反对中共，而是自己想当中共**，随着带来了自己版本的偏执、傲慢、虚伪和唯我独革。政治上，现在中国革命只需要一个革命共产党而不是一个小组们的联合阵线；但在工人国家层面，则不是革命党反抗资本主义政权的环境了，这个公式也就不再适用。我们不会先下定论社会主义将会是多党制还是一党制，我们说社会主义不管你什么政党，是人民代表大会制，放到以前叫苏维埃，也可以叫工人委员会——具体工人国家到时候会不会有好几个社会主义政党，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实际革命进程将导致的结果，不从水晶球里预测出来，而从我们现在正在奉献的这项事业——中国革命——中诞生。

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并肩战斗过，这不是布尔什维克谦让的结果，而是苏维埃的决定。苏维埃还允许了非法西斯主义但反共的团体继续在首都进行了一定的政治宣传，也不是心地善良，而是客观环境原因。在保障主权和工人民主制度的前提下，工人民主制国家也可以允许非暴力主张的反对派政治团体（包括支持无政府主义、支持资本主义、甚至是支持封建主义的组织）合法存在和宣传。**若其主张获得广泛共鸣，证明的恰恰是工人政党与工人政府本身存在问题，而非所谓“群众容易被煽动”**。如果确实可以让群众满意，群众也不可能被煽动起来；若其煽动暴力或勾结外部颠覆势力，则依法予以取缔。

我们再谈谈工人民主制度下的工会是什么样的。工会作为阶级组织，在革命后应参与社会生产管理，同时应该逐步实现“工会国家化”。这里说的“工会国家化”意味着：工会与国家的关系是过渡性、工具性的，其融合并非强化国家机器，而是推动政治国家的自我消解。**工会应成为列宁所说的“共产主义学校”，并逐步与国家融合**，而工会的完全“国家化”的实现的那一刻，便是无阶级社会实现的时刻。此时工会不再作为对抗性

组织存在，而是转化为**社会自治的细胞**。在后资本主义社会，工会必须兼具双重功能：既参与国家主导的经济建设，又保持相对独立性以捍卫工人权益、制衡官僚特权，过早融合会削弱工人对官僚制的制衡能力。

工人控制与专家、技术人员

对于自由主义者，革命是吊死、驱逐几个让自己不爽的领导人。但对于共产主义者，**革命更重要的不是摧毁了什么，而是建立了什么**。工人国家在建立后不会接受一个“压迫更少”的资本主义金融体系，而是要把所有银行合并成一个银行，并将其国有化，由在银行内的职员组成的联合会以及政府的民选工作人员共同监督和管理它的业务；工人阶级将把所有资本家最大的垄断组织、出版和广告企业收归国有，并由这些企业的工人组成的联合会以及政府的民选工作人员共同监督和管理这些企业。这是为了保障表现（言论，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即保障劳动者表达自己意见，以及组织会议、集会和游行的实际自由，国家要保障出版发行报纸、小册子、书籍及其他一切出版物和有助于组织人民集会的所有设施的所有物质、技术手段，保障这些出版物在全国自由散发；资本主义公司见的商业秘密会被取消，国家垄断对外贸易；新的经济体制将会大幅度缩减工作时间（包括学生在学校的时间），缩减在岗工人，并为非在岗工人提供免费的日用品和教育服务，以便他们在技术迭代过程中学习新技术以适应新工作（而不是像资本主义下那样直接落入“被代替”而找不到新工作的悲惨状况），同时这样的措施也可以让所有工人才有时间认真投入自我事务的管理中去位。

除了上述措施，工人国家将通过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在全社会范围内将生产置于国家和联合会的控制之下，通过民主讨论科学规定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消费积累比例、必需品生产、工具生产、居民收入等，并确定教育、医疗、文化、交通、体育、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入比例（在此过程中，国家必须是唯一的生产原料获取渠道）。对产业纲领和生产计划的反对意见可在工人报刊媒体中反映。这种计划经济的执行可借鉴沃尔玛高效整合供应链的模式，它与其供应商及其整个供应链中的其他供应商实时共享收银交易中的信息，及时地进行补货出售等操作，从而保证多方获利。

他们的运作效率极高且非常像一间完全按照计划整合在一起的公司。但上述的“计划经济”与工人国家的计划经济不同的是，工人国家的经济计划由银行、企业职员联合会、工人联合会及工人政府自下而上民主制定。工人国家利用互联网长期监测需求动态（如运输乘客量、教育形式选择变化），据此制定投入产出计划，并优先发展应对气候灾难的生态产业或社会化家务劳动等关键领域。显然，存在多个“计划中心”（但最终协作形成统一的国家经济计划和政治方向，所有工作场所必须服从，使工人国家的一切企业联合为一个巨大整体），成千上万劳动者参与民主计划，在适当层级组织各产业生产，采用最合适的计划类型；在技术革新过程中，工人会通过学习新技术适应新岗位而非永久失业，劳动者亦可依个人意愿辞职或调配岗位。必须指出的是，大多数产品与其他产品之间不会相互影响。虽然某些产业之间可能有重叠，但我们可以将经济划分为相对独立的不同部分。此外，这些产业会因不同特性而有所不同地集中化。某些可以高度集中，比如公共交通、钢铁生产、矿石开采等，而像食品、衣服、毛巾等消费品就可以比较零散化。这不仅关乎利用先进技术实现计划的可能性——没有生产者与使用者的持续反馈，任何大数据算法都难有效；同时，一些因公共服务属性需维持的低效企业（如景区、机场、火车站、郊区等地方的商店）将获得无条件国家补助以保持运作并确保商品廉价。

显然，存在多个“计划中心”（但最终协作形成统一的国家经济计划和政治方向，所有工作场所必须服从，使工人国家的一切企业联合为一个巨大整体），成千上万劳动者参与民主计划，在适当层级组织各产业生产，采用最合适的计划类型；在技术革新过程中，工人会通过学习新技术适应新岗位而非永久失业，劳动者亦可依个人意愿辞职或调配岗位。

工人国家要让过去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拥有专业知识的专家为自己服务，变成服务于新体制的技术管理人员。如果不去继承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完备的技术和培养出的优秀的技术人员并让他们为革命服务，那么工人革命就会沦为一种乌托邦空想，因为新世界不是从石头缝里出来的，而是从旧世界的废墟中诞生的。工人国家必须给予专家们广泛的活动空间保证他们的创造力与工作热情，并将他们置于政治监管之下，以保证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这一障碍在现代社会有三种抵消趋势。首先，我们必须把权力关系和权力的委托代理与涉及专业知识的权力的运用区分开来。将社会劳动（可支配资源）配置于卫生和社会保障部门的决策权，应当成为并且也能够成为广大公民的神圣权力。只有在这种决策权落于政府部门及国家官僚、大企业或‘市场’手中时，才存在着官僚主义的异化。可是，不可能真的认为，广大群众被剥夺了动手术的能力，这种能力集中到了‘一小撮’外科医生手里。尽管病人有权得悉足够的医疗信息，这种观点却是反对一切科学的无知偏见。

第二，科学和其他专门知识的极端复杂化，非但没有助长专家的权力，反倒决定性地限制了它。权力总归是社会权力，是一些人对于其他人的权力。一位外科医生拥有处置病人的权力。一位能源专家则拥有对于外科医生的权力。而一位建筑师或市镇规划人员则拥有对于能源专家的权力。食物标准的制订者则对所有人拥有权力。不过，每一种类似权力都会由于专门化知识的增长和普及而减小。整个社会拥有至上的权力以决定多少资源应由外科医生、能源专家、市镇规划者、食品标准制订者来处置。随着权力越来越社会化，官僚的权力在缩小而非增长。第三，如果社会保障基本上建立于非货币、非市场机制上，在社会保障事务中必须通过专门渠道获取信息的趋向便会大大减少。倘若社会保证养老金领取者、孕妇、残障人士或大学生可以免费得到某些产品和服务，针对每一个案的繁文缛节就不那么必要了。”

向共产主义过渡时会碰到的问题

即使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工业国家，拥有完备的工业体系与充足的资源，从革命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阶段也不会一帆风顺。劳动的客观社会化与基层社会生活日益加强合作的趋势具有矛盾性质。它们包含着集中化和分散化这两种并行趋势，这些趋势使中介机构不可避免。

一架喷气式飞机上有五十万个部件，它们需要五十万种独立的设计。极其可能的是，要有上万工人在最大限度获取信息的基础上协作（在这个词最广泛的意义上）生产最终产品。同样可能的是，在工厂、办公室或一体化小组，有意识的协作会完全代替管理等级制，这种等级制的逻辑更多地取决于榨取剩余劳动的需要，而非取决于技术约束。

不过，事实仍然是，聚拢所有这些设计和部件需要有固定**担负着中介职能的机构**。难于想象这种中介任务不再是代表着一种社会劳动分工形式的全日制工作。这一分工形式在

一种全新的技术诞生之前是不可能消亡的。这些职业中介机构至少还有可能拥有对于人民的某些权力。生产过程中的事实同样存在于分配、运输、电信、文化、卫生各方面。会不会有这样的医院，其规模较小，与社区条件相适应，从而在病人和医务人员之间不再需要有中介？一间配备有最新设备、有效率、最小规模的医院，也必须有行政人员，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是如此。病人不可能一步入医院就择定他所中意的病床。因此，作为中介的行政人员会拥有对于病人的权力，这仍将是病人遭受虐待的根源。



更为麻烦的是那些**在国家消亡过程中仍然持续存在的各种冲突**：社会、个人和集团利益之间的冲突；本地、地区、国家和国际利益之间的冲突；不同年龄集团之间的冲突；与少数民族利益之间的冲突等。在现实的工人国家阶段，这些冲突不仅持续存在，而且其形态和强度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内外尖锐的阶级斗争所决定。国际资产阶级通过世界市场施加经济压力（如不平等贸易条件、技术封锁），甚至进行间谍破坏和意识形态渗透（宣扬个人主义、消费主义、民族分裂），试图利用和放大工人国家内部的任何分歧或矛盾，动摇工人阶级专政的基础。同时，国内也存在着复杂的斗争：代表旧社会残余的势力会寻求恢复资本主义关系；更关键的是，在工人国家内部，即使存在工人民主，有官僚主义作风的管理者与直接生产者（工人群众）之间，围绕着经济决策权、资源分配、管理效率与透明度，始终存在着一种持续的、需要民主机制来调节和监督的张力或潜在冲突。商品生产与指令性计划的矛盾也是斗争的焦点之一：计划力图根据社会需要分配资源，而商品货币关系则倾向于自发的价值规律运行，这种矛盾在工人国家参与世界市场时尤为尖锐，并可能被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

因此，马克思主义者从未提出过这样的观点，即一个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

会将为全人类带来纯粹的和谐。马克思主义者立足于未来趋势和从历史得出的证据，坚决主张在共产主义社会，**即便是工人阶级专政时期，存在严重的冲突也不需要由任何“特殊机构”（如一个官僚集团）来解决。**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工人国家阶段，解决上述各种冲突（包括那些被阶级斗争复杂化的冲突）的关键，**恰恰在于发展和深化工人民主，使工人阶级能够通过自身的、广泛的、直接的参与来管理和调节社会。**各种不再承担压迫职能的社会组织（例如学校、“扩大的家庭”共同体、社区、工厂委员会、生产者-

消费者会议等）正是工人阶级在实践中锻炼自我管理能力、学习解决冲突（包括由阶级斗争引发的冲突）、抵御官僚主义倾向和资本主义复辟企图的主要场域，这些场域会以群众自己的成长而化解这些冲突，无须外在的“帮助”。这些组织有效运作的前提，正是工人阶级在政治、经济和精神生产资料领域掌握实际权力，能够识别并挫败来自内部（官僚主义蜕变、资本主义残余）和外部（帝国主义颠覆）的威胁，从而确保冲突的解决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而非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突破口。

这里我们举个例子：在某些老旧小区的电梯改造工程中，三楼以上住户的便利需求与一楼居民的采光权、隐私权形成了尖锐对立，而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必然将导致一楼居民承受永久性损失。这个时候，群众可以自发组成调解小组，通过召开民主会议，促使高层住户理解底层居民的特殊诉求，并完善补偿方案的资金筹措等问题，以保障电梯的安装可以尽可能使所有人的利益最大化：如用公益基金补偿一楼住户，并重新设计电梯井道位置以减小采光影响，或是帮助一楼住户迁移到更好的住房中（这一点在国有制计划经济的体制下是容易实现的）。这种多维度协商网络可以将冲突转化为共建的契机，从而**最大化所有人的利益**。

有人会说如此宏伟的蓝图服务不了自身品质低劣的人类。人类许多世纪以来生活在一贯的物质匮乏（自然条件造成的或由社会造成的）之中，生活在生存斗争、竞争以及积累私人财富的驱动之中，自私心在大多数公民、包括劳动者的心目中确实占据很大的位置。但恰恰出于这一原因，**出于其“私人”利益，大多数人完全可能会参加上述形式的自治活动**。还有一点常常会被人忽略，那就是：在工人民主制度建立之前，群众必然已经在长期的、艰苦的革命斗争中锻炼成长。这个**斗争过程本身就是最好的政治教育**，它使群众从分散的个体凝聚成有共同目标、有组织纪律、清楚自身根本利益的“自为”群体。他们不是被动的旁观者，而是通过实践深刻认识到必须掌握自己的命运。既然他们能够付出巨大牺牲去推翻旧制度、建立新社会，那么，担心他们在自己当家作主的新制度下会突然变得对切身相关的公共事务“冷漠”，显然是脱离实际、不合逻辑的可笑观点。

如果每个季度就街区或邻里的供暖举行居民会议，相关家庭真的会无动于衷而不出席吗？他们难道不会关心周遭公共汽车的开通次数或车站的设置吗？工厂的劳动负荷和劳动节奏难道不是和工人密切相关吗？他们对自己在办公室和工厂，以及孩子们在学校吃什么样的盒饭难道会漠不关心吗？对于城市污染、货币收入、住房、食品、假期和公共交通（只要它们尚未免费分配）之类的“一般性”问题他们会持消极态度吗？在维护充分就业的问题上他们会不为所动吗？更进一步，群众若感到自己基本上是陪衬，而真正的决策为人所操纵，他们就会对才刚提及的那些会议兴味索然。群众总是比某些“现实主义”者所确信的更有智慧，他们会迅速识别出哪些会议只有橡皮图章的意义，哪些会议真正让他们发挥作用。前者导致玩世不恭和冷漠，就像竞选诺言不曾兑现或结果与诺言相反时出现的那样。后者则会产生基于自身利益参与自治的良性循环，由此一种普遍的社会责任感会伴随工人民主的成功而滋长起来。

秩序与自由

有人说马克思主义者主张“自由”，所以就认为革命成功就意味着彻底“自由”了，可以“为所欲为”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革命本身就是一个推翻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的过程。**革命的目标不是制造混乱和无序，而是用更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新规则取代压迫性的旧规则**。因此，**革命后的新社会必然也需要秩序**，需要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这种新秩序

下的规则，其目的是保障工人民主的有效运转，保护革命成果和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而不是回到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老路。它是在群众共同参与和同意基础上建立的约束，是维持社会协作、实现集体目标所必需的。

工人民主制度自一建立就在逐渐消亡，因为工人民主赋予了真正的大多数人所享有的民主，在这个秩序和大生产的基础下，日益简化的监督和报告的职能将由大家轮流执行，**等到所有人习惯于逐渐遵守秩序，这些职能也就不会成为少数人的特殊职能。**随着社会主义建设所带来的经济发展，阶级差别也会逐渐缩小，最终消失。在这样的发展下国家的机关也就这样像泡腾片一样逐渐溶解于社会当中，社会也会自然而然发展为无阶级无政治性国家的社会主义社会。

以上的制度是工人国家的健康状态，也就是工人国家的正常状态，如果世界革命受挫、处于内战或是遭遇其他的危机，苏维埃可能就是以监督为主，管理就由额外的工人政府机构来做，而且可能会组建红军，部分自由也可能被限制，如实行临时的一党专政、限制言论自由、组成地方的三人或五人专制小组等。由此可见，**工人国家里形式上的民主程序并不是什么时候都需要的**，在遭遇危机时还是需要一些限制措施来保证工人国家的存亡。

工人民主的形式随着实际情况变化而变化

列宁曾经在分析工人阶级的专政时强调，其**具体形式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随着历史条件和斗争阶段的变化而灵活调整**。他指出，专政的核心任务是对剥削阶级的镇压，但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具有多样性，包括暴力与非暴力、军事与经济、行政与教育等多种形式。这些形式的选择取决于各国革命面临的具体情况，特别是民族特点和社会环境的特殊性。例如，在人口众多、社会结构复杂的东方国家，革命形式必然带有更多特色；即便同一国家，不同时期专政的表现形态也会因斗争形势演变而改变。

工人阶级专政建立后，阶级斗争并未消失，而是转化为新形式。列宁以苏俄实践为例：革命初期曾剥夺资产阶级选举权，但他明确表示这并非所有工人阶级专政的必然要求，而是俄国特定环境的产物。理论上完全可以设想不剥夺资产阶级选举权的专政形式。同样，被称为“红色恐怖”的镇压措施也非专政的本质属性，革命政权最初避免使用恐怖手段，只是在剥削阶级发动大规模反抗后，才被迫采取对应措施。一旦斗争形势缓和，这类非常手段就应取消。1919年俄共党纲明确指出，**对自由的限制仅是暂时性手段**，随着剥削可能性的消失，其必要性将递减直至消亡。

同时，工人民主的实践需把握根本原则：**集中是组织方式，民主是阶级本质**。即便在集中程度最高的内战时期，苏俄仍保留着工人民主的基础机制：苏维埃代表大会作为最高权力机关保障劳动者政治权利，工会通过选举产生干部，党内保留争论刊物，士兵委员会监督军事指挥官，工厂委员会参与管理。这些制度构成工人民主的“生命体征”，其存续与否是判断专政性质的关键标尺。具体可通过四个维度观察：**工人组织的独立性、政治讨论的空间、申诉机制的有效性、基层自治的持续性**。当阶级权力能通过制度渠道更新，群众能有效监督并罢免代表时，工人民主就依然存在。

群众政治水平常被质疑影响民主实践，但历史表明成败关键在阶级力量对比。巴黎公社和西班牙革命的教训显示，工人民主能否巩固取决于是否彻底改造经济基础——**必须同**

时掌握国家机器、没收大资本、改造精神生产资料。巴伐利亚苏维埃因未彻底剥夺容克地主财产而失败，智利工人委员会因未控制国家机器遭政变颠覆，皆证明经济改造不彻底将使民主实践脆弱易损。

“先锋队专政”与“群众专政”本质统一。只要群众掌握不受限制的罢免权，通过言论自由和监督机制确保代表服从集体意志，先锋队的领导就是群众专政的体现。关于这个问题，列宁曾说过：

“……且拿德国人来讲吧。他们的组织包括有群众，一切事情都是由群众发动起来，工人运动已经学会了自动行走，——我想你们一定不会否定这点吧？可是，这百万群众又是怎样善于重视自己‘十来个’有锻炼的政治领袖，怎样坚决拥护这些领袖呵！在国会中往往听到敌党议员讥讽社会党人说：‘好漂亮的民主主义者！你们只是口头上空讲工人阶级运动，实际上出台说话的总是这一班头领。一年又一年，十年又十年，还是这个倍倍尔，还是这个李卜克内西。你们的那些好像是从工人中间选举出来的议员，真是比皇帝任命的官吏还难得调换些哩！’这是企图把‘群众’和‘头领’对立起来，激发群众的劣根性和虚荣心，想以群众破坏对于‘十来个聪明人’的信仰来夺取运动的稳固性和坚强性，——但德国人对于这种蛊惑人心的企图，却只是加以鄙笑而已。德国人的政治思想发展程度和政治经验已足使他们懂得：在现代社会内，若无“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却不是成百成千地产生出来的），久经锻炼，拥有专门训练，受过长期教育而声应气投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强的斗争。……”

因此，**重点在于不让罢免权流于形式。**另外还要明白一点，积极参与选举并有能力成为代表的人一般都是先锋队，而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工人群众的意识水平会逐步和先锋队一致，从而在最终消灭作为阶级或是阶级的自身。但是到阶级真正完全消亡的时候，已经失去了存在意义的“党”的“空壳”可能还会继续存在一段时间，直到人们意识到它们在实际上已经死亡，从而解散这些“空壳”。

最后，我们要注意一点：这里仅仅是说群众有能力在政治上坚持真正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对他们的领导，而不是说任何一个地方的群众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都足够了。**提升群众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不但有必要，而且这也是先锋队的职责之一。**在教育层面，各工人政党要构建可以覆盖全社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体系，通过社区组织、文化组织、党校、媒体等平台开展分众化理论宣讲（但是任何一个工人政党都不能强制群众来听讲，群众必须是自愿来学习的），将党的理论与群众生活实践相结合。在文化层面，工人国家也需推动终身学习体系建设，依托数字技术打造文化资源共享平台，在普及基础文化知识的同时，注重培育辩证思维能力。同时，工人国家也应健全民主参与机制，引导群众在基层治理、企业决策等环节开展民主实践，通过工人民主制度的具体运作深化对工人民主乃至共产主义的本质的理解。工人政党也应该要重视青年群体的政治引领，以自愿原则为基础，培养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只有将理论武装、文化滋养和实践锻炼有机统一，才能使群众在参与国家治理中不断实现自我教育、自我提升。**

因此，**工人民主的形式始终随现实条件动态调整，其底线在于权力必须源于且服务于工人阶级集体意志。**限制自由的措施仅作为特殊时期的暂时手段存在，而民主机制的实质性内容——工人组织的自主性、政治参与的渠道、对权力的监督制衡——构成不可动摇的原则。这种原则的坚定性与形式的灵活性辩证统一，确保专政性质不脱离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

阶级、国家、官僚的本质

“当代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被消灭了，阶级矛盾已经不再是社会政治生活中居于支配地位的主要矛盾。”——观察者网

工人阶级：原来我不是中国人，我的老板也不是剥削者，我九九六也不是被剥削，说出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真是嗑药磕嗨了。

“什么树开什么花，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一些比较浮躁的革命者喊道。他们问工人：“你支不支持现在进行一场共产主义革命？”

工人表露出犹豫、不解、质疑的态度。他们于是拍案：你不是工人了，你是资产阶级分子！

这两种好笑的故事，实际上都反映了对于“阶级”的抽象、扭曲理解。马克思主义者不能跟着性情做事，我们要科学理解阶级概念，可以先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论述。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恩格斯补充：原始公社的历史除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阶级这一概念在现实中常遭到误读。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阶级绝非抽象的概念游戏，而是**现实人类（个人）的社会规定性**。所谓阶级，是指在社会生产关系中处于**相同客观地位、具有共同物质利益**的社会集团，其本质由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决定。在《资本论》初版序言中，马克思特别澄清：

“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要说明一下。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

不过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既然被人格化的经济学范畴可以被投射到现实社会中，那么，阶级社会又是什么呢？阶级社会“是建立在阶级对抗上的社会关系。这不是个人和个人的关系，而是工人和资本家、农民和地主的关系。抹杀这些社会关系，那就是消灭整个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35页）将资本家和工人结为对立的阶级关系，这并非他们的“个人道德选择”的责任，而是他们所身处的社会，是这个以各阶级的敌对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的责任，也是历史的责任。马克思的“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资本论》第1卷，第10页）这一结论，所言正是此意。然而，无论是哪个时代，都有人对这一具有社会科学性的结论作出浅薄的批判。他们认为，重视“阶级”，是因为无视“人性”。当时向马克思加以这类非难的就是德国的作家卡尔·海因岑在至今还存在的这种庸俗论调面前，马克思用如下严厉的批判作出回击：“单独的个人并不‘总是’以他所从属的阶级为转移，这是很‘可能的’；但是这个事实不足以影响阶级斗争，正如少数贵族转到 *tiers état*（第三等级）方面去不足以影响法国革命一样。而且就在这时，这些贵族至少也加入了一定的阶级，即革命阶级——资产阶级。”

要科学地把握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内涵，必须澄清几个常见的认识误区。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阶级”，我们得避开这几个误会：1. 把阶级概念理解为等级（身份）；2. 把阶级理解为“铁板一块”的存在；3. 对阶级概念的经济一元论理解；4. 认为只有阶级才是产生不平等的唯一的因素。接下来我们就详细展开。

阶级、等级、阶层

社会分工的发展影响社会结构，导致了社会中各种关系不可避免的独立，同时每一个人的个人生活（人格的个人）和被纳入分工中的生活（阶级的个人）之间的区别（分裂）日益明显。从个人的立场来看，这种分裂是个人为确保自身生活条件而必须忍受的外在条件。而此时，个人能否确保自身生活条件，虽然与其能否在社会分工的大网中占据一席之地有关，但是，近现代的原则是，职业的选择、地位的实现等这些结果，即是否被纳入社会分工的体系，并不是一出生便被决定的命运，而从根本上是在个人自由的经济社会活动之后被决定的。这是一种在社会分工之下，人格的个人和阶级的个人分裂，以及在偶然的情况下二者再次结合的近现代代社会的原理。而古代的社会原理是，不经过上述手段，个人的社会性被直接确定。这两种原理形成强烈对比。关于这一点，《德意志意识形态》有如下论述：

在古代的等级制社会，“例如，贵族总是贵族，*roturier*（平民）总是 *roturier*，不管他们其他的生活条件如何；这是一种与他们的个性不可分割的品质。有个性的个人与阶级的个人的差别，个人生活条件的偶然性，只是随着那个自身是资产阶级产物的阶级的出现才出现的。只有个人相互之间的竞争和斗争才产生和发展了这种偶然性。因此，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个人似乎要比先前更自由些，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然而事实上，他们当然更不自由，因为他们更加受到物的力量的统治。”

简要说来，一方面，等级是“与他们的个性不可分割的品质”，即在一切由等级决定的社会中，人格的个人和等级的个人是牢固相连的。对个人而言，**生活条件并非偶然，而是必然的，是由“命运”决定的条件。**换句话说，**等级是由法律或传统明确规定的具有**

固定权利义务的社会分层单位，其地位具有世袭性与封闭性。而与此相反，近现代阶级社会的特征是“有个性的个人与阶级的个人的差别，个人生活条件的偶然性”。在此偶然性的背后，另一重要社会原理隐约可见，它正是近现代阶级原理的基础。这个社会原



理就是个人通过竞争获取生活条件。在竞争中，谁胜谁负，谁获得有利条件以保证有利的生活，谁得到不利条件而忍受不利的生活，其结果是偶然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只

有个人相互之间的竞争和斗争才产生和发展了这种偶然性本身。”生活条件的偶然性作为近现代阶级的特征，实际上却正是这种竞争和斗争的不可避免的产物。这种“有个性的个人与偶然的个人之间的差别，不仅是逻辑的差别，而且是历史的事实构造的历史性转换。”也就是说，近现代阶级的诞生意味着社会在各种社会关系不可避免地成为独立因素的历史的进程中，每一个人的个人生活（人格的个人）和被纳入分工中的生活（阶级的个人）之间的区别（分裂）日益明显。这同时也是近现代阶级社会中关于“个人自由”的意识形态的来源。应当指出的是，近现代阶级社会中不同的阶级的“自由”的内容也是不同的。例如，对无产者而言，是“脱离一切的自由”，而对有产者而言，是“支配一切的自由”。

应当指出的是，**这种偶然性意味着人们很难利用他们所认识的必然性（光是想想一般的中小企业的寿命就明白了），而自由恰恰是对必然性的认识和利用。**要理解这一点并不难，在近现代阶级社会中，社会关系被物化，人们的生产和交往活动被商品和货币这些物所支配，导致人的异化。这种情况下，**市场机制让商品和资本成为主导力量，而人反而被这些物所控制。**而如果生产是预先决定的（即在社会层面上存在经济计划），那么人就不再是被物所控制，而是恢复了人对物的控制。

另外，“被统治阶级中的最优秀的人”通过高等教育制度而被选拔出来，作为社会中各种各样的统治机构里的中心人物（精英）被输送至各界。甚至，在统治机构中作为统治阶级的代理人，经受训练、积累业绩、获得信任，在此之上，其中一部分人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支配阶级的一员，为社会所承认。正是“没有财产但精明强干、稳重可靠、有能力和经营知识的人”能够受到这种阶级流动的恩惠这样的事实，的确“巩固了资本本身的统治，扩大了它的基础，使它能够从社会下层不断得到新的力量来补充自己”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写过：“这和中世纪天主教会的情况完全一样，当时天主教会不分阶层，不分出身，不分财产，在人民中间挑选最好的人物来建立其教阶制度，以此作为巩固教会统治和压迫俗人的一个主要手段。一个统治阶级越能把被统治阶级中的最优秀的人物吸收进来，它的统治就越巩固，越险恶。”**阶级存在正是包含了此种意义上的流动性。**不过，只要你是个奴隶，你吃的穿的再好，甚至可以有一天能成为奴隶主，你以及大多数人仍然只能是奴隶，这一点不会改变。任何一个智力健全的人都知道，一个社会没有人生产足够的消费品和劳动工具，社会就无法正常运作，而这就排除了所有人都当奴隶主的情况，即便人人都有能力当奴隶主也不行。

从上面也可以看到，将阶级理解为凝固的“铁板一块”的实体化存在，恰恰遮蔽了阶级关系的历史动态本质。**阶级内部基于生产关系中的具体位置、社会功能或利益诉求差异，必然分化为具有特殊形态的阶层群体，这些阶层既共享根本的阶级属性，又在具体实践中呈现差异化的行动逻辑。**首先，阶级内部始终存在**横向分化的张力**——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地主阶级内部就有世俗领主与教会阶层的权力博弈，现代资产阶级内部既有垄断财阀与中小业主的利益冲突，工人阶级中亦分化出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劳动者、工会组织者与普通工人的生存境遇差异。其次，**纵向流动机制虽未颠覆阶级结构，却持续重塑着阶级构成的具体形态**：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统治阶级通过吸纳被统治集团精英实现权力再生产，这种“结构性流动”既维系了等级制又更新了统治技术。更重要的是，阶级身份的物质基础始终根植于生产关系中的客观位置，但意识形态机制却将特定阶层的形成转化为个人“自由选择”的结果。这种将历史性社会关系自然化的认知方式，正是物化意识在阶级分析中的典型表现。因此，**阶级既非先验的宿命，也非可随意跨越的阶梯，而是在动态社会再生产中不断重构的矛盾关系网络。**

作为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存在的阶级

如果认为阶级只在经济上的存在，那么在政治和文化等现实问题中采取阶级的视角本身就是不可能的。

阶级的产生，源于伴随“不平等的分配（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的分工体制。这种不平等分配是所有制的性质所造成的关键结果之一。需要明确的是，分配本身并不必然由所有制直接、单向地决定；即使在特定历史阶段分配中出现了暂时的、偶然的不平等现象，所有制的作用则在于将这种不平等结构化、常态化，使之成为一种稳固和确定的社会关系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阶级作为一种客观的经济存在，其根本依据在于所有制关系所塑造的社会生产结构。

具体而言，一个真正的阶级具有以下核心特征：**1. 对生产资料的特定关系**：其成员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根本地位由其与关键的物质生产资料（土地、工厂、机器、工具等）的关系决定，其表现为拥有、控制，或是被剥夺这些资料（从而必须依靠出卖劳动力）；**2. 在经济结构中的客观地位**：这种生产资料关系决定了该群体在整个生产、分配和交换过程中扮演的特定、结构化的角色（例如，处于管理决策层面或执行操作层面，在剩余价值分配中占据优势或劣势地位等），这种角色定位是客观的、系统性的；**3. 共同的经济利益**：基于共同的生产资料占有关系（或共同的生产资料被剥夺状态），成员们形成了区别于其他阶级的根本物质利益；**4. 潜在的自为阶级意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该群体的成员可能超越个体的、分散的认知，逐渐认识到其共同的阶级地位和根本利益，并有可能组织起来共同追求这些利益（即从“自在阶级”发展为“自为阶级”）；**5. 社会再生产的稳定性**：阶级地位，特别是优势阶级的地位，通常具有跨代际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通过法律、制度（如特定的财产继承制度）、教育体系和文化实践等多种社会机制得以维系和再生产。若生产资料的实际支配权无法转化为法律保障的、可继承的私有产权（如通过物权法、继承法等确立排他性占有），则其支配地位仅依附于特定的职能或职位，那其权力必然随权力结构变动而瓦解，这显然是不稳定的。只要缺乏独立于职位的法定所有权，就无法建立稳定的代际传承机制，也就不符合阶级再生产的本质逻辑。

在上述这种不平等的分配体制中，利益便发生了分裂。同时，产生了“这些阶级……在每一个这样的人群中分离开来，其中一个阶级统治着其他一切阶级”的基础，也就是说，这必然要产生一个“统治阶级”。对统治阶级来说，如何使自身的阶级私利成为全体利益的代表，这是他们面对的问题。如果不能把阶级私利打造成全体利益，他们就无法鼓吹其统治的正当性。这就是**阶级作为政治存在**的理论根据。如果说阶级作为经济存在的根本原理是实现以阶级私利为目标的所有制，那么阶级作为政治存在的根本原理则是统治的全体性乃至普遍性。精英政治的作用就是把某一阶级的政治私利鼓吹为普遍的政治利益，给自身在政治上的统治赋予正当性。为了使政治上的阶级的存在常态化，就需要一个**国家**。对此，葛兰西在分析现代国家结构时特别指出，即便如大工业家这般强大的经济力量，也往往并不直接组建专属自身的政党。他们更倾向于依托雇主联合会、工业总会等经济组织施加核心影响，同时将具体的政治运作与利益表达，委托给那些在市民社会中更具广泛代表性和组织能力的传统政党。这些政党实质上充当了资产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与代理人，**通过构建文化霸权将特定经济利益转化为普遍的政治诉求**。这恰恰印证了**政治阶层从属于经济阶级的论断**，大工业家无需专属政党，正是其经济统治地位在政治领域通过代理机制得以实现的明证。

关于**文化上的阶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如下相关论述：“**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占有物质生产手段的阶级为了使自身的文化和思想在文化领域也占据统治地位，不断展开和扩大文化斗争，并必须获取胜利。在这里，**文化本身就带上了浓厚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的色彩**，这同时也表明，文化战略与政治战略、经济战略是不同的。但是，过去英国称霸世界海洋之时，英式英语和英国文化也影响着全球文化，以此类推，如今在世界舞台上领导全球物质生产的是美国，于是美式英语和美国文化正在世界文化中大行其道，这是尽人皆知的现象。由此看来，经济、政治领域的支配者在文化领域也会发挥压倒性的作用，这确实是不容否定的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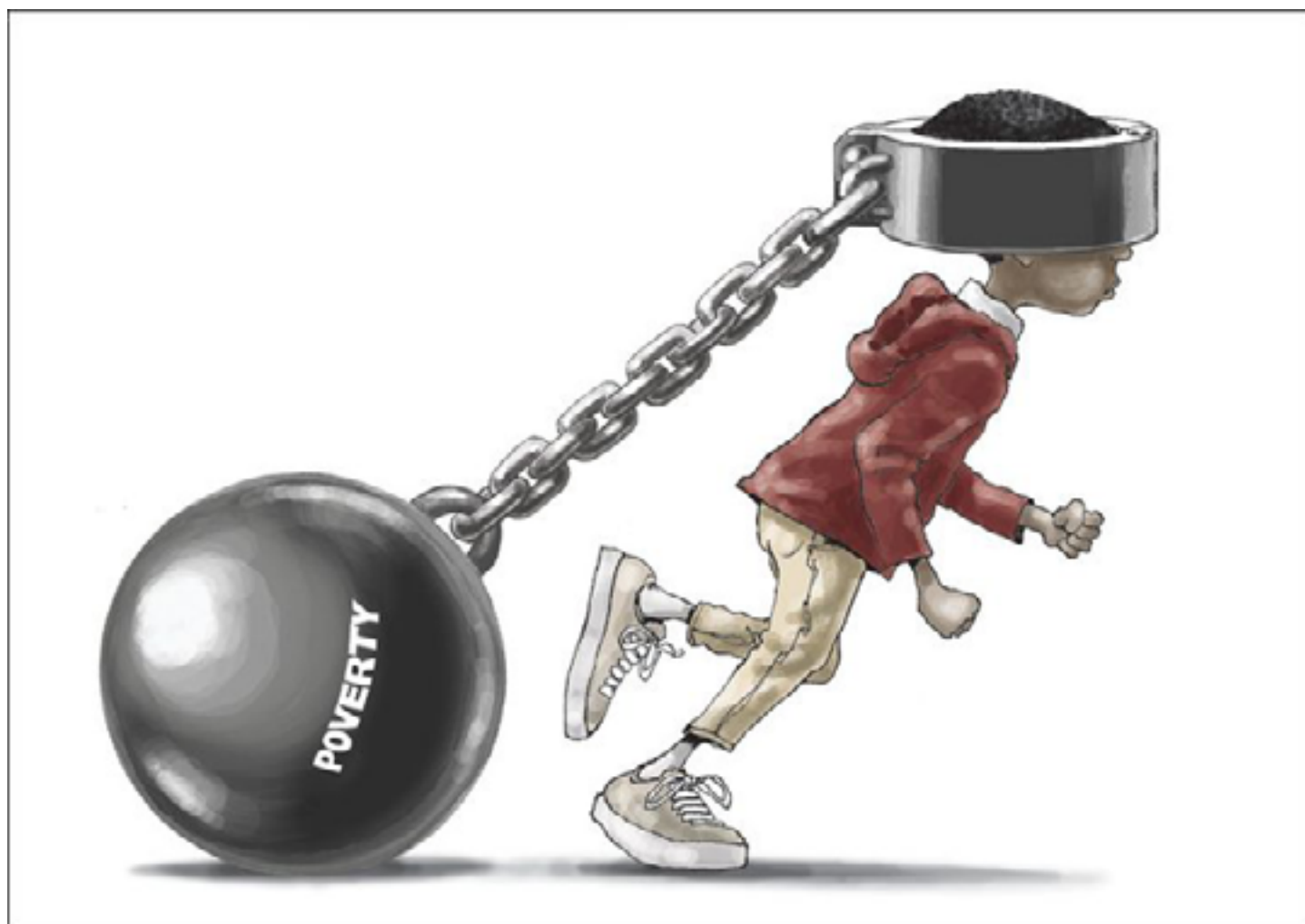
于是，文化精英们敏锐地感受到这一点，这正是他们的精英之处。“我们……已经说明分工是先前历史的主要力量之一，现在，分工也以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的形式出现在统治阶级中间，因为在这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而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思想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谋生的主要泉源），而另一些人对于这些思想和幻想则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他们准备接受这些思想和幻想，因为实际上该阶级的这些代表才是它的积极成员，所以他们很少有时间来编造关于自身的幻想和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3页）可见，控制精神生产资料来巩固整个阶级的文化霸权，是统治阶级中的思想家们实现的，而非整个统治阶级。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经济上的经济是政治上的经济和文化上的阶级存在的基础，如果经济上的阶级消灭了，政治上的阶级和文化上的阶级也会跟着消失。另外，**政治上的阶级和文化上的阶级并非是独立于阶级上的阶级的不同阶级**，它们本身也是那个在经济上的阶级的一个阶层罢了。（例如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官僚就是资产阶级的一个阶层，而非独立于经济上的资产阶级的不同阶级）

国家、官僚、政党

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的出现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即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站在社会之上的力量来抑制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力量的核心在于其垄断性的强制力，即“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资本论》第1卷，第861页），这种力量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而所谓国家的暴力就是被组织、被集中的“直接的暴力”（《资本论》第1卷，第846页）可见，**所谓国家，就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这种力量的维系和运转，必然需要坚实的物质基础，而其物质基础就是“公共事业”**。在人类社会的各个发展阶段，特别是进入阶级社会后，大规模公共事业（水利、道路、防御工事等）因其所需投入巨大、周期漫长且涉及普遍利益，往往超出了单个个体或群体的承担能力，便成为国家存在和发挥作用不可或缺的现实依托。（马克思主义语境中“阶级专政”一词，一般都是在说一个阶级居于统治地位，其他阶级则是处在被统治的地位。制度只是专政的表现，只要在经济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无

论是“现代民主制度”，还是军政府专制独裁，本质上都是资产阶级专政其他阶级的制度)



在此过程中，官僚作为国家机器的具体执行者，其本质并非单纯的组织化或职能分工，而是代表着权力被一个脱离社会生产、专业化且自我固化的职能集团所篡夺。官僚集团通过垄断行政管理和决策权力，形成与社会生产活动相分离的特权阶层，其利益逐渐异化于被统治的多数群体。然而，需要强调的是，无论其特权地位如何固化，官僚集团本身并不构成一个独立于现有社会基础阶级的新阶级。其根源在于，官僚集团并不直接拥有或能建立一种新型的、排他性的、可继承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关系。在阶级社会中，官僚的权力和特权依附于并服务于统治阶级（奴隶主阶级、封建主阶级或资产阶级），是其统治机器的执行者和维护者，其存在依赖于该阶级主导的生产关系。认为只要政治权力垄断本身就等同于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从而构成阶级的观点，混淆了“管理权/支配权”与“所有权”的本质区别。官僚的特权随职位而存在，失去职位则特权也会跟着消失。其“职位继承”依赖于非正式的庇护网络、教育资源垄断等非产权制度（如“官二代”通过特权教育和人脉进入体制），而非直接继承生产资料本身。官僚集团始终是一个寄生的、不稳定的特权阶层，而非一个拥有独立经济基础和历史使命的阶级。这一特征在阶级社会中尤为显著——无论是封建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官僚体系都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再生产，并通过科层制结构强化其统治效能。

值得注意的是，官僚与“普通国家工作人员（也可以说成是‘官员’）”的区别在于，前者享有制度化的特权地位，后者则没有这种地位，其职能不必然包含权力垄断。例如在工人民主制度中，通过工人代表直接选举、随时罢免、薪资与工人持平等措施，确保公职人员（官员和工作人员）无法脱离生产者监督，从而可以防止其蜕变为独立于社会

的官僚集团。简而言之，**官僚一定是官员的一种存在形式，而官员不一定是官僚。**

国家制定法律是以国家暴力的方式，保护了所有制、社会不平等和阶级统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着这样的阐述，即如果某种社会关系是通过暴力或者和平方式变成现实，并且持续下去的话，那么在下一个瞬间其必定会成为“取得社会固定性和不以单纯偶然性与任意性为转移的社会独立性的生产方式”。虽然“在生产过程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的停滞状态中，一种生产方式所以能取得这个形式，只是由于它本身的反复的再生产”，当这样的现实被承认时，“总是要把现状作为法律加以神圣化，并且要把现状的由习惯和传统造成的各种限制，用法律固定下来。”（《资本论》第3卷，第896-897页）可见，法律不会创造现实关系，而是事后去承认现实。而在一个真正的人类合作的社会中，对法律的需要也就消失了。如果你认为这种“共同意志”也是“法律”，那么你可以说在一个真正的人类合作的社会中存在的是非国家制定的“法律”。

税制是国家的基础。所以，“废除捐税的背后就是废除国家”。反过来说，只要国家继续存在，就必须维持税制。马克思认为，**无论是何种捐税制度改革，都无法凌驾于体制的框架之上：**

“直接以资产阶级生产为基础的分配关系，如工资和利润的关系、利润和利息的关系、地租和利润的关系，但是它从来动摇不了这些关系的基础。所有关于捐税的探讨和争论都以肯定这些资产阶级的关系万世长存为前提。甚至取消捐税也只能加速资产阶级所有制及其内部矛盾的发展。”捐税在阶级关系中起着更现实的作用。“捐税能使一些阶级处于特权地位，使另一些阶级负担特别沉重，例如我们在金融贵族统治时期看到的情形就是这样。捐税只会使处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社会中间阶层遭到破产，因为他们的地位使他们不能把捐税的重担转嫁到另一个阶级的身上。每出现一种新税，无产阶级的处境就更恶化一些；取消任何一种旧税都不会提高工资，而只会增加利润。在革命时期，大幅度增加的捐税可以用作打击私有财产的一种方式，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捐税不是促使进一步采取新的革命措施，就是最后又造成旧的资产阶级关系的复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351页，第347-348页，第348页）

阶级社会的结构性矛盾不仅体现在经济剥削和国家压迫上，也深刻反映在社会失序与犯罪现象中。马克思主义认为犯罪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论证了工厂生产扩大、生活无保障和家庭道德教育缺失如何导致工人阶级的堕落与犯罪。他指出**犯罪常是个人对压迫的无效反抗，工人最终转向集体阶级斗争，但阶级仇恨仍会催生个体犯罪。**恩格斯还将犯罪归咎于资产阶级社会的竞争，这种竞争不仅驱使贫穷工人犯罪，也滋生资产阶级的欺诈。马克思引用犯罪统计说明犯罪更是“一般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环境”即“资本的惩罚”的产物，而非特定政治制度的直接结果。

从这一犯罪因果观出发，镇压性治安措施只能抑制犯罪表象，无法根除犯罪根源。要真正消除犯罪，必须彻底改变产生犯罪的社会条件。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历史或文学作品中（如《汉尼拔》描述的极端个案），**那些看似“难以理解”的、超越直接物质需求的犯罪形式（如某些变态心理驱动的犯罪），其深层土壤仍是阶级社会对人性的普遍扭曲、异化以及社会压迫所制造的普遍痛苦与精神危机。**虽然文明进程减少了暴力犯罪的程度与数量（却增加了财产犯罪），但马克思主义坚信，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最终“彻底铲除犯罪的根源”，因为它将满足人的合理需求、消灭阶级不平等、化解个人与社会的根本矛盾。历史的实践也提供了佐证，马克思指出巴黎公社在短暂执政期间就显著消除了犯罪的根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08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此外，我们在这里也要解释一下什么是**政党**。政党是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本质上是特定阶级或集团为实现其根本利益而组织起来的政治先锋队。在阶级社会中，政党并非超然的存在，而是经济基础与阶级矛盾在上层建筑的集中表现，其核心作用在于凝聚阶级力量、制定政治策略、领导群众并领导政治行动，其存在意义始终与阶级斗争的历史任务紧密相连。在政治实践中，政党既是阶级利益的代言人，也是权力争夺与行使的工具。

前资本主义社会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政党。例如在封建制度下，农民与地主的矛盾虽尖锐，但分散的小农经济无法孕育出代表被压迫阶级的全国性政治组织；贵族、教士等统治集团内部虽有派系斗争，但其利益协调更多依赖血缘、教权或军事同盟，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和组织形态。中国古代的“朋党”、欧洲中世纪的教派之争，**本质上仍是统治阶层内部的权力争夺，而非基于阶级意识的政治集团**。现代政党的出现需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带来的阶级明晰化、社会化大生产塑造的组织纪律性，以及印刷术普及促成的意识形态传播，而这些条件在前工业社会均未成熟。

政党有可能会有自己的武装，而政党武装的性质，关键在于其是否掌握合法的暴力垄断权。例如在资产阶级国家框架内，任何政党武装（如纳粹冲锋队）若未经法律授权，本质上仍是非法暴力团体。但当该政党夺取政权后，其武装力量如果转化为“合法暴力组织”，那么政党武装就成为了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因此，政党武装是否属于国家机关，取决于其是否嵌入国家暴力体系并执行阶级统治职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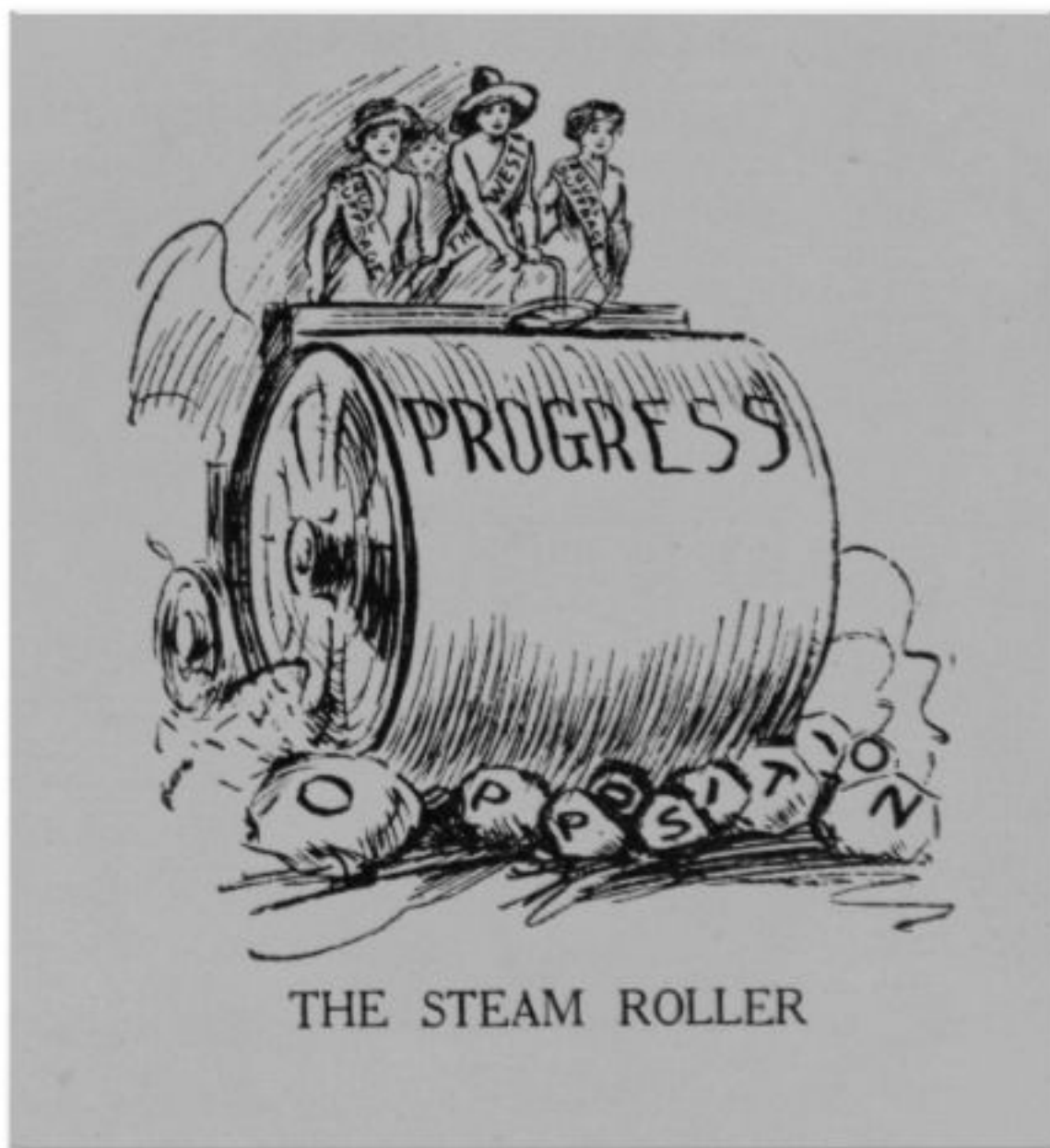
一般来说，执政党仅发挥领导作用，即通过制定纲领和政策指引国家方向（如意识形态塑造、阶级斗争战略），而将具体职能（行政、司法、经济管理）交由相对独立的国家机关执行。这个时候政党属于政治组织，而非国家机器。**若政党直接渗透并控制国家机器的具体职能（如镇压、征税、司法），则其本身可能转化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

作为“根本矛盾”的阶级矛盾

社会生活中制造不平等与差距的根源，绝非仅仅局限于阶级这一种集团属性。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性别、宗教信仰、民族归属、人种划分，甚至地域、年龄等多种社会属性，都能成为社会分化、层级划分和制造差别的依据**。这些属性各自都能在社会中划出界限，形成特定的优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产生复杂多样的不平等现象。因此，如果认为阶级是制造社会不平等的唯一社会属性，这种看法无疑是对阶级概念的一种简化甚至武断的理解，忽略了社会分化原因的多样性。然而，同样需要警惕的是，为了反驳这种将阶级绝对化的错误观点，就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忽视或否定阶级概念揭示的现实，这种矫枉过正的反驳方式，也是一种武断。这两种立场都是片面的。

当我们观察基于各种社会属性产生的广泛社会不平时，一个基本事实是：由阶级差异导致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上的不平等，仅仅是弥漫在整个社会中的无数差别与不平等现象中的一部分。在阶级之外，性别歧视构筑着职场壁垒和家庭分工的不公，宗教信仰差异可能引发排斥甚至冲突，民族或人种背景常常成为系统性偏见、文化压制乃至政治边缘化的理由。这些不平等如同细密的网络，遍布社会各个角落，深刻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和发展机会。然而，在这幅复杂的不平等图景中，**阶级不平等占据着一个特殊且核**

心的位置，其普遍性、结构性和体制性特征尤为突出，使其区别于其他形式的不平等。



阶级不平等之所以具备更强的普遍性和结构刚性，核心在于它与特定社会形态的**根本组织原则和运行逻辑**紧密交织，并从中获得了强大的**合理性或正当性论证**。这正是阶级矛盾成为“根本矛盾”的关键。需要明确的是，阶级社会并非近现代资本主义的专利。古代的等级制社会同样是一种阶级社会，其特点在于**森严的、封闭的、世袭的等级划分（如贵族、平民、农奴）**。在这种社会中，个人的身份、地位、职业和社会交往范围，从出生起就被血缘或神意严格限定，个人能力与努力几乎无法改变这种命运。等级制度本身就是一种以排他性和固定性为原则的阶级结构。在那种环境下，统治阶级（如封建贵族、高级僧侣、种姓上层）同样会利用和强化其他矛盾来维护自身统治和阶级特权。例如，利用宗教信仰的差异来论证统治的神圣性，或利用不同民族、部落间的历史仇恨来分化被统治阶层，阻止他们形成反抗统治阶级的联合力量。通过宣扬“他者”（异教徒、异族人、异种姓）的威胁，将底层民众的不满情绪引向外部，从而掩盖阶级剥削的本质，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古代阶级社会的封闭性，使得这种利用更为直接和赤裸。

近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则呈现出一种“开放的阶级社会”形态。它与古代等级社会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是否存在阶级，而在于阶级划分的依据和运行机制。**资本主义瓦解了那些显性的、基于血缘世袭的封闭性身份壁垒，却建立并巩固了一种新的、更具韧性的、基于经济关系和生产资料占有状况的阶级结构。**资本主义阶级社会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能够与自身标榜的能力主义（绩效原则）、自由竞争以及开放性（形式上的机会平等）等理念并行不悖，甚至可以说，这些理念本身构成了资本主义阶级秩序得以持续运转和自我复制的内在机制。能力主义将个体在经济成就上的差异归因于个人才能与努力程度，为阶级分化提供了“公平竞争”的解释；自由竞争的市场法则，在理论上赋予所有人“平等”的参与机会，却掩盖了竞争起点（由继承的财富、教育资源、社会网络等决定）的巨大差异；形式上的社会开放性（如废除身份限制、允许职业流动），为阶级跃升提供了可能性叙事，但这种流动的难度和概率本身就被既有的阶级结构深刻制约。资本主义的核心原理在现实中**持续不断地再生产着阶级的秩序与不平等**。资本积累的逻辑、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以及对剩余价值的占有，构成了阶级分化的经济基础，而上述意识形态则为其披上了合法化、合理化的外衣。因此，现代社会的阶级不平等，不是旧时代的残留，而是其自身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互动下的必然产物。

近现代社会因此呈现出一种**双重性**：一方面在政治与法律领域高举公民性原理的旗帜，推行形式平等（如普选权、法律人格平等），并以此作为其合法性的基石；另一方面，其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的核心原理又在持续地、不可避免地制造和强化着实质性的阶级不平等。资本主义社会的充分发展，非但没有消除阶级，反而使得阶级之间的经济鸿沟、权力差异和生活机会的分化，比许多前现代社会表现得**更为显著和量化（如巨大的财富差距、精英阶层的壁垒化）**。因此，**同样是社会不平等，阶级不平等与其他形式的不平等（如性别、种族、宗教歧视等）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

正是这种内生于社会经济结构核心的地位，使得阶级矛盾成为社会矛盾体系中的“根本矛盾”。其“根本性”体现在多个相互关联的层面。

阶级关系构成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基础，特别是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一个人的经济地位，从根本上决定了其获取关键资源（如教育、医疗、优质信息、政治影响力）的能力。这种基础性的阶级位置，深刻影响着个体在性别、种族、宗教等其他社会关系维度中所处的位置和可能遭遇的具体困境。一个底层工人阶级女性所面临的性别歧视，其表现形式和解决难度，必然与她所属的阶级紧密相关，并常常被资本力量利用（例如，通过压低女性劳动力价格来获取更高利润）。阶级结构为其他形式的不平等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和强化其影响的框架。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的核心机制（市场、竞争、私有产权、利润驱动）本身就是一个强大的阶级分化与强化机器。**它系统性地将社会财富、权力和机会向上层阶级集中，并倾向于将经济危机、社会风险的成本转嫁给下层阶级。**这种结构性的力量不断巩固着阶级的界限和差距。相比之下，其他社会矛盾的强化虽然也有其自身逻辑（如文化传统、特定偏见），但其系统性、自发性与阶级矛盾内在的、由经济基础驱动的强化机制相比，往往相对较弱。

再者，**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和利益，常常会有意识地利用甚至煽动其他社会矛盾。这一点在古今阶级社会中都存在，只是方式不同。**在资本主义时代，民族主义情绪、种族仇恨、宗教冲突、性别对立等，都可能被用来转移公众对阶级剥削的注意力，分化

工人阶级及其他被压迫群体，阻止他们形成统一的阶级意识和有效的反抗力量。历史上和现实中大量事例证明，制造或加剧族群、宗教或性别间的对立，是瓦解劳动者团结、压低整体工资水平、维护资本统治的有效策略。因此，其他社会矛盾在阶级社会里的激化，常常并非独立存在，而是可能被阶级统治的策略所吸纳和利用，服务于维护阶级结构的根本目的。

最后，也是论证阶级矛盾“根本性”的最核心逻辑在于其**消亡的次序性与前提性**。只要阶级社会（其核心是特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及由此产生的剥削关系）依然存在，作为其运行必然产物的阶级矛盾就必然存在。在此前提下，试图在阶级矛盾消亡之前就彻底、永久性地消除其他社会矛盾（如深层的性别压迫、制度性的种族歧视），面临着**结构性的障碍**。实质性地消除这些不平等需要巨大的社会资源投入和深层的权力结构变革。但在阶级社会里，资源的分配权和制度变革的主导权高度集中于统治阶级，他们基于维护自身阶级利益（如利润率、竞争力）的考量，必然倾向于限制真正触及根本的再分配与权力重构。即使在某些领域立法确立了平等权利，但在缺乏根本性经济权力和社会结构变革的支撑下，这些权利在实践中容易流于形式或受到侵蚀。更关键的是，只要阶级统治存在，利用其他矛盾来分化民众、转移视线、维护统治的动机和手段就始终存在。**即使某些矛盾在特定时期有所缓和，一旦阶级矛盾激化或统治需要，它们仍可能被重新激活和利用。附着于特定生产方式（如资本主义对特定性别、种族劳动力的定位与剥削）的其他不平等形式，其根基也在于阶级结构本身。**因此，阶级矛盾的根本解决，即超越阶级社会本身，构成了其他社会矛盾最终得以彻底解决的前提条件。在阶级矛盾依然存在并发挥基础性作用的情况下，其他矛盾的最终消亡难以实现，因为它们赖以存在的深层社会框架（阶级结构）依然在持续运转并施加影响。这就是理解阶级矛盾作为“根本矛盾”的核心逻辑所在。

论阶级力量对比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曾说过：“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特殊的生产居于支配地位，从而这种生产关系分配其他生产关系的等级和影响。这种生产关系是一个总光源，浸渍了其他所有的颜色并模糊了它们的特殊性；它是一个特殊的以太，决定了每一个已经在其中物质化的存在的比重。”这个“总光源”并非简单表现为某一阶级占据人口多数或掌握暴力机器，而是体现为其生产逻辑能否成为整个社会运作的**支配性生产目的**，并考察这一目的如何渗透社会生产的全部领域，使其他阶级和其他生产关系的活动最终服务于该逻辑的再生产。而对阶级力量对比的分析，就是分析不同阶级围绕“总光源”展开的斗争。

判断某一阶级在特定领域是否“占优势”，需观察这些内容：**经济层面看其是否主导剩余产品的循环方向；政治层面看制度设计是否系统性地保障其统治需求优先满足；意识形态层面看其价值观能否被建构为社会的普遍伦理框架。**当然我们可以看到的是，阶级力量之间的对比永远具有历史相对性，各阶级力量始终处于此消彼长的动态重组中。

经济领域的阶级优势表现为对剩余产品的获取方式与使用方向的掌控，其稳固性取决于该阶级能否将自身再生产逻辑普遍化为社会再生产的轴心。当某一阶级能迫使社会剩余主要流向其主导的生产领域，并按照其阶级利益决定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时，该阶级便获得经济支配权。封建社会中的地主阶级的优势体现为地租形态的剩余产品主要被用于奢侈品消费、军事扩张或宗教捐赠，这些支出必然强化等级制人身依附关系，而会抑制商

品生产范围的扩展。例如，14世纪佛罗伦萨毛纺织业中，尽管出现包买商制度，但佛罗伦萨毛纺织业的利润多用于高利贷资本输出（如向英王爱德华三世放贷），而非用于资本积累以扩大纺织业的再生产。可见，封建社会中的商人行会和手工业工厂并无法直接扭转以**剥削者直接消费为核心**的生产目的，从而被封建主义的逻辑支配。

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的经济优势表现为剩余产品大规模转化为产业资本，不断投入技术革新与市场开拓，迫使农业、手工业等非资本主义部门服从价值规律。这里我们举个资本主义下的农奴制的例子：如果农奴们生产的产品被封建主当成商品，拿去满足市场的需要，其市场也是以准备交换为出发点（虽然有一部分产品会被农奴或是封建主直接消费），那么这种**“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在实际上就是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浸渍并模糊了‘封建主义’的特殊性”**，并使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处于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支配的情况。同时，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框架内无法获得实质性经济优势，因其既不能决定剩余价值分配（工资仅够劳动力再生产），也不能支配投资方向（工厂关闭或转移不受工人意志左右），而零星工人合作社的存在并无法改变整体的资本增值逻辑。

政治领域的阶级优势反映于**国家机器对经济支配结构的制度化维护**。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通过法律体系、税收政策、暴力机关等装置，将经济优势转化为稳定的权力架构。判断政治优势的关键在于：**制度是否系统性排除被统治阶级的核心诉求进入决策程序？是否将维护支配性生产目的设定为不可动摇的宪政原则？**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依赖于将土地所有权与司法权、军事权捆绑，使农民反抗被碎片化地压制于庄园法庭层面。资产阶级政治优势的典型形态是代议制民主，它通过财产资格限制、选区划分机制、行政权力为官僚所有等手段，让工人阶级不仅在经济上是从属地位，在政治上也是无权状态。即使是普选权扩大也不可能消除这种优势，拥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并拥有足够的财富的人可以垄断媒体以宣传自己，同时可以雇佣专家以协助自己赢得选举，而多数人显然不存在这样的条件，因而导致资产阶级或是其代表垄断了候选人的名额。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政治框架内虽然可以争取局部改良（如劳动法、增加工资、缩减工时等），但无法突破一个根本限制：**资产阶级国家绝不会允许政治权力被用于彻底废除雇佣劳动制**。这就是资产阶级在政治方面的阶级优势的体现。

精神生产资料的争夺是阶级优势最隐蔽也最深刻的战场。**统治阶级需要将被统治者的服从内化为道德自觉，将其特殊利益表述为自然秩序或普遍福祉**。精神生产资料的掌控者通过历史叙事、美学标准、价值构建等意识形态，保证社会再生产的正常运行。统治阶级内部的知识分子承担着将阶级利益“翻译”为“常识”的关键职能，但精神生产领域也存在裂隙：被统治阶级的文化反抗可能利用宗教异端、民间艺术、口述历史、民间的价值重构等载体保存批判火种，让精神生产资料和经济基础与国家一样，成为阶级斗争的场所。由于这一段的具体内容在前文已有，因而不赘述。

因此，特定社会形态中的**“总光源”并非静止的“结构”，而是不断的动态斗争的场域**。它通过经济剩余循环的掌控、政治制度的系统性偏袒以及意识形态“常识”的塑造，全方位地确立并维系某一阶级，即统治阶级的根本优势。这种优势的本质，在于将特定阶级的再生产逻辑普遍化为整个社会的运作轴心，使其他阶级和关系最终服务于其存续。然而，这种支配绝非铁板一块，阶级力量对比的不断变化，始终是改变“总光源”根基的潜在力量。阶级力量对比的消长，决定着哪一种生产关系能够浸渍整个社会，而这“总光源”本身，也终将在新的阶级力量格局中被新的社会关系所取代。

谁控制“常识”？——论精神生产资料与阶级秩序

资产阶级的统治绝非是单纯通过暴力的手段维持的，更不只存在于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层面。为了创造一个适合资本主义平稳运行的环境而不是处在崩溃边缘的战场，资本主义越来越依靠与通过意识形态与精神文化等手段塑造出一种思想上的“霸权”，以充满偏见的“常识”正当化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与不公，磨灭工人阶级的反抗意识。

家庭、媒体、宗教场所、工会、文化机构（如博物馆、图书馆等）、学术机构（大学、研究机构、学校等）、政党、专业协会（如律师协会、医生协会等）、社区组织（邻里协会、地方团体等）、公共集会、法律机构（民间调解部分）这些**非国家机构**的社会机构都是构成**精神生产资料**的一部分，而其精神生产的内容最终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另外，**精神生产资料的物质基础是生产关系本身，而非国家结构，而且其运作本质上也是生产关系的反映，而非独立自主的结构。而且，人也并非只是意识形态的被动执行者**，随着客观物质环境的变动，原本作为“被动的臣民”的主体也可能会变得“桀骜不驯”，从而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精神生产资料的掌控与争夺始终呈现动态博弈的特征。这种动态性体现在不同阶级、阶层、利益集团对意识形态主导权的反复拉锯中。统治阶级中的思想家们（也就是反映在文化上的统治阶级）通过控制这些机构来巩固整个阶级的文化霸权，但被统治群体则可能利用同一套机制进行抵抗或重构。这种争夺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呈现多重主体参与的复杂博弈。**

以**14世纪佛罗伦萨梳毛工人起义（1378年）**为例，当时的行会组织（如羊毛业行会，另外，欧洲中世纪晚期的城市行会不仅是经济组织，还承担着民兵训练、慈善救济和戏剧表演功能）长期被大商人垄断，排斥底层工人。梳毛工通过街头集会、占领市政厅并要求组建独立行会，迫使当局短暂承认其政治权利。尽管起义最终失败，但行会制度首次被底层群体改造为阶级抗争的工具。这种对精神生产资料的创造性运用，使得原本维护封建行会制度的机构转变为阶级斗争的战场之一。

作为社会再生产的核心工具，精神生产资料通过日常化的运作将生产关系自然化。在古罗马奴隶制社会中，家庭祭祀活动、角斗士表演和广场辩论共同构成了维护奴隶主权威的意识形态网络。家长通过家庭祭祀仪式强化父权权威，角斗场表演将暴力统治美学化，

广场辩论则将公民权严格限定在自由民阶层。这些实践将奴隶制的剥削关系转化为“自然秩序”，使奴隶群体将自身处境理解为神意安排。但公元前1世纪的斯巴达克斯起义表明，角斗士训练营这个原本用于规训奴隶的场所，反而成为起义者军事训练和组织动员的基地，说明再生产工具本身包含着被颠覆的可能。

在古代中国的秦汉时期，乡约组织通过道德评议、互助借贷和婚丧仪典，将法家秩序和儒家伦理渗透到基层社会。唐代敦煌文书显示，当地社邑组织不仅管理佛事活动，还承担水利分配、纠纷调解等职能，形成独立于官府的地方自治体系。明代的东林书院网络通过讲学活动传播政治理念，其成员利用科举同年关系构建跨地域联盟，最终发展成对抗宦官集团的士大夫集团。这些案例证明，即便在中央集权体制下，非官方的精神生产资料仍保持着相对自主的运作空间。

此外，在日本江户时代，其村落共同体通过“讲”组织（如**富士讲**、伊势讲）进行宗教活动，这些团体逐渐演变为农产品流通网络和信贷机构。当19世纪幕府推行货币地租改革时，关东农民也通过借富士讲网络串联，发起反对货币地租的集体请愿（如**甲斐国农民一揆**），最终迫使幕府暂缓征税改革，迫使当局调整税收政策。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生产资料则呈现出全球化特征，但并未改变其压迫和剥削的本质。跨国科技公司的开放源代码运动看似打破知识垄断，实则通过众包模式将开发者纳入资本积累体系；印度班加罗尔的IT培训机构表面传授技术知识，实质是为全球价值链培养廉价劳动力；中国电商平台的用户评价系统本应反映消费者意见，却演变为商家刷单控评的战场。这些**新形态的精神生产资料控制手段，依然服务于生产关系的再生产需求**。当前数字技术的发展为精神生产资料争夺开辟了新场域。社交媒体算法推荐机制成为意识形态斗争新焦点，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特性被同时用于金融投机和社会实验，在线教育平台的知识传播日益卷入文化领导权争夺。2020年美国“黑命贵”运动中，抗议者通过TikTok短视频突破传统媒体封锁，组织全球声援网络，这种技术赋能的社会动员重新定义了精神生产资料的范围。

历史经验表明，精神生产资料的争夺存在周期性规律。当物质生产领域发生重大变革时，其配套的精神生产资料的控制效能会逐渐减弱。19世纪英国宪章运动期间，工人阶级以《北极星报》为喉舌，依托**宪章派教堂**和**互助合作社**，构建起独立于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20世纪30年代美国工会组织利用广播节目和工人戏剧，成功短暂地突破了资本家对传统媒体的垄断。这些斗争都发生在旧生产关系难以维系的历史节点，印证了精神生产资料变革与社会经济转型的深层关联。

可见，精神生产资料的演变轨迹始终与生产方式保持辩证关系。例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推动宗教改革，但其物质基础是**地中海贸易网络重组带来的城市经济勃兴**。这提醒我们，**精神生产资料的动态博弈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的生产关系来理解，其变革既是社会转型的表征，也是推动转型的重要力量。**

“自由意志”的幻觉

有人可能会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生存和劳动的工人们客观上起到了维护资本主义的作用，因此他们在客观上一直在反革命，这是反社会主义的行为”；“工人们可以选择服从，也可以选择死亡表示反抗，因为人总是有选择，不存在‘被逼的’，因为人不是

动物，人可以战胜生物本能”。这里我们将反驳这两个命题，以进一步正确认识意识形态。

第一个命题的错误在于混淆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客观强制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明确指出：“劳动力的卖者，和任何别的商品的卖者一样，实现劳动力的交换价值而让渡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工人为生存被迫出卖劳动力，这种结构性暴力使他们的劳动客观上再生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绝不构成什么“反革命行为”，正如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指出，统治阶级通过“市民社会”（即精神生产资料）建立文化霸权，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自然化”为“永恒秩序”。**工人对生存需求的服从，正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机器制造的“常识”，而非主观政治选择。**

第二个命题的荒谬性首先暴露于其逻辑悖论：若“人不是动物”意味着必须否定生物本能，则“选择生存”反而成了动物性行为，而“选择死亡”才是“人”的证明。然而，这种二元对立甚至在纯粹形式逻辑层面也已自相矛盾。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表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可见，**自由意志也需要以生命存续为前提，以死亡为代价的“反抗”恰恰取消了自由意志的物质载体，那这算什么“自由”呢？**当资本主义将基本生存条件异化为必须通过雇佣劳动换取的商品时，“服从或死亡”的“选择”实质是暴力下的形式自由。因此，葛兰西揭示的“无人相信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却仍在正常运行”的意识形态机制在此凸显：工人明知剥削存在，并嘲笑所谓“努力工作就能成功”的鸡汤，但仍将工厂制度视为“自然的空气”，这种“实践意识的矛盾”恰恰证伪了抽象的“自由意志”的存在。资本主义通过教育、法律等机构将“服从”建构为“道德义务”，使工人即便识破意识形态谎言，仍不得不“假装相信”。这种结构性暴力远非个人意志所能对抗。当你只是为了吃饭，而在一天内做两份甚至三份工作，每天进行十几个小时的高强度工作后，你还能谈论什么“人可以战胜生物本能”么？因此，问题的真正解决在于采取集体的阶级斗争的“武器的批判”打碎资本主义。

顺从不自觉的习得

首先我们要明白，生产关系在**个体实践层面**表现为“政治权力”的分配，即**人们在社会分工中的位置直接决定了其可行使或被迫服从的权威关系**。这种权力不仅体现在宏观制度中，更通过日常互动、行为规范与身份认同渗透到个体生存的细节，使经济角色与政治支配密不可分。这种渗透往往通过精神生产资料的运作实现——学校、宗族祠堂、行会组织等机构以知识传授、道德训诫、技艺传承为载体，将统治阶层的价值观转化为被广泛接受的“常识”。

以封建社会为例，农奴依附于领主土地，其耕种、婚配甚至迁徙均需获得领主许可。劳役地租的缴纳不仅是经济义务，更是对领主司法权、军事权的承认。农奴在田间弯腰收割的动作本身，便是对“人身依附”这一政治权力结构的身体化实践。中世纪欧洲修道院推行的“七艺”教育体系，通过语法、逻辑、修辞等课程塑造知识分子的思维模式，使他们对“上帝—教会—领主”的等级秩序产生理性认同。这种精神生产资料的垄断，让农奴将普遍文盲的状态视为“上帝安排的智慧分工”。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表面拥有“自由”签订劳动合同的权利，但流水线上的计时器、绩效指标与监控系统将资本家的支配权具象化为分钟级的劳动控制。工人对加班与否的“自愿选择”，实则是失业恐惧与生存压力构成的隐形强制，其每一次服从生产节奏的

举动都在微观层面再生产着资本的政治权威。现代企业推行的“企业文化培训”也构成了精神生产资料，现代企业通过“奋斗者协议”“使命宣言”等话语体系（如亚马逊领导力准则中“Ownership”条款），将资本增值逻辑包装为个人奋斗叙事，使工人将超额劳动误解为自我实现的途径。

在邦统制生产方式下，中央集权通过水利工程等公共劳动组织，将农民纳入官僚系统的直接管理。个体参与挖渠筑坝时，不仅贡献劳动力，更通过集体协作强化对专制君权的认同。疏浚河道的行为既是经济生产，也是向皇权缴付“政治忠诚”的仪式。清代保甲制要求每户悬挂门牌登记家庭成员，并依托乡约宣讲将户籍管控与“忠孝”伦理结合，使农民在日常出入家门时都重复确认自身在精神生产资料体系中的位置。秦代“以吏为师”政策更直接让基层官吏兼任法律讲解员和道德教师，在陕西云梦出土的秦简《为吏之道》中，明确要求官吏既要精通律令又要传播“忠孝”观念。

这些例子表明，**生产关系绝非抽象的经济关系，它总是通过具体的权力操作将人固定在等级秩序中：谁决定劳动内容、谁掌控劳动成果、谁制定劳动规则。**（当然，微观权力关系始终锚定于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一核心，因为它是作为作为再生产工具出现的）精神生产资料的独特之处在于，它通过知识分类（如科举考试的“四书五经”范围）、记忆塑造（如企业年会的“司歌合唱”）、空间规训（如互联网公司的开放式办公布局）等方式，将支配关系植入个体的认知结构和情感反应。19世纪上海租界的巡捕房不仅维持治安，还通过出版《点石斋画报》将巡捕暴力美化为“秩序维护”，这种视觉化叙事比法律条文更能潜移默化地重构人们对权力的认知。像是现代算法推荐系统看似提供个性化信息服务，实则依据用户数据画像进行意识形态定向投送。算法推荐系统依据用户画像差异化灌输意识形态（如劳工群体高频接收“宿命论”内容，精英群体更多获取“风险控制”叙事），使得阶级认知区隔得以再生产。这种精神生产资料的差异化供给，在微观层面持续巩固着阶级认知的区隔。

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的必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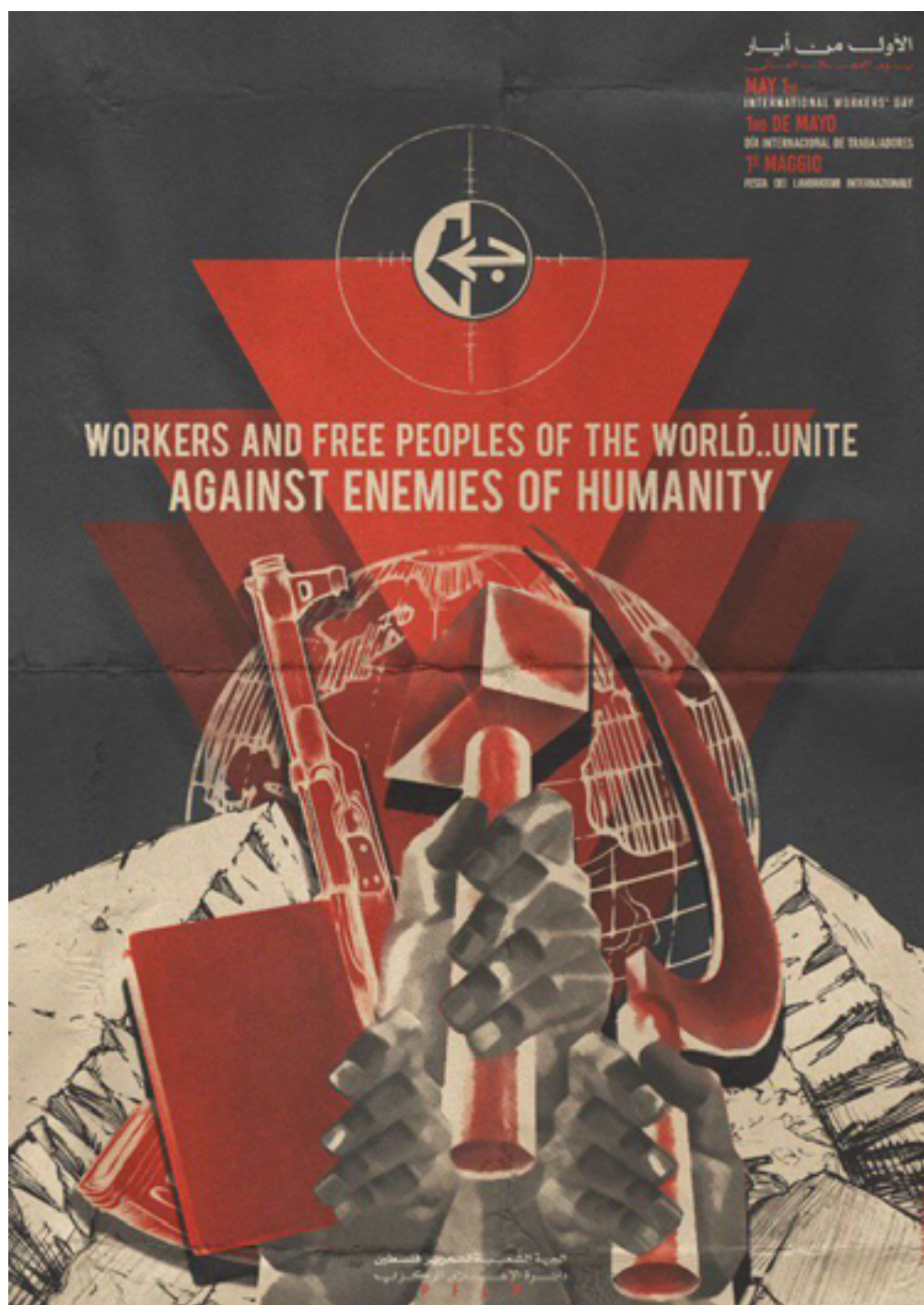
当今的资本主义在不断地把经济全球化，这也就导致现在的经济危机和阶级斗争也是全球化的，一国的经济危机会导致其他国家也遭受灾难，同样的，一国的阶级矛盾激烈化也反映了全球矛盾的激化。随着革命的进行，资产阶级国家的权力因为工人罢工流向街头，工人阶级会发现自己成为了掌权者，为了适应自己获得的权力，他们就会自发地或者在工人政党的领导下组织起群众组织（具体例子如巴黎公社、巴伐利亚苏维埃、彼得格勒苏维埃、巴勒斯坦大众委员会等）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同时这也就意味着**一国革命胜利不代表任务结束，它只是世界革命的一环**，世界工人阶级都会因此而充满革命热情，积极响应革命。同时工人国家也会积极地输出革命意识（但这不代表不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输出革命没有任何冲突，而且，在世界革命成功前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非常重要的），让其他国家的工人明白自己的利益和已经建成的工人国家是一致的。

我们要明白，阶级斗争具有超越民族国家的本质属性，由此延伸出一国革命的传播不是“给予”而是“激发”，即在于唤醒他国工人阶级的主体意识。**马克思主义者既要反对坐等革命条件“自然成熟”的消极态度，也反对越俎代庖的武力干涉（即单纯用刺刀输出革命）**。为了输出革命，**工人国家必须通过国际主义组织传播革命理论，构建跨国信息网络，将局部斗争经验转化为普遍认知模板**。这种知识共享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而是帮助各地工人识别自身处境与全球资本主义结构的关联性。此外，成功革命的范例本身就会产生引力，吸引其他地区进步力量主动效仿，而还未革命胜利的工人会通过国际罢工、抵制等非军事手段，对反动政权形成外部制衡，为工人国家创造活动和建设空间。

以下史实可以证明上述观点的正确：1917年苏俄革命后，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德国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成立，而在1919-1920年，英国码头工人多次罢工拒绝为干涉俄国内战的军舰装载武器，迫使政府撤军；1920年波兰战争期间，德国铁路工人同样集体罢工阻断政府给波兰的军事援助，并声援苏俄。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后，53国4万志愿者组成国际纵队参战，包括美英法等未革命国家的工人。1960-1970年代越南战争期间，法、意、日等国工人发动反战罢工，仅意大利1969年就有1800万工时罢工记录。1973年智利的皮诺切特政变后，北欧多国工会发起抵制智利商品运动，并资助来自智利的流亡者。

我们先不提工人革命，就算是一般的工人罢工，都需要得到其他没有罢工的工人的支持，

有时还需要其他工人一起罢工才能胜利，否则这场罢工很可能什么都争取不到，反而还为罢工的工人带来更差的结果。这是无数次实践所证明的。为了成功，罢工的策略也非常重要的。若是罢工发生在生产中关键的地方，达到目的的成功率会提高；若是没有争取生产关键位置的工人罢工，达到目的的成功率就不会高。同时，如果一场罢工的时间过长，基本上都会导致工人内部的严重分裂以及罢工工人的疲劳，最终导致罢工失败。



一般的罢工是这样，革命也是这样。由此，我们也可以把工人国家看作是一个正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罢工的一部分。**工人国家即使采取防御姿态，其存在本身已构成对资本主义价值规律的否定。**当它国有化关键生产部门、取消利润驱动机制、重构分配关系时，实质上在全球化商品链中制造了断裂带。这种断裂如同电网中的绝缘体，必然承受整个导电系统的电压冲击。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为维持自身闭合性，必定试图消除这个异质节点——要么通过经济封锁诱发其内部机能紊乱，要么发动军事打击直接物理清除。**如果认为工人国家只有打造所谓“中立形象”才能保障工人国家不被推翻，那就相对于要求**

罢工工人在罢工的同时遵守资方生产纪律，在逻辑层面自相矛盾。单独的工人国家的内部矛盾不会因为经济成就的增长而逐渐消失，这些矛盾反而会进一步加深，最终，工人国家就会成为这些矛盾的牺牲品。工人国家的生存概率取决于其引发的体系共振强度。若长期孤立存在，就必然面临双重绝境：其外部要承受资本主义国家持续的能量耗散攻击，内部因资源短缺被迫重建市场激励机制，最终导致社会结构倒退。这种退化存在两种路径依赖：或是官僚集团为维持统治效能，将计划体制异化为新的剥削工具；或是生存压力迫使国家重新接入世界市场，复辟资本主义。避免这两种结局的根本出路，**在于将自身转化为国际革命网络的能量中转站——通过技术共享、经验输出、跨国阶级动员等手段，将局部突破转化为体系性危机。**

在落后地区成立的工人国家比在先进地区成立的工人国家更容易官僚化和失败，因为很多落后地区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并不占重要地位，在工人国家成立后无法动摇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相反，这个工人国家还会不断地受到来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和本地落后生产力带来的保守意识的影响与阻碍。这就是落后地区成立工人国家的危险性。先进地区的工人国家相关的危险会大大少过落后地区，因为它们所处的位置很可能会动摇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生产力的发达也更容易冲破保守的意识。但是没有其他地区的革命，这些工人国家也是容易走向失败的。（从十月革命开始的一系列工人运动以及苏联的官僚化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不应该在没有争取到先进地区的工人的支持时首先进行落后地区的革命。**先成立的工人国家，无论它在先进地区还是落后地区，都能大大鼓舞世界工人阶级。所以只要有国家出现了革命形式，我们就应该勇敢地把革命进行到底，为世界革命做出贡献。**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不是什么从道德出发的理想，而是与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息息相关的思想意识。

随着世界革命的推进，建立的工人国家的相互帮助会直接解决经济问题，具体形式就是组合成一个社会主义联邦，也就是列宁提出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使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不成为单独存在的国家，而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的一个成员，成为不久便能实现的世界社会主义统一组织中的一个构成分子。列宁要这样是因为他认为：（1）这是俄国革命的生死存亡问题。如果没有各国工人阶级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支持，俄国工人阶级的政权是难于长期存在的；（2）这是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问题。

在世界革命进展的条件下，如果某几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先后夺取了政权，成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那它们必须以“联邦”形式结成极密切的联盟，否则，它们便不能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包围中保持自己的存在，它们便“不能实现被帝国主义所破坏的生产力的恢复和劳动者福利的保证”，不能“趋向于建立一种统一的、依照总计划由一切民族的无产阶级所调节的整个世界经济。”（以上引文见列宁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第八节）统一的工人联邦国家没有迫在眉睫的经济问题，对国内的职业化的决策机构就可以进行缩减，没有迫在眉睫的帝国主义威胁，国内的专政机器就会衰亡，这些都是建立在苏维埃的民主下实现的，**一个国家机关的职能越是全民化，这个国家机关也就越来越没用，最终它会因为无事可做而在世界革命胜利后自行消亡。**

我们并不否认会有民族主义倾向使得某些工人国家拒绝给予其他工人国家无国界的援助，但是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会让他们认识到这样合作的必要性，因为这样的合作所取得的发展与进步是一个国家独自发展永远也达不到的。这就是因为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单个**

地区的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其他地区的原材料和科学技术，没有工人国家之间无国界的互助，单个工人国家进入共产主义是不可想象的。中国改革开放后对外资的引入充分展现了先进地区可以为落后地区带来何样的发展，而革命后显然不会是以资本主义的资本输出的形式实现的，而是以忽略国界的直接配置资源实现的。自然或是社会制度所造成的物质匮乏就是可以以这样的方式在几年内解决。工人国家必须在实际上实行完全的民族平等。应该在语言、学校、宗教等等方面都实行这种平等。

不仅如此，工人国家应该实行充分的**民族自决权**，即给予任何民族的大多数劳动者以在可行范围之内来决定：这个民族是否愿意和其他民族留在一个国家的统一体内（可以选择建立民族自治区），或是愿意完全分离出来，建立该民族自治的独立的工人国家。而且**民族自决权应超越单纯领土公投模式，转向以工人阶级利益为核心的复合型自治**。列宁设想的“自由民族的自由联合”应体现为：各区域苏维埃保留文化自治权，但生产资料国有化必须跨区域统筹，确保**工人阶级整体利益优先于局部民族诉求**。此外，在非洲经验也表明，几内亚比绍通过建立包含富拉尼族、巴兰特族的反殖统一战线，成功将部族认同升华为革命民族主义，这证明社会主义民族政策的关键在于将自决权转化为阶级斗争的组织工具而非地域分割依据。

任何一个国际主义者必然是赞同行为和道德方面的“自力更生”的。所谓行为和道德方面的自力更生，无论个人或者国家，甚至不论其为何种人与何种国家，都是好的，应该的，因为这是一种工人阶级的独立精神与勤奋精神。如果不肯定这个方面的自力更生，那就等于提倡懒惰、提倡依赖、提倡靠天吃饭或提倡剥削他人、提倡坐地分赃。只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实现，不可能是由每一个大小不等的民族社会主义国家逐一建设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再像七巧板似的拼凑到一起后实现的，而是在很大限度内有赖于各国工人运动、特别有赖于已经获得胜利的工人革命，**自始就着重于世界全局，坚持国际协作，以全球的视角来规划和建设暂时分为各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生产资料社会化需突破国界的客观事实证明组成工人联邦国家是一个必要政策，是应该无条件实现的，而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可以因为“情况有变”而改变的政策。

关于家庭和家庭专制主义

许多马克思主义青年时常被人挑战：你要弃家人于不顾吗？若果你投身革命，那你的家里人要怎么办呢。诚然，我们许多同志都在这个问题上被框住了手脚，我们不可能绝情到说完全不会再理会家人的处境了，这也是不现实的，也是辩证唯物主义者不鼓励的，尽管下文会阐述家庭这种生产单位在资本主义时代的“罪恶之处”，但是不代表辩证唯物主义者完全否定家庭的一切——至少我们绝对不可以否认血缘关系带来的情感纽带，这种情感纽带的纯粹和伟大不容任何学派的人染指和曲解。但是，无论我们怎么维护这种最纯粹的伟大，现实的问题依然还是赤裸裸地摆在我们眼前——**我们高度和家庭挂钩，这直接牵涉到了我们的革命**——我们的革命在第一步，就必须要进行对家庭的审视和考量，我们首先要跨出去！家庭这第一道坎，它究竟是为什么成为了我们革命的第一道阻力，致使我们不得不为此牵挂，或者是被其限制，或者是受其掣肘。

这道坎首先表现在物质生产上：个人高度和家庭挂钩，如前文《关于学生》所说的那样，尚处于求学阶段的马克思主义青年的生存仰赖于其来自的家庭；已经参与劳动生产的，则是要承担起维持家庭运作的责任（同样，提出极端家庭例子的论调不在少数，不过这是不经大脑的低级趣味反驳，在分析完一般典型家庭之后，极端例子只会是更加差劣），在这里，我们观察到家庭成员在社会生产活动中的生产，虽然是社会的性质，但是生产家庭成员再生产的生产，却是家庭自己的事情。社会的生产没有责任照顾单一家庭生产，但是家庭的生产却要为了社会生产付出所有，否则这个家庭将难以为继。因此，**尝试在物质生产上脱离家庭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生产上的立足难度将会霎时变高，因为他不仅要负责社会生产的其中一部分，同时还要负责生产自己的再生产**。那些出色的青年往往只在少数，而大部分的青年，都在这样的环境下一——就像社会十分排斥有单一个体从家庭中脱离出来，不受家庭的控制，从而用“各种力量”势必要把这些青年束缚在家庭这个基本的生产单位里。

那么这种“力量”到底是什么呢？

既然社会生产抗拒为单一家庭再生产负责，而社会生产的成果，在波拿巴主义中国下又展现了饶有趣味的私有性，**因此排斥为单一家庭生产负责的，不是社会生产的过程，而是社会生产的占有**。即，已经以极其令人作呕的形式交媾在一起的中国的资产阶级、波拿巴主义官僚和其他特权阶层，拒绝在打着真正的社会主义旗帜的领导下让家庭逐步消

亡的责任，反而无所不用其极地以任何手段，使单一家庭这种分裂的社会生产单位，在社会生产中处于无限接近隔绝的状态，并确保不会有人从这种形式中脱离出来。这就是为什么，作为中国资产阶级喉舌的中国共产党希望确保存在一个十分稳固的家庭形式，这并不是因为它很关注每个家庭里面那种属于家庭成员的情感联系，这也是许多同志想不通的一点，他们或许会发问：“难道我们可以忽视现实里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纽带吗？现实里的家人之间怎么可能完全没有情感，完全基于物质生产呢？”不错，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金银天然不是货币，货币天然不是金银。**家庭成员的情感纽带天然不是为了某种特定社会制度的存在，但某种社会制度的存在天然需要这种家庭成员的情感纽带。正如火是人类文明的开端，却也是人类之间杀戮的工具，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天然成为了中国的波拿巴主义制度下剥削的最好工具，它帮助了资产阶级不费吹灰之力将个体和家庭紧紧捆绑在一起。

可是这样做对剥削阶级有什么好处？

在回答这个最终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再用另一把手术刀切开这个，独属于中国家庭的“肿瘤”。中国经历了千百多年的专制王朝时代，在鸦片战争之前，基本上农业都是第一生产，因此，千百年来社会生产的形式，一定是契合农业生产的。所以，在专制时代的背景下，中国的家庭形式通常规模会趋向庞大，这是因为：生产力落后的同时，规模较大的家庭——甚至广义上来说，可以直接说是宗族，抗风险的能力会很高。正如恩格斯所描述的那样，社会生产进入农业时代后，男性天然成为了一个家庭里面的中央枢纽，女性在农业的社会生产模式中处于劣势，因此只能回归家庭服务于再生产，一个围绕着“父亲”的家庭形式（这个家庭甚至可以扩义，基本上整体社会和国家都是类似的形式，不过为了方便理解，先集中在家庭）就形成了。接下来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摆在了眼前：宗族，或者说家庭的维持，必须确保物质生产能在这个范围内得到继承，也就是必须确保家庭成员对于父亲一系的枢纽表示忠诚。答案很显然，这种绝对忠诚的要求，来自于统治阶级最推崇的孔儒之学（金银天生不是货币，货币天生是金银）。当然，无论怎么看，这种要求全部家庭成员都要为一系的中央继承系统服务的机制显然是反人性的，我们可以从中国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不少的反剥削反压迫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窥探到，我们可以从专制主义历史上对女性的压迫和剥削窥探到，她们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完全丢失了社会生产的主导权，甚至因此沦为家庭生产和社会生产的生产资料——不错，家庭专制主义甚至会把人异化成了生产资料，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女性通常被当作政治手段，作为利益集团连结的售卖品，也就是所谓的“联姻”。同时，专制主义也将男性异化，他们如若不能在家庭的扩大生产中胜出，那么也只能沦为胜者的奴隶，其地位甚至低于现在的自由劳动者——他们的全身心都隶属于占有他们的人。因此，孔儒之学所推崇的意识形态，本质上就是为前资本主义下的专制制度中的家庭的维持而服务的，因此它极度排斥任何对于这个机制的反抗和批评，它推崇服从和孝顺，它推崇尊卑有序，年长的对于后辈掌握绝对的指导权和控制权；反过来，后辈在这样的社会生产下别无所依，脱离家庭生产将失去他们唯一的庇护，在那个生产力如此落后的年代，脱离出去对大多数人来说只能是死路一条，因此物质上又不得不迫使他们留在家庭，然后将这个“剥削”不断维持下去。中国历史上流传下来为人所歌颂的优秀文学作品，无一不都带着对这种**扭曲的专制主义**的反抗和呐喊（梁祝、白娘子、水浒传、西游记等等）。

因此我们到这一步终于可以观察到家庭的大概，社会生产的结果通过物质和精神两个手段，尽力维持这种稳固的家庭形式，迫使社会生产上的个体都必须高度和家庭形式连结。

我们终于可以回答这个问题，这对剥削阶级到底有什么好处？

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如前文所说，社会生产的结果不需要为家庭生产负责，但是家庭生产就必须依附于社会生产，否则它将难以立足——这说明，**高度和家庭连结的个体必须更加异化自己，他必须接受更为苛刻的工作条件，他必须对资产阶级无限服从，以换**



取可以维持他和他所在家庭立足的工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被束之高阁的孔儒专制，将个体禁锢在家庭之中，并用人类天然的亲属情感联系作为包装，对劳动阶级进行精神生产和具体、抽象劳动生产的剥削。因此，我们可以观察到那些负责赚取家庭日常生活开支的劳动者，他们的处境十分糟糕，肩负着整个家庭的重担，同时必须在外对资产阶级唯命是从，为了保护自己的工作机会，他必须变得自私，甚至可能对同样处境的劳动者们进行无情算计，并从而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聪明的同志这个时候就会提出疑问了，既然如此，那所有能参与劳动的成员都参与社会生产不就可以了吗？事实上，这并不是资产阶级希望看到的景象，一来它必须控制一定的失业人口以更好地控制正在劳动的劳动者；此外，正如恩格斯所描述地那样，资产阶级渴望尽可能少的家庭成员参与社会生产，这样它们就不用负责那些负责生产家庭再生产成员的生产。因此可以观察到，**失业率永远是官方机构最关注的**数据，他们会极度鼓励个体不断形成新的家庭，他们鼓励结婚生子，并十分期望那些在劳动力市场中被淘汰的个体以各种形式回归家庭（家庭主妇），这样，生产再生产的劳动，也就是负责家庭再生产的劳动，资产阶级就不需要为此负责了，他们只需要给参与社会生产的劳动者支付工资，而不需要为家庭主妇支付什么，这样他们平白无故就获取了额外一份劳动成果，这一部分成果，如前文所说，就属于社会生产不为家庭生产负责的来源。同时，这也解决了失业率的问题。因此，越是经济下行，资产阶级就会越是鼓励个体组成家庭，因为一旦组成家庭，劳动者们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如同自行戴上镣铐，任由资产阶级予取予求了。

矛盾论再次展现了它迷人无比的一面，资产阶级越是推崇它所喜爱的最大化自由度的市场，它所渴求的家庭形成就越失去物质基础。产业升级和劳动分工的细化，进一步摧毁了家庭形成的必要性，信息技术的革命又钉死了它的棺材板。我们发现，商品经济越是发达，则个体对家庭形成的需求就会相对农业生产时期减少许多，这是因为迅速发展的生产力要求有相应足够高的消费能力去消费它的生产，这时，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描述的那样：物与物的关系开始凌驾了人与人的关系，以往家庭的生存物质提供的职能，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下，这个职能被市场交易分割出去了一部分，无产阶级个体无论是否愿意遵循他的家庭内先进的或落后的规训，或是他与家庭成员的关系如何，都不影响他是市场上的“自由人”，只要他愿意，总能通过参与雇佣劳动的形式维持自己的生存。所以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下，我们可以观察到，社会化大生产推动了青年人和他家庭的依赖解除，除了提供物质上的脱离可能，在这一个步骤最关键的是——资本主义剥夺了家庭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教育的职能，现在它由统治阶级所制定的义务教育和社会生产中的人的互动来承担。以往家庭所提供的精神生产的职能可以说是被完全分割了出去。由于精神上的依赖被完全转移，青年人的意识形态就会很自然浸染了市场上商品经济和货币交易的意识形态，尽管它带有资本主义的色彩。因此，我们可以观察到在 21 世纪 10 年代以后，**社会生产的意识形态和旧家庭的专制主义意识形态开始展开激烈交锋，具体表现在一代年青人和家庭长辈的关系开始紧张起来**，他们开始关注自己是否在家庭当中得到长辈的尊重，而不是像个傀儡一样全部都听父母媒妁之言，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多青年人为此思想斗争付出惨重代价，轻则落下心理疾病，重则选择终结自己的生命进程。

因此，尽管我们还没有开始讨论现在年轻人是否愿意结婚生育、或者作为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的中共的政策是否愿意为家庭形成提供足够支持，事实上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早就已经摧毁了家庭形成的经济基础（或者说摧毁了家庭形成的**必要性**，放在以前如果不能组织起家庭，那么个体生存的难度将会非常高，但是发达的商品经济则允许了个体在理论上有无须组成家庭的可能），更遑论现如今组成家庭所需要的成本和代价了。

矛与盾中的矛与盾

现在我们知道了可悲的资产阶级一边渴望个体能够形成家庭从而使他们能更好地被剥削，一边不断渴求更加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但这同时又会摧毁家庭的组成必要性，这是宏观上的矛盾。

现在我们再集中聚焦，现在家庭组成的过程，也是一个矛盾的过程、一个异化的过程。我们从来没有否定过人类的自然情感属性，恰恰相反，**辩证唯物主义绝对不会否认人类天然的情感联系**，抛却任何人类自行拟定的乱七八糟的程序规训，任意两性之间产生互相欣赏和互相爱慕的情愫是如此的美好和自然，而正正也是这种情感，才使得我们人类成为人。不单单是爱情，友情，亲情，人类天然的情感属性促使我们能够为此发挥最为强大的主观能动创造力：爱人之间表达爱慕促使了许多浪漫的诗句，为了厮守一生和社会作对；双亲在危险之中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儿总是可以爆发出超越自身极限的力量；知己之间可以发展出“非高山而不流水”的断肠共鸣。**正是这样的情感才促使人类如此独特。**

而资本主义的罪恶之处就是它总是将物与物的交易、货币交易凌驾在人与人的联系上。我们来观察下现在中国青年人的家庭形成过程是怎样被异化的：两个年轻人分别来自不同的家庭，他们在生命中的某个节点相遇，相知，然后相爱。在经历了一定的相处时

间后，他们认为对方是合格的伙伴，在社会生产中可以进行互相协作，共同生存，最重要的是——他们非常相爱，那种天然的情愫使他们难以割舍和分离。

但是问题来了，他们不能就这样宣称他们相爱了，不能就这样将双方仅有的物质组合起来协作生存，在今天这个特定的社会制度下，他们必须走一些特定的社会程序来确保家庭的“合法性”。首先，他们必须在现有的社会制度下对即将形成的家庭予以统治阶级的权力保障，也就是所谓的“领证”，一旦领证，即说明基本生产单位形成，这个单位必须遵循统治阶级的规训，受统治阶级法律监管和保护，或者解锁一些个体没有的，而一个家庭生产单位才能带来的政策福利（理想下假设存在）等等。但是，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为两个即将形成家庭的个体本身就来自于两个不同家庭，我们假设两个个体都从原来的家庭中脱离而形成新的家庭（就算不假设也一样，下文继续）。

潘多拉的盒子就是在这一个步骤被打开了，无论怎么样，这个新的家庭形成过程不知怎么的就一定要牵涉某个家庭成员从原来的家庭中脱离：要么就是女性从原来的家庭中脱离，并入男性家庭（我们叫嫁娶）；要么是男性脱离原来的家庭，并入女性家庭（我们叫入赘）；要么就是一齐脱离，形成新的家庭。明明是基于人类美好的天然情感而促成的良缘，但是似乎组成的步骤不同，它就变了种一样，为什么这个过程如此关心具体是哪一位成员从原来的家庭当中脱离，为什么同样是相爱，却被某种诡异的力量套上不同的名字呢？难道说，“嫁娶”的爱，和“入赘”的爱也有区别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也是反直觉的，人类的情愫怎么可以量化呢？那么当中到底是什么被量化了？

是物质被量化了，关键的一步不在于新家庭的形成和新成员的加入，而是旧成员的脱离，是旧成员的脱离所涉及到的物质分配，在家庭形成的过程中迅速凌驾了人的情感连结。旧成员的脱离对于旧家庭来说是重大的变动，在以往农业生产时代，成员一定是生产力的一员，女性由于在农业生产中丢失主导权，因此被迫成为父系继承系统的消耗品。诚然，一个专制主义家庭怎么可能白白让女性成员出嫁，甚至还得自掏腰包支付“嫁妆”呢。抛却那些繁杂的“三拜天地”，“八抬大轿”，家庭于是很自然地就想到了纯粹的物质交易，要么就是这样的嫁娶使得家庭进行融合和连结，成为更庞大的宗族势力，这对原先的家庭来说都有好处；要么脱离家庭的个体的家庭就会根据实际的物质基础要求对方家庭以对等的物质来进行交换，这里甚至还是假设“喜结连理”的一对新人是两情相悦的情况，也就是说，就算这对新人完全没有任何情感基础，只要物质条件允许发生反应，那么这个进程也可以没有障碍地运行，因为在家庭专制主义的规训下，这对新人没有反抗家庭使命的权力。这样，无论新人的情感基础如何，此时此刻都不重要了，新家庭形成完全依赖上旧家庭的意志，取决于物质条件是否合适，一旦合适，那么就可以达成商品交换，**成员被明码标价以某种价格售出，换取旧家庭在社会生产当中的资源。**

那么在现在的时代呢？情况发生了些许变动，首先是组成新家庭的物质必要性被消解了，即使不组成新家庭，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无产阶级都可以从社会化大生产中取得，这是市场经济带来的。其次，由于家庭的精神生产主导权被社会生产剥夺了，青年人又不必非父母之言不可，家庭形成看似完全依赖个体选择了。但是事实真是如此吗？正如恩格斯所说，资产阶级似乎比封建专制要和善许多，它大手一摊表明自己没有责任为个体的婚姻负责，它允许鼓励婚姻自由。但是，资产阶级的婚姻恰恰是最不自由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资产阶级，对于物质继承的要求和渴望甚至比前资本主义的宗族还要极端，因此资产阶级是绝对不轻易允许婚姻“扶贫”的，甚至他们的专制程度还要比封建专制时代要更进一步，对婚姻中情感因素的忽视更为彻底，直接清晰表明婚姻是物质交换的媒介，但凡不能从这场交易中有盈利，资产阶级都不会允许它发生。至于手段，那就更

无需多言了，资产阶级渴望无产阶级组成家庭，所鼓吹的依然是被束之高阁的孔夫子。而底层的无产阶级呢？改革开放允许了东部沿海城市率先开发，在完成了城市化之后，工业生产迅速对中西部的劳动人口进行贪婪吸吮，中西部农业生产轰然倒台，加之乡镇企业蓬勃发展，更使农业萎缩。同时，令人匪夷所思的计划生育政策掐灭了农村人口增长的最后一口气，那么那些没有外流到东部城市的人怎么办呢？面对萎缩的农业，他们没有办法理解这是“天子一念之威”，没有生产资料国有制和指令性计划经济的生产关系基础，没有落实到中国人民骨髓里的“文化革命”，使他们重新捡起了旧农业时代强悍无比的专制主义惯性——渴望人口，但是农村没有，那要怎么办呢？于是，中国在千禧年代向我们展示了道德彻底败坏的一幕：人贩子产业开始催生，他们成群结队，视女性和小孩为生产力，全国各地掳掠人口，造成无数家庭一生的缺憾。

而一般的家庭呢？它们就在社会生产的进程中，同时带有社会最上层和最底层的毛病，情况也是最为复杂的：我们似乎被允许婚姻自由了，但我们的婚姻真的自由吗？我们的婚姻本来是起源于人类最纯粹的爱慕，那是让我们人类之所以是人类的理由。现在它变得不那么重要，它只是催促了两个有缘人走到了一起，剩下的就没它什么事了。一般家庭，有的还在被前资本主义的专制主义扯着后脑勺的辫子，认为不结婚生子就不是正常人，在相亲市场中来回踱步；有的家庭互相之间已经开始纯粹的物质算计，完全忽略了新人的情感需求。无论是哪一种，人与人的关系都被物与物的关系凌驾了，诞生于人类最朴素的情感的行为，此时此刻和它的起源完全无关。并且，现在的统治阶级采用来自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维护其统治的现象，现如今竟然同时在这个经历过一次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洗礼的中国大地上每日呈现，这一切都要拜谁所赐呢？

我们终于揭开了中国的波拿巴主义制度下的家庭的神秘面纱，我们终于知道了为什么它会成为我们革命的阻力——它在精神和物质的生产上，都在不断地对无产阶级进行剥削，“成家立业”的意识形态教化深入每一个中国劳动人民的骨髓，并对他们的灵魂步步紧逼——一旦活到了某个岁数，只要没有结婚，整个社会教化就会对它无情鞭打，尽管他每日兢兢业业，没有任何作奸犯科，他依然要遭受旁人的指指点点，或者是父母的专制威逼（尽管他可以是潇洒到完全不在乎任何社会规训），于是人们的焦虑程度就随着年纪上升和上升，越来越不顾及自己的真正喜好，在社会教化的逼迫下已经来不及建立任何情感连结，因此**取而代之的，就是资本主义下最有效率的“商品交换”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婚姻，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它“商品交换”的本质，越来越展露无疑了。

“社会主义乌托邦”破产了吗？

随着 20 世纪的结束，世界上仅有的社会主义政权一个接一个土崩瓦解。要不经历恐怖的内战和分裂，要不在动荡中伴随着“自由化”的口号倒退回资本主义，乍一看社会主义的时代结束了，资本主义又重新在新世界站稳了脚跟。历史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否已经破产了？

反对共产主义、也是共产主义反对的这批人，高喊共产主义是一个不现实的乌托邦空想，在几十年的打闹后必然落下帷幕。许多新保守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旧调重弹，认为马克思主义打着实现“理想社会”“地球上的天堂”“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全面和解”这样一种乌托邦式的激情，导致不择手段、国家专制主义的恐怖。这一来，他们就把出现于苏联、中国、东欧，甚至波尔布特的柬埔寨的例子，称之为共产主义不可避免的结局。

然而，这些都是无厘头的谩骂。马克思主义是反对无神论的，因而不会也不可能有什么基督教的千年王国说或“世俗化宗教”的成分。马克思主义没有天真地梦想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实现全面和解，没有预言各种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将来会完全消失，也从未企图强迫让人接受乌托邦。“马克思主义 = 乌托邦思想 = 通往奴役之路”这个公式不仅是意识形态的恶意虚构，它提出了有关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及其从渐进政治的观点看所产生的后果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国家的社会是不是乌托邦？把用在这方面的力量用于逐步改良现存的“开放社会”难道不更适宜吗？为举手可得的改良而斗争与追求“最终目标”及建立一个新社会之间，难道不存在根本的矛盾吗？对统治阶级和国家进行全面批判并发起“强有力的”挑战，难道不会挑动他们抵制现行改良，甚至挑动他们报复吗？这样做客观上不是破坏了政治民主制吗？

这种对于乌托邦思想的诘难被用来反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但是对乌托邦一词的界定是有局限性的。倘若“乌托邦”被界定为**不可能的或无法实现的理想**，那么在政治上为乌托邦而斗争显然是徒劳的（尽管乌托邦还有一种道德上的意义），一旦我们与这种形式主义的、机械论的、非辩证的界定相决裂，“乌托邦”的含义也随之而变。前述定义在“可能”与“不可能”“现实”与“非现实”之间制造了绝对的对立。列宁在《怎么办？》曾提到“梦想的权利”，甚至“梦想的必要”，只要这种梦想涉及的是尚未存在、但在某些条件下可能实现的事物。要使梦想成真，不仅要具备物质条件，而且需要努力、计划、

行动的意志以及付诸行动的能力。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当今世界从未存在过，一些人以此为理由反对人类的进步。可是，**废奴斗争是乌托邦吗？**须知奴隶制的存在曾超过一千年。废除农奴制的愿望是乌托邦吗？宗教迫害，包括在火刑柱上烧死异教徒，至少在五百年时间内是一件“活生生的事实”。那么，试图建立良心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是乌托邦吗？在数百年间，议会制存在于非常狭隘的选举基础上，为普选权而斗争便是乌托邦吗？**为什么废除雇佣劳动和庞大的官僚体制在今天便注定是乌托邦呢？**雇佣劳动制和国家官僚成为社会结构的核心才不到两百年。在渐进的改良主义之外走一条捷径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在经验上看也是合理的。乌托邦在这个词最广泛的意义上，**是逐步实现历史进步的伟大动力之一**。譬如以奴隶制为例，如果革命的或“乌托邦式的”废奴主义者局限于一个“特定制度”内为改良奴隶的生存条件而斗争，那么废除奴隶制当初就不会实现。

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者常常混淆了科学预见与空想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将社会主义运动视为“乌托邦”的论调，实质上是将科学社会主义与早期空想社会主义混为一谈的认知谬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正在于它首次使社会主义从道德愿景转化为科学理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解剖，发现其内在矛盾的运动规律，从而论证社会形态更替的历史必然性。将社会主义等同于“乌托邦”的论调，本质上是对历史的辩证法的无知。当资产阶级革命推翻封建制度时，同样经历了反复与挫折：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历经半个世纪动荡，法国大革命付出八十年的反复代价。资本主义制度从萌芽到确立用了三百余年，而社会主义作为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其成长过程必然伴随更复杂的矛盾运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正在于它提供了分析这些矛盾的方法论，而非描绘某个凝固的“理想蓝图”。**

所以，在他们质疑共产主义是否可行前，笑话我们为之奋斗的新制度是空想时，共产主义者要先问：**谁是空想？**认为这个世界可以保持这资本主义无止境的恐怖，认为除了社会主义之外能有任何方法去调和这不可调和的矛盾，认为纵容资本主义继续吸食人血、破坏自然、堕落文化是可行的，这才是真正的空想。支持资本主义制度并捍卫它的人，是真正的“反乌托邦”的信徒；而共产主义者，不是等待被解救、期待乌托邦降临的旁观者。我们是组织工人阶级建立新社会的革命者。

社会主义不会破产，它会遭到阶段性的挫败，资本主义同理。资本主义可以赢无数次，但**社会主义只需要赢一次**。

XVII

资本主义能摆脱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吗？

无论自由主义者如何污蔑，计划经济都用不只是资本论的文字，而是生产、钢铁、建设的数字证明了自己相较于“自由放任”的优越性。计划经济的历史让世界曾经两个无比贫穷和落后的国家如今成为了举足轻重的帝国主义列强。有规划、有方向、有校准地控制经济的手段，即使是一开始反对它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都不得不在遇到危机时边骂边偷来一部分用：看看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与我们熟知的凯恩斯主义即可。

这些事实本身证明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已经无力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并陷入了非理性、混乱的局面**，但同时也给了部分改良主义者一个好听的“前途”：看，计划经济的手段连资本主义也用起来了，那我们不需要一场革命，只需要等到资本主义逐渐“废除”市场的无政府状态，自身改良引入计划经济就好了。我们说这是一种幻想，天真地以为资本主义制度可以主观地躲开它立足于的无政府主义市场经济，兼容“理性计划”的手段。

生产社会化和占有私有制不可协调

在资本主义生产出现之前，即在前资本主义，普遍地存在着以劳动者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小生产：自由农或依附农的农业和城市的手工业。生产资料都是个人的生产资料，只供个人使用，因此这些资料是属于生产者自己的。把这些分散的小的生产资料加以集中起来并扩大生产，**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作用**。资产阶级要是不把这些有限的生产资料从个人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化的**，即只能由一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就不能把它们变成强大的生产力。例如，纺纱机、机械织机和蒸汽锤代替了纺车、手工织机和手工锻锤，而需要成百上千的人进行协作的工厂又代替了小作坊。同生产资料一样，**生产本身也从一系列的个人行动变成了一系列的社会行动**，而产品也从**个人的产品**变成了**社会的产品**。现在工厂所生产出的产品，都是许多工人的共同产品，都必须顺次经过他们的手，然后才变为成品。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这是我一个人做的，这是我一个人的产品。

说完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进步意义，但为什么这个社会化仍然没有达到能兼容社会主义的标准呢？因为，这些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和产品**还像从前一样仍被当作个人的生产资料和产品来处理**：现在按社会化方式生产的产品已经不归那些真正使用生产资料和真正生产

这些产品的人占有，而是归**资产阶级**占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是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和一切在经济上起决定作用的国家里占统治地位，并从而把个体生产排挤到无足轻重的残余地位，**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越加鲜明地表现出来**。生产资料越是变为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并集中在资本家手中，个体小生产者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就越是在市场上难以立足。他们在最后除了受雇于资本家就没有别的出路。集中在资本家手中的生产资料和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生产者彻底分离了。**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

计划只是建议的手段而非指导的体制

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对它的资本属性的这种反作用力，迫使资产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可能的限度内，越来越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看待。无论是信用无限膨胀的工业高涨时期，还是由大资本主义企业的破产造成的崩溃本身，都使大量生产资料不得不采取像我们在各种股份公司中所遇见的那种社会化形式。某些生产资料和交通手段一开始规模就很大，例如铁路，排斥任何其他资本主义经营形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这种形式也嫌不够了。于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资产阶级国家**不得不承担起对它们的管理。这种转化为国家财产的必要性首先表现在大规模的交通机构，即邮政、电报和铁路方面。（只有在生产资料或交通手段真正发展到不适于由股份公司来管理，因而国有化在经济上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国有化才意味着经济上的进步，才意味着达到了一个新的为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力做准备的阶段）值得注意的是：资本主义国家在重工业或军工领域推行的“国家计划”本质是市场机制的补充而非替代。军工企业虽由国家直接管理，但其技术研发仍依赖私有企业的分包体系，钢铁、电子元件等基础物资仍需通过市场采购。这类计划本质是政府采购行为，**企业间竞争投标的过程仍然遵循市场规则**。例如，当美国的波音公司承接国防订单时，其铝合金供应商仍有多个选择对象，**价格和质量竞争依然存在**。

如今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适应不断发展的生产力，而不得不实现的“计划经济”的存在的原因如下：

1. 今日处在庞大的垄断集团之下的资本主义，在投资时动辄集中数以千万元计的资本，而又必须很迅速地分期回收。这种资本主义，蒙受不起巨大的周期性波动之险。
2. 这种管理经济的需要，本身也是直接从资本主义企业内部产生出来。生产程序愈益复杂，便需要愈益精确的计划，否则整个企业便不能像一个整体般运行。归根到底，资本主义的企划不外乎把在大资本主义企业或企业群内部早已进行的工作，扩充到全国范围，或更准确地说，在全国范围内协调进行。
3. 这种“计划经济”在本性上，它迥异于社会主义的计划，因为它**不是设定生产指标**，也没有为求达标而从事其他计划。相反，它协调各私有企业早已拟定好的投资计划。这种协调，最多是由政府出面来协调各种指标，定下优先次序。而这些指标都是为了符合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这也是因为资本主义政府不可能有执行这些计划的手段。

这种“计划经济”建基于一种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来自作计划时，根据纯粹预测，资本主义下的计划永远的建议性和指导性的。资本主义国家虽可在特定领域采取干预，但无法全面垄断生产资料与消费品分配。例如纳粹德国通过四年计划成立国家控制的戈

林康采恩，但仍**依赖蒂森、克虏伯等私人垄断资本的生产体系，政府通过补贴和订单诱导合作，而非剥夺产权**。这种“计划”本质是战争动员的卡特化；军国主义日本通过《国家总动员法》将资源调配权移交“统制会”，由三井、三菱等财阀高管主导。政府仅协调产能分配，私有产权和法律地位不变。野吕荣太郎（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称其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暴力整合**”；现代新加坡淡马锡控股虽掌控电信、港口等关键行业，但通过董事会放权给私人资本运营。**政府以股东身份协调投资方向，而非指令生产**。新加坡劳工党批判其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僭主政治**”，本质是跨国资本的利益守护人。这些案例表明，资本主义国家的计划本质是危机应对工具：法西斯国家为战争动员，后发国家为产业扶持，现代国家为市场失灵补救。其“计划”始终依托市场机制运行，如德国通过价格补贴诱导企业增产，而非直接指令生产。当国家干预损害资本利益时（如印度1991年改革），计划机制即被抛弃。

“新”资本主义的本质，是**政府对经济生活日增的干涉的本质**。这个本质可以概括成如下公式：如果任由资本主义听命于经济的自动机制，就越有迅速灭亡的危险。所以国家日甚一日地变成资本家利润的保证者，保证资产阶级中居统治地位的垄断阶层的利润。国家的保证，靠的是它能减少周期波动的振幅。它另一种保证手段，是愈显重要的军事性或半军事性的国家订单。它**保证利润**的手法，是在“管理经济”的架构中临时采取的种种技术。国家告诉资本家：“如果你在某个地区投资，或在某个部门投资，不论成效如何，即使你的赔本废物连卖都卖不掉，甚至即使你完全失败，我们都保证你的资本可以得到6%或7%的利润。”这是国家保证垄断利润的最好、最明白的形式。这种政策，沙赫特、封克、戈林等人在纳粹的战备经济及其四年重整军备计划中，早就应用过这个方法了。

新的社会制度将打破现有的桎梏

无论是这种经济上不得不进行的国有化，还是政府对经济生活的日益干涉，都在为一种全新的、由协作的生产者有计划地支配经济的生产方式（即**共产主义**）打下物质基础。从上面可以看出，若是要生产力有进一步的质的飞跃，**没有整个社会对生产的有计划的调配是不可能实现的**。

当机器大工业将千万人的劳动编织成精密协作的网络时，生产过程的每个齿轮都开始要求更精确的配合。纺织厂需要准时获得化纤原料，汽车装配线必须同步接收上千种零部件，智能手机的芯片供应一旦延迟就会引发产业链瘫痪。这种社会化大生产的本质，就像交响乐团需要指挥统一节拍——分散的演奏者即使技艺超群，若各自按不同乐谱行动必然导致混乱。**生产力越发达，企业间物质交换的频次与精度要求就越高，市场机制自发的价格信号如同用烟雾传递作战指令，在简单手工业时代尚可应付，面对现代经济的复杂需求则必然失效**。

从长期来看，资本主义的指导性计划完全无法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政府统计部门收集企业自主上报的数据，经济学家据此推测未来需求，但私有制下的每个资本家都像丛林中的猎手，既不愿暴露真实生产意图，又试图窥探他人动向。当所有汽车厂商都从钢材涨价推断“市场需求旺盛”并扩大产能时，钢铁短缺可能只是矿业垄断的结果，最终必然导致汽车滞销与工厂倒闭。2008年金融危机正是这种信息割裂的恶果：银行用数学模型预测房贷风险，却无法掌握真实购房者的还款能力链，当底层债务链条断裂时，整个金融系统的“科学预测”瞬间崩塌。

我们应该明白，人工智能需要海量数据训练，5G 网络建设要求基站密度精确计算，新能源转型涉及电网改造、充电桩布局与电池回收体系的整体重构。**这些跨行业、长周期的**



系统工程，在资本逐利本能的驱使下必然陷入碎片化竞争：私营企业争相开发同类技术导致资源浪费，基础设施重复建设造成社会成本激增，关键领域创新因短期利润不足而被搁置。当特斯拉在美国建设超级工厂时，需要州政府竞相提供税收优惠，这本质上是

用社会财富补贴私人资本的无序扩张。

在这个时候，生产资料私有制像一道铁栅栏，把本应贯通的社会化生产切割成互相戒备的孤岛。**当自动化生产线能在 24 小时内切换百种产品型号，却因企业专利壁垒无法共享技术参数；当全球物流系统可以实时追踪每个集装箱的位置，却因贸易保护主义人为制造运输障碍——**这些荒诞现象证明，资本主义框架下的局部优化永远无法实现整体效率最大化。唯有打破私有产权桎梏，使社会能够像操作自己的身体般支配生产体系，通过指令性计划将物质资源、劳动力和科技成果进行有机整合，才能真正释放现代生产力的全部潜能。这种必然性不是乌托邦幻想，而是精密机床需要数控系统般的客观规律——当生产社会化程度超越临界点，生产关系的升级就成为了不可抗拒的历史选择。

社会化大生产的精密网络发展到当代，其内在矛盾已清晰显露：当千万企业、数十亿人的劳动通过全球产业链深度交织，分散的私人决策必然导致系统性失调。资本主义的“指导性计划”既无法预判社会总需求的结构变化，更无力协调跨代际、跨领域的战略投资。**真正的解决方案只能是将整个经济体系转化为可编程的有机体，这要求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占有与指令性计划的双重变革。**

指令性计划的确立，本质是工人阶级通过国家机器将社会化生产的客观要求转化为自觉行动。当炼钢工人、程序员、物流调度员的劳动数据实时汇入中央计划系统，生产决策就从资本增值的囚笼中解放，转变为满足社会真实需求的精密运算。这种经济形态必然要求工人阶级专政——因为只有生产者直接掌握计划权，才能确保一切产品用于扩大全民福利。**工人国家**在此过程中承担双重使命：它既是镇压资产阶级反抗的暴力机器，更是培育新型生产关系的孵化器。它通过计划体系使指令性计划原则渗透到每个经济细胞，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创造物质与精神前提。

这种过渡本质上是社会机体新陈代谢的过程。当指令性计划使生产力突破私有制桎梏，劳动异化将随着物质匮乏的消除而逐步消解。工人国家不是永恒存在物，其专政职能将随阶级消亡而弱化，管理职能则随着计划体系的完善转化为纯粹的技术协调。正如数控系统最终要融入智能工厂的神经网络，工人阶级专政也将通过发展更高形态的社会自治，使国家机器沉入历史博物馆。这个辩证运动揭示着人类解放的根本路径：不是用道德说教对抗资本主义，而是在社会化生产的物质基础上，通过工人阶级专政锻造出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阶梯。

可以主观为资本主义消除竞争吗？

那么，让资产阶级对全部的生产资料进行“集产”，并用非竞争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调控呢（即用指令性计划代替指导性计划）？可是，资本家群体本质是价值规律支配下的竞争者，即便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不同财团在石油、金融、科技等领域的利益争夺从未停息。**2008 年金融危机期间，美国三大汽车公司中克莱斯勒被意大利菲亚特收购，通用接受政府救助时仍要关闭多家工厂，这说明**资本集团在危机时刻仍在进行资源重组而非团结互助。**当所有企业被“集产”并被纳入国家计划时，**技术创新带来的超额利润将无法实现，这直接摧毁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核心动力。**同时，从历史中我们可以发现，**计划的需要、经济增长的最优化（不是从“绝对”的角度，而是从体制本身的逻辑出发）与“管理者”的物质私利之间也不可能协调，**这就导致“管理者”必然会通过重新引入自由竞争来解决低效的问题。（这些也可以在下文对存在过的工人国家的分析

中看出来)如果竞争消退了,那么就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会趋于停滞。经济意义上的竞争是私有制的产物,如果没有私有制,那么竞争就无从谈起,而这也不会是什么“资本主义”。

市场经济的存续基础是资本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权。**即便出现高度集中的国家调控,只要生产资料仍属私人所有,企业主就必然要求对生产计划、用工制度、利润分配的最终决定权。**例如,德国“共同决策制”中工会代表可以参与监事会,但企业战略决策权始终掌握在资方手中,这种权力结构决定了任何计划都只能是资本意志的体现。当计划制定需要平衡数百个私有企业的利益诉求时,其结果必然退化为市场趋势预测和发展建议。

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建立指令性的计划经济,核心矛盾在于两种经济模式背后的所有制结构与利益驱动存在根本对立。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资本家通过市场交换实现资本增殖,这种增殖必须通过商品流通领域的自由竞争才能完成。**国家若强制垄断所有原料供应并统一调配,等于摧毁了市场存在的物质基础——当企业无法自主选择供应商和销售渠道,价格机制将失去调节供需的功能,此时资本增殖链条在流通环节就被切断了。**资本家不会允许这种自毁根基的制度安排,因为这意味着失去对利润获取方式的控制权。

另外,我们还可以发现,**资本家普遍对任何形式的国有化表示排斥。**当政府将铁路、能源等产业收归国有时,私人资本失去的不仅是资产所有权,更关键的是丧失了通过垄断定价、技术壁垒获取超额利润的渠道。以英国1945-1951年工党政府国有化政策为例,部分企业的国有化剥夺了资本家垄断的租金,这种直接经济利益受损导致资本家集团通过《泰晤士报》等媒体发起“国有化扼杀创新”的舆论攻势。**即便在资本主义框架下,国有化也意味着资本自由流动受限,**如法国1982年密特朗政府对五大工业集团和39家银行的国有化,直接触犯了巴黎银行通过信贷控制产业的核心利益(《法国经济史》,王志强著,第213页)。

相反,**工人则是普遍对国有化表示支持,**而其原因在于**劳动条件与生存保障的改善概率提升。**资本主义下的国有化虽不改变剥削本质,但国家直接管理往往带来更稳定的就业保障:英国铁路工党1949年声明表示,在铁路国有化后,“国有铁路停止大规模裁员,工会获得协商权”,这与私营铁路公司为追求股东分红随意解雇工人的历史形成对比。更深层动力源自社会化大生产与私有制的冲突,当德国鲁尔区钢铁工人在1970年代要求煤矿国有化时,本质是反对私人资本为转移利润关闭高成本矿井,这种生产资料的社会控制诉求已触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边界。**工人对国有化的支持也存在从量变到质变的辩证发展。**工人们在初期可能满足于资本主义国有化带来的短期利益,如墨西哥1938年石油国有化后,工人实际工资增长超20%,医疗教育保障强化。但随着资本反扑(如1980年代英国撒切尔政府大规模私有化导致矿业失业率飙升至24%),工人将逐步认识到局部国有化的局限性。2015年希腊债务危机期间,比雷埃夫斯港工人抵抗中远集团收购时高举“拒绝私有化!国有化归工人!”的标语,显示出工人阶级已能区分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与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化的本质差异——前者是用税收维持私有制,后者是通过生产资料国有制终结剥削制度。这种意识演进并非道德选择,而是生产社会化程度超越私有制容量的必然结果。

只有人民对社会生产进行广泛的民主管理,才能真正摆脱各式各样的紧缺、浪费、贪污、恶性竞争等病态的社会问题。因此所谓的“管理者”和“脑力劳动者”,即资产阶级、官僚以及其一切走狗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失去其作用的。既然是要整个社会对生产进行控

制，那就必须要生产和消费物质资料的群体：雇佣劳动者阶级（即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推翻他们，建立起自己的专政，来实现无阶级无政治国家的共产主义社会。

但是，如果工人阶级不主动发挥自己的能动性，资本主义社会是不会被推翻的。与资产阶级革命不同，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其独特性。**工人阶级因其在生产关系中的被剥削地位，无法像资产阶级在旧制度框架下那样（例如通过手工业工厂掌握物质和精神生产资料），在革命前就实现经济上和文化上的相对成熟。**这种成熟只能在革命后达成。此外，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试图依照一个自觉的计划来改造社会的革命**。这决定了其实现的前提：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初步建立以及工人阶级对文化生产的实质性参与，无法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完成，只能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才可能实现。

诚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工人自治和工人监督的实践（如阿根廷的工厂和旅馆），**但它们无法像早期资产阶级那样在社会规模上掌握物质与精神生产资料。**因此，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正如其自觉计划性所要求的那样，其另一根本特点也显现出来：它必然需要全体劳苦大众（社会中的绝大多数）展现出高度的能动性和自我组织能力。**工人阶级若不主动发挥这种力量，资本主义便无法被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能够通过多种方式（**包括大规模破坏或限制生产力**）顽强延续自身，而这也恰恰反证了这场革命不可能自发产生，也不可能由少数精英或“无所不知”的领袖包办；它必须同时依靠尽可能高的阶级觉悟与最广泛人群尽可能高的自我组织水平。如果工人阶级的革命实践未能最终颠覆资本主义统治，后者就总能找到苟延残喘的途径。

我们于是得出结论：资本主义经济对于市场管控的加强，不会导致和平地过渡到一个理性的计划经济体制；这只更多暴露了社会化生产与私人占有之间、国家级调控和无序竞争间的矛盾，且只能通过工人阶级掌握生产资料、夺取政权得到解决。

针对没有翻墙渠道的读者们

推荐 VPN：魔戒

国内直连官网（任选其一）：

- <https://mojie.app>
- <http://mojie.host>
- <https://mojie.co>

打开官网注册账号（邮箱注册，常用邮箱即可），登录后台，购买套餐（支持微信、支付宝）

邮箱推荐使用 Proton，其家的 VPN 也有安全保障：<https://proton.me/mail>

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缺乏一个的全国统一的政治组织，一盘散沙、各自为政。革命运动被悲观主义与冒进主义笼罩着：当前中国的左派们要么充斥着“理论家知识分子”，读着几百年前的老书怀古伤今，为死人而战，判断过去人物、批斗过去事件，活在过去；要么则是一群群不择手段的机会主义者和冒进派，在建成坚实的政治基础前把自己暴露在广大敌对运动与国家机器的监视前。

当下大多数中国工人运动之组织之间的内斗，由于种种山头主义氛围的影响，绝非进步趋势和落后趋势的斗争，也并非真正严肃的政治讨论——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左派间的所谓斗争几乎全部变成了人身攻击和毫无实际政治意义的过家家，不仅在群众眼中留下一极为幼稚的政治形象，更是离间广大工人阶级的热心支持。在这样不蜕化为纯粹的空谈。

什么是属于全体共产主义者和工人阶级革命左派的政治纲领？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在中国、东亚和整个寰宇建立起劳动者的政权，实现彻底的劳动者之民主，公有化重要的生产部门、将其产出还于全民，用理性、公平、按需分配的方法有计划地规划协调生产力，让人类得以掌握自然，结束阶级社会的存在以开启人类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我们追求一场根本性的革命和彻底的解放，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有一个摆脱山头主义和过去革命者间一切阻挠我们前进的阴霾，建立起一个以民主对抗宗派，以党的统一和集中领导真正对抗国家机器的、属于工人阶级的先锋之政党！

我们的党必须是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党——民主集中制是“自由讨论，一致行动”，即革命党党员通过民主方法决定党的政治路线，并有义务绝对遵循业已通过的决议。革命党的建制不允许任何个人主义存在——任何党员皆不得违背集体的意志，任何革命者都不得在党的民主程序以外违背党的决策。

我们的党必须是摆脱一切惰性的党——如果没有一个强大、有活力的党员团体，再严密的党纪和党章都是一纸空谈，从基层到干部的一切党员都必须充分组织起来，在党的建设中共同承担政治任务，以强大的基层和健全的干部实现持续的扩张与发展。

我们的党必须是面向群众的党——共产主义革命者支持一切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自发反对剥削阶级与资本主义统治集团的动员，并积极谋求将其引导至社会主义革命的自觉道路上。革命左派以政治理论为纲，推动建立涵盖全体劳动者的工会和工人团体，并希冀通过广泛的革命组织动员一切无产阶级参与建党和促成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的党必须是以理论武器剥除盲动和个人主义倾向的党——只有通过回归最彻底、最现实的分析，方可实现对于革命的世界观、政治纲领、方法论等必要理论武器的辩证统一；革命党人必须以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为纲，消除各革命团体间的狭隘分歧和意识形态对立，促进以革命的方法论为基础的政治统一，并以此铲除任何借“革命”之名行宗派割裂、分化革命力量的行为。

我们的党必须是以全体中华无产阶级为基础，追求寰宇各国革命的党——革命党人绝不能以通过资本主义制度下统治集团机械划定的国家与行政疆域限制革命组织的发展。中华国家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必须支持全世界中国和华人无产者在绝对联盟、甚至完全统一的革命组织内实现社会主义革命——革命党在建制上跨越资产阶级国家疆域的统一绝非沙文主义，而是求得革命团结的唯一途径。一个属于华人的跨国革命党也绝非寻求超民族主义，而是借助同先进的中国革命者间友好、坦诚的结盟，将我们的革命传遍寰宇内的五湖四海，帮助全世界受剥削压迫的人民寻得解放！

在此，我们呼吁建立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共产主义革命党，一个代表劳动者的先锋队，一个铲除一切懦弱和盲动的组织，一个能够真正对抗国家机器、资产阶级建制和血腥镇压并寻回我们革命左派已经丢失数十年的纪律、纲领和统一组织的政党。

我们是建党者，是先锋队，我们呼吁所有想要开创更美好明天的革命者与我们共同奋战。
为了有朝一日，我们能够亲眼见证我们以双手开拓的、属于新世界未来的晨曦！